

炎黄春秋

第 **3** 期
2008 年

**高尚全：广东新一轮思想解放意味着什么
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

田纪云：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十大措施

顾骧：乡贤胡乔木

哭倒长城骂倒秦

目 录

春秋笔

- 1 广东新一轮思想解放意味着什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访谈录 …… 马国川
- 6 喜读《日记中的池必卿》 …… 朱 正
- 9 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十大措施
——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 …… 田纪云

一家言

- 15 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 …… 辛子陵
- 22 我看宪法第六条 …… 何 伟

求实篇

- 24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 …… 丁龙嘉

怀人篇

- 33 乡贤胡乔木 …… 顾 骧
- 41 我的父亲马洪 …… 马 雅

人物志

- 44 袁振英——陈独秀的得意弟子 …… 李继锋 郭 彬

往事录

- 52 我们连里的七个“反革命” …… 利川 津津
- 56 日本战犯重到南京 …… 叔 弓

品书斋

- 60 龚老师，您的心愿可以了却了吗？ …… 韩 钢
- 63 《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读后 …… 章立凡

沉思录

- 66 读毛泽东关于“大串联”的谈话 …… 金大陆

文坛事

- 68 丁玲与毛泽东一次谈话的真伪 …… 徐庆全

海外事

- 71 1920年的世界革命与苏波战争始末 …… 王天兵

古今谈

- 75 哭倒长城骂倒秦
——从孟姜女故事看中国老百姓眼里的秦始皇 …… 李 乔

编读窗

- 79 读者来信摘登（三则） …… 高世玉等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方 实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继绳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杜导正(召集人)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徐 孔(副召集人) 袁 鹰
凌 云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定代表人): 杜导正

副 社 长: 徐 孔 杨继绳

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员: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 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qikan.com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本刊电子信箱: yanhcq@sina.com

电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编辑室: 010—68534879 68523512

办公室: 010—68522852

传 真: 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定价: 5.80元

广东新一轮思想解放意味着什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访谈录

马国川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之邀请，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到广东作了“解放思想与体制创新”的专题报告。报告后，高尚全接受了记者采访。由于报告太长，本刊发表高尚全答记者问。

解放思想是无止境的

马国川：最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倡导思想解放，还专门邀请您到广东作了“解放思想与体制创新”专题报告，引起了社会反响。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背景下，广东大力倡导解放思想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高尚全：广东省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经济总量全国第一，财政收入去年 7700 亿，人均 GDP 是 4000 美元。但是，不能因为取得了巨大成绩就停止下来，因为不进则退。我们要有忧患意识，看到与国内其他省如浙江、江苏的差距，看到同国外的差距。同时，看到省内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有待解决，在全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财政收入占到全广东的 67%，而粤东、粤西、粤北分别只占 3.1%、3.1%和 3.9%，地区差距很大。和东南亚的个别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起来，广东省的经济也有差距。在经济之外，还有社会、文化等方面需要发展。

马国川：解放思想不光是对广东适用，对全国也非常适用。

高尚全：当然，因为解放思想是无止境的，任何地区都应该积极进取，不能小富即安，不能故步自封。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前在中央党校发表的六·二五讲话四个坚持中，首先要坚持的是解放思想。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广东省委和汪洋书记积极倡导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是落实十七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

马国川：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确实取得巨大成绩，但是绝对不能满足于现有的。

高尚全：对，不进则退嘛。为什么要解放思想？不是说否定成绩。要想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再上新的台阶，只有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舍此别的没出路。

马国川：近几年以来，对于改革的反思里夹杂了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不乏否定改革的声音。是否可以说，这也是近时这次思想解放的一个背景？

高尚全：从历史经验来看，每一次改革的突破和体制创新，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有一个时期否定改革开放的声音不小。现在提出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也是对那种反对改革的声音的响亮回答。

马国川：否定改革者还有自己的理论依据。他们说，新自由主义主导了中国改革。

高尚全：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是不好的，那么中国改革也不好了，因为中国改革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所以中国改革走到邪路上了。甚至有人说，新自由主义派了张五常来指导中国改革。我当了八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不知道这回事，这不成天大的笑话了吗？

大家都知道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同志，指导中国改革的是邓小平理论，“摸着石头过河”，说明我们没有现成的模式，只能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邓小平理论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阔步前进。本来，新自由主义是什么东西？人们并不知道。改革之初，有一个时

期广东人吃不上鱼,为什么?因为计划经济价格不合理,养鱼的人没积极性。后来价格放开了,养鱼的人有积极性了,老百姓吃到鱼了,市场上鱼多了价格就下降了,这是市场经济规律起作用。那些广东的农民乃至领导看到新自由主义的书了吗?没有。不知道新自由主义是怎么回事。我曾经问诺贝尔奖获得者蒙代尔教授:有人在批判新自由主义,你能不能说新自由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很抱歉,我不知道,我知道新保守主义,不知道新自由主义。

马国川:实际上是有些人故意拿着这个名头在说事。

高尚全:就是。还不知道新自由主义是怎么回事就批起新自由主义,而且批到改革开放头上,批到小平同志头上,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马国川:但是,可以预言的是,在解放思想的时候,恐怕还会有人继续跳出来。那么,对这些声音应该抱一种什么态度?

高尚全:我觉得十七大报告已经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锦涛同志说:“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有人问我总书记这话是不是有针对性?我答当然有针对性!有些人否定中国改革开放嘛,认为我党搞了资本主义嘛,甚至把张春桥的理论也搬出来了,还有人甚至提出来为“四人帮”彻底平反。十七大报告里的这些话是对他们的响亮回答。

解放思想的基础是实事求是

马国川:这次思想解放,应该是在1978年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高尚全: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层次更高了。通过解放思想,来解决前进中碰到的问题和矛盾,排除思想和体制性障碍,落实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马克思老祖宗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详尽的答案。马克思在世的时候还没有电灯呢,如果他能看到今

天的电脑互联网,那么肯定会有许多新的思想。恩格斯1888年到美国,就有很多新的想法,认为欧洲落后了。1984年小平同志评价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要发展,就要讲新话。如果没有新话,就没有发展;如果不发展,怎么会有今天?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事实证明,这些都是真理,这就是实事求是。

马国川:我注意到一些坚持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文章,大段地引用马恩列斯的原话,很少自己的话。

高尚全:最近有个学者对我说,一个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抱怨说,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都是老人了,年轻人不研究了。现在现实当中好多新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要研究的问题。不研究现实问题,只知道引用马恩列斯的原话,甚至以他们的话来批判现实,有什么意义?甚至有人说,你们搞市场经济,我偏偏要搞计划经济!这是什么逻辑?!确实有一些人被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所束缚,解放思想很难。如有一位老同志到深圳一看就流眼泪,说没有想到深圳一夜变成了资本主义。

马国川:也有一些学者未免不是风派人物,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看到现实社会中有太多的问题,又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就想往回走。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一些年轻人。

高尚全:一位老同志对我说,他看了我的文章,表示赞同。他说你的岗位很重要,在改革攻坚碰到困难的时候,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这很重要。

那些想走回头路的人,不妨到我国的延边去看看我们的邻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和今天的邻国没有什么区别。年轻人应该想一想:社会主义到底为什么?如果没有给人民造福,这个社会主义还有什么生命力,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马国川:再美好的思想、再完美的理论也要落实到现实中去。

高尚全:一些人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反过来批判改革开放。十七大前,另外一位老同志找我谈了一次,他看了十七个人的万言书,很生气。他

说现在怎么还有人这么干？我们党的历史上因为有人搞左倾，花的代价很大，损失很惨重，这个教训难道还不能吸取吗？

马国川：解放思想最重要的应该是实事求是。

高尚全：解放思想的基础是实事求是。包括对历史问题，也包括对现实问题。所以汪洋书记提出来允许说错话，但是你不要说假话。所以，我们应重温一下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文章。

马国川：有一位老同志说，80年代整个社会风气相对来说比较好，人们

敢于互相批评，包括对领导也敢直言不讳地提意见。但是到今天说假话泛滥成灾。

高尚全：为什么说假话？要分析。说真话可能对他不利，说假话对他有利。说假话领导高兴，可以提拔你，说真话就可能被批评、被排挤。说假话就掩盖矛盾了嘛，关键在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

理直气壮地提出三项权力适当分开

马国川：有些人担心，解放思想是否会流于口头上的宣示。

高尚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解放思想就是按照十七大的布局，寻找我们思想认识上的差距，从思想上来深化对体制改革的认识和理解。我们的思想是不是符合十七大的要求，怎么样做？要找准矛盾的焦点，这样思想解放就不会流于形式。

马国川：日前，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任剑涛在做客岭南大讲坛时说，“在宪政民主建构上，广东一定要有突破。”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高尚全：十七大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还提出来要“确保权力



高尚全近影(徐庆全摄)

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其实，深圳很早提出来三项权力要适当分开，但是后来不敢提了，因为担心被人批评成搞“三权分立”。既然解放思想，我们就要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三项权力要适当分开，不能自己决策、自己执行、自己监督。

马国川：人们对解放思想有很多期盼。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海内外人士

对此也有各种乐观解读。是不是可以说，这次解放思想一个主要方面，应该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

高尚全：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呼吁政府管理体制变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政府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我认为，改革已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各种体制改革都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这是四位一体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马国川：许多人士认为，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而且这种滞后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增加了很多障碍，人们期盼这次解放思想能够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以利于经济政治的协调推进。

高尚全：我在十六大前，就提出了我国改革存在四个滞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宏观的体制改革滞后于微观的体制改革、政府的体制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马国川：实事求是地说，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在一些地方也有一些尝试，但是进步一直不太大，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哪里？

高尚全：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要改革领导体制的构想，八十年代中后期他明确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但是因为对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缺乏经验，风险也比较大，所以一直提出要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

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搞试验区吗

马国川：但是我们也听到另外的声音。有政治学者发表文章声称，今天中国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民主政治架构，一个是比较完善的、甚至能够和西方抗衡的政治体制。

高尚全：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还不完善，政治体制改革还滞后，怎么称得上完善？

马国川：2006年去世的广东改革开放的先驱任仲夷，在晚年就一直呼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高尚全：我们认识较早，接触较多。2001年我在深圳参加一个会议，讨论深圳如何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区。讨论当中有一个代表说，我们讨论半天，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标准怎么做样本？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没有准备，会议有些冷场。当时我也没有准备，思考了一下，就讲了五条：第一，以人为本，这是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基础；第三，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第四，民主政治；第五，中华文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最后一条是根据马洪同志的建议加上的。当时任老就坐在我身边，他说，民主民主，由民做主，由老百姓做主。我说你讲得很对。

西方有些东西可以借鉴，可以学习。比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在十五大报告起草过程中，我提出，要把自由、人权写上。因为这些东西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我们搞社会主义应该把这些旗帜高高举起。这个意见引起了当时主持起草报告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因此在十五大报告当中，就明确提出“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马国川：自由和人权都加上去了。任老晚年写的文章谈了许多改革思想，甚至还有比较完整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比如，他提出可以像搞经济特区一样，搞一个政治特区。一些媒体的朋友说，广东的思想那么解放，是不是可以先把政治体制改革搞起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高尚全：任仲夷当年号召深圳特区一定要敢于有办政治特区的筹划，是非常睿智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试验，小范围地试验，包括民主选举。政治体制改革当中有很多机制，要在机制上进行改革。

马国川：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经济权利普通民众都感受到了。三十年后的今天，民众的民主权利要求也越来越强了。这次思想解放也是呼应了民众的这样一种现实要求。

高尚全：所以去年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马国川：也有些人说，趁思想解放的东风，对于媒体的管理方式是不是也应该改进？

高尚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及到各个方面，其中当然包括各种不同的监督机制。有政府部门内部的监督，也包括政府以外的监督，比如说决策权、监督权放在一起，你怎么监督呢？另外还包括群众的监督、媒体的监督，使得这些监督都要发挥不同的作用。

非公有经济不发展就会出问题

马国川：您肯定也注意到了，广东在喊思想解放，上海方面也在喊思想解放。

高尚全：湖北、河北等地也提出新一轮思想解放，因为这些都是为了落实十七大精神。

马国川：大家都感受到一种热烈的气氛，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高尚全：对。到处都在说解放思想，而且从领导做起，而不是空话。

马国川：人们最担心的是走过场，喊空话。另外也有人说，当前思想解放一个最大的障碍是特殊利益集团。

高尚全：垄断部门有特殊利益，导致部门利益的差别很大。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

马国川：怎样调整利益的格局呢？

高尚全：比如说，打破行政性垄断，是调整利益格局的重要方面，因为垄断必然导致效率下降、服务质量差。因此，要打破垄断，不允许通过行政垄断牟取特殊利益。要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民众的意见，同时要加强监督。

马国川：某些国有垄断企业做大做强之后对民营经济挤压，甚至在一些领域存在着再国有化的趋势，包括国务院关于“非公经济”的36条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高尚全：因为受到干扰了嘛，有人说36条是搞私有化了嘛，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中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其中之一就是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经济还得继续发展，不发展就会出问题。现在我们别的不要说，就业压力问题就解决不了。非公有经济解决了五分之四的就业问题。但是有人给中央写信，认为非公有经济不是姓“社”，而是姓“资”的。

马国川：认为是资本主义苗头了。

高尚全：过去出现过许多笑话嘛，最早不准养猪养鸡，后来养猪养鸡不能养多，超过几个就是资本主义了。有的国家现在还不允许农民养牛，说牛是生产资料，所以只能公有，不能私有，结果极度贫穷。国家投资就是社会主义，老百姓投资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观念不改变，生产力怎么发展？

有人说，现在要反右了，因为反“左”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要搞阶级斗争，要搞“文化大革命”。我说老百姓绝不允许再搞瞎折腾了。台湾的朋友说，你们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搞建设，台湾成为“四小龙”之一。现在倒过来了，你们搞改革开放，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了，因此人民生活没有提高，竞争力大大下降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四个特点

马国川：您的名字是一直和中国改革开放联系起来的，您是改革开放的积极参与者、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者，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作为见证者，您怎么来看待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高尚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我认为有四个特点。第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每一次体制上的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所以没有解放思想，没有改革的勇气和创新精神，也就没有今天。

马国川：鉴往而知今，所以我们应该继续解放思想。

高尚全：对。第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姓“资”姓“社”、姓“公”姓“私”不断争论的过程。争论当中，小平同志的理论起了关键性作用，每一次碰到这种情况，都是小平同志出来讲话，因为他有这个权威，把握了正确的历史航向。

第三，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逐步明确了改革的目的、方向和性质。明确了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为了老百姓的共同富裕，过上幸福的生活。一句话，就是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分享。

第四，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不断排除“左”的干扰的过程。

马国川：到今天仍然是。

高尚全：今天仍然是。“左”的具体表现是每一件事都问一下姓“资”姓“社”，改革就要不断排除这个干扰，因为姓“资”姓“社”的争论只能阻碍改革开放，我们必须排除之。我看有些国家意识形态争论比较少，因此改革比较顺利。比如，越南为什么有的改革跑在我们前面去了？80年代的时候，我当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曾经跟越南领导人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去年我到越南去，发现他们有些改革措施走在我们前面。第一，领导人差额选举，第二，越南十大的报告提前两个月发给全民讨论。他们没有纠缠于姓“资”姓“社”的争论。

这四个特点概括了这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理念是“实事求是”，这一理念是30年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被重新确立的，而解放思想是这一理念的内在和本质要求。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改革实践能够突破传统理论束缚的思想基础，也是改革理论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重要源泉。

（责任编辑 杜导正 杨继绳）

喜读《日记中的池必卿》

朱正

今年人们隆重纪念改革开放的三十周年，是很自然的。今天，知识分子也好，农民也好，干部也好，一句话，每一个中国人，能够有现在这样的生存条件，能够对未来抱有希望，都应该拜三十年前开始的这一场改革开放之赐。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许会以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吧，可是五十多岁的（还不必说像我这样七十多岁的人了）老年人就会说，不，那时生活完全不是这样的。习惯于今天的生活的人，对于三十年前每日每时发生的事情，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回顾往事的时候，我要说的是，这一场改革开放的开始是何等的艰难。不久前我读了王民三日记的节选，使我又重温了这一页艰难的历史。

日记作者王民三，1956年起，就是贵州省粮食厅的领导人，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几十年。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工作，他同省委领导的接触。现在他从日记本中摘录出一部分，以《日记中的池必卿——1977—1985年粮食工作片断》为题，听说是发表在贵州省粮食局的内部刊物上。我没有机会看到这刊物，只看到它的一个节选本。我看到的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贵阳联谊会编印的《三联贵阳联谊通讯》2007年第2期（总第47期，2007年5月20日出版）上刊出的《王民三粮食工作日记（节选）》，以及这篇之后刘学洙的介绍文字《一份可贵的贵州粮政信史》。我们就从这份节录之节录的材料，就从一个省（贵州省）的一项工作（粮食工作）这样一个小小的窥视孔中，可以看出改革的极端必要，和改革的极端艰难了。

池必卿1978年5月至1985年3月主持中共贵州省委工作，开始是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马力，1979年9月马力病故之后担任第一书记。现在人们回顾历史谈到走到改革开放前列的省份，总不会忘记说四川、安徽、辽宁，说到贵州的似乎不多。看了王民三的这些日记，就会知道池必卿也是走在前面的一人。

我看到的这份日记节选，最早的一天是1977年2

月6日，最后的一天是1982年8月16日。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的前夕，到改革开放的初期。下面我就来介绍一点日记的内容。

1977年3月5日

李葆华（引者注：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二书记）在四干会上宣布党中央决定，马力同志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在大会上讲话，其中有：“对社会主义大干了还要大干，对资本主义大批了还要大批，争取在较短时期内改变贵州的面貌”。

马力这话，当然是说得不错。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难道能够不干社会主义，不批资本主义吗？问题是：你怎样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下定义？这时，在共产党内部，有致力于改革开放的人，也有不很赞成乃至很不赞成改革开放的人，这两部分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解释是大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的。马力所说的大干了还要大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王民三1979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抄录了新华社内参（104期）对贵州工作的评论全文，其中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省委一些领导同志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对贵州的祸害及其流毒的严重程度认识不足，路线不够端正，自觉不自觉地维护和执行了林彪、“四人帮”时期一些左的东西，如在农村推行“三地”代耕，“穷过渡”，“场期改革”（引者注：就是延长赶场日期的间隔），限制集市贸易和家庭副业；搞高指标，高征购，加重农民负担；农田基本建设不因地制宜，搞一刀切，形式主义，劳民伤财……致使贵州三年来的经济工作进展不快，多年来出现的经济困难改变不大。目前贵州老百姓吃粮仍十分困难。每年要国家调进十亿斤粮食，社员生活水平很低，平均口粮只有三百五十斤……

马力在就职演说中说的“争取在较短时期内改变贵州的面貌”这一豪语不能不落空了。这也是必然的：

你要继续坚持几十年间已经用不断的失败证明了“此路不通”的那一套，难道能够有较好的结果吗？

作为下级业务部门的负责干部，王民三还是向马力进行过规劝的。他1977年8月27日日记：

省委突然决定今年粮食征购任务18.5亿斤，我感到任务定得太重，1974年1975年连续两年受灾，农民负担承受不了，又要走“购过头粮”的老路子，必然又购又销，劳民伤财。为此郑重地给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封建议信，说明了不能多购的种种因素。信的内容事前已个别征求了部分常委的意见，都表示赞成。

可是收信人马力却不赞成。王民三1977年9月2日日记：

在向省委常委汇报粮食会议情况时，马力对我的这封建议信严厉批评，理由是要减轻中央调粮的负担，其他常委都不便讲话，马还讲：“我已给陈国楨（时任粮食部长）谈了，生产我们有雄心壮志，明年少调点，后年不调，八年大见成效，做出贡献。”

10月31日日记：

在地委书记会议上，马力再次点名批评王民三关于少购粮食的信。他说，在粮食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你写信也是好意，我批评了多次，思想也不一定通。

11月10日日记：

据各方面传来的信息，近来马力在各种大小会议上都点了王民三的名，上了纲，戴上了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为什么比当着我的面批评要严重得多，使我难解其中的原由。

1978年4月25日日记：

省委常委会讨论夏粮征购工作，马力的批评更为严厉，说你们在征粮数量问题、购过头粮问题、农村缺粮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说明了对形势的看法。否定粮食大丰收，否定大好形势。

7月6日的日记中还记下了“马力说，王民三要撤职，开除党籍”。大约是没有得到常委的支持，马力才没有处分王民三。

王民三认为高征购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9月2日的日记上，记下了省委常委王朝文在全省财贸会议上说的几句话，王朝文说：“惠水县摆金区歌唱家罗秀英反映当地农民呼声，粮食减了产不够吃，增

了产不够吃，增不增一个样。”

征购粮食，是粮食厅（局）业务范围内的事。王民三日记中这方面的记载不少。他当然明白，压低一点征购数字，可以减轻一点农民的负担，但是并不能根本改善农民的处境。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呢？他在1978年9月21日的日记说：

省委开地委书记、部办委主要负责人务虚会，我在财贸小组会上呼吁：“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在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根据到惠水的调查，包干到组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键，包到组，不是单干，有了超产奖，农民才有热情”。

9月23日日记：

在务虚会上，同地委书记们，孟子明、陈健吾等议论，都认为包产到组是势在必行，那是一种劳动定额管理形式，过去挨批，就是在这方面，在是非不明情况下，干部心有余悸。

9月25日日记：

《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了一篇包产到组超产奖励的文章，我复印了几份发给省委常委，有的仍表示心有余悸的心情，因为这正是当前批判的东西。

可以看得出来，王民三在提出这个主张的时候，还不敢说“包产到户”，而只要求“包产到组”，而且要强调说明“这不是单干”，表明他还不肯冲决意识形态的网罗，他也是心有余悸的一人。可是，就在这时候，划时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了。他12月24日的日记说：

刚结束的（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全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阶级斗争天天讲和空头政治时代将要结束了。

在全会闭幕才两天的时候，就能对它的历史作用作出如此准确的评价，这充分表现了王民三的历史眼光、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

在这本日记中，有多处兴奋地记下了实行包产到组的成效。1978年11月2日日记：

去惠水县姚哨公社，看到这里搞了包产到组之后，像火山爆发一样，人心沸腾起来了，群众说：不愁没粮吃没肉吃了。和县委邱耀国、梁登峰看了，一致认为，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1979年6月15日日记：

应安顺地委陈远武之邀，和农委副主任孟子明去参加地委常委会，听了一天半，他们镇宁、关岭包产到组到户相当普遍，农业生产形势很好，群情高涨，关岭一位公社书记发言：“生产队不如作业组，作业组不如单干。”普定县反映：“大集体不如小集体，越小越好，越大越不好管”。类似的呼声很强烈，有些人心有余悸不敢讲。我和孟听了都受到很大启发，认为农业有了希望。

7月7日日记：

包产到组形势发展很快，凡是搞了的生产就好，我想，由此可以引申出一个理论，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生产力就应该是检验生产关系的标准，包到组（户）既然能发展生产力，就证明大集体大锅饭体制是违背生产力原则的。

9月18日日记：

省委开地委书记会，池必卿充分肯定了农村大好形势，充分肯定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形式。还讲“要打破左倾机会主义的紧箍咒”。

省委第一书记的这种态度当然是贵州全省改革开放强劲的推动力。

在这本日记里，王民三不仅记下了池必卿在这一类会议上的正式发言，还记下了他一些三言两语的插话。例如，1979年1月3日的日记，记下了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财贸农村组发言的情形，他写道：“我的发言不冷静，引起池必卿极大关注，在插话时，池必卿只说了一句‘我们多年来都是对农民的剥夺’。”池必卿这话真是说得太真实，太中肯，太深刻，也太尖锐了。几年前从土地改革运动中分得的土地，以及耕畜、农具等等生产资料，以及其他财产，都一年一年，一步一步，剥夺殆尽。与粮食统购统销相结合的举世无双的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农民成了比城里人要低一等的二等公民，不但在物资供应、升学就业等方面比城里人要多许多限制，就是在婚姻方面也是如此，因为这种户口制度规定，农村妇女所生子女也只能是农村户口，请问，有哪一个城里的男人愿意或者胆敢娶农家女为妻呢？农村户口要转变为非农村户口，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做“农转非”，这可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只有过一例，大约是山东省某县吧，一个农家女在种地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很大的天然钻石，把它上交给了政府，于是她就得到了“农转非”的奖励。天呀，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天然钻石好捡呢。这就不

但剥夺了他的财产，还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以及他子女的人身自由。在放弃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之后，户口管理制度相应地有了一点松动。但是，这方面的改革是还没有到位的，至少，还没有实行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享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权利。假如公民都享有了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权利，就不会有什么“外来务工人员”一说了。现在是，就在北京城里，还有相当数目的人被称为“外来务工人员”，地位就要比北京市民低那么一等，比如说，他们的子女入学，缴费就要多些。这大约可以看作剥夺农民的一点遗痕了。从池必卿上面的这一句话里，可以看出他对我们这种对农民的剥夺是持批评态度的。

8月12日日记：

城市居民食用油的供应标准，一直是四两，现在有了条件，拟提高到五两，经请示池必卿、苏钢（引者注：时任贵州省长）得到批准，中粮部知道后，表示了不同意见，又跟池必卿谈，他说，我们作为临时措施吧，群众生活太苦了。

池必卿就是用“临时措施”这个借口，顶住了中央粮食部的“不同意见”，维持了增加居民食油供应量的原议。这时候，他想到的，不是个人将要承担什么责任，而是群众生活太苦了。有这样的态度，他才能成为改革开放的勇将吧。

池必卿对改革开放的坚定态度，在王民三的日记中有不少反映。这里只介绍一下《阳关道与独木桥》这篇传诵一时的名文的来由。那是一次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东北杨易辰说包产到户是个独木桥，他们不走这个独木桥。池必卿针锋相对地回答：“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回答，真是掷地作金石声！吴象即据此写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王民三1980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记下江西的一位省级干部对他说的：“贵州池必卿的名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响遍了全国，我很佩服池必卿顶住压力的硬骨头精神，他为贵州人民立下了大功。”因而也就可以说，他为改革开放的大业立下了大功。

王民三的日记，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极有公开出版的价值，看到我这篇点滴介绍的读者，大约都在热切地期待着读到全书吧。

（责任编辑 萧 徐）

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十大措施

——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

田纪云

在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真可谓“难于上青天”。建国后几十年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已渗透到各个方面，比如经济形式的单一全民所有制，国家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对生产资料的统购统配，对财政收支的统收统支，对工业消费品的统购包销，对外贸易的统一经营、统负盈亏，对劳动工资制度以及对物价管理的高度集中，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等。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实行了几十年，人们已习以为常，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谁要改变它，就是离经叛道，搞修正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改革，向商品经济以至市场经济过渡，不仅要触动旧体制，改变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且必须打破传统的思想观念，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八十年代，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和巧妙运筹下，冲破重重阻力和难关，取得了辉煌成就，为九十年代乃至以后几十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持下去。”（邓小平 1985 年 7 月 11 月听取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田纪云、张劲夫、宋平汇报时的谈话）

八十年代先后推出并实施的改革措施是：1、改革税收制度，即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取消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办法，税后利润归企业，探索国有企业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发展的路子；2、改革与完善财政体制，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改变由中央“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体制，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3、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取

消实行多年的主要农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制度，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4、改革蔬菜购销体制，取消由国家统购包销的制度，把蔬菜经营推向市场；5、改革供销合作社体制，变官办为民办；6、改革流通体制，变国家独家经营为多种经济形式、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少环节、符合商品流向、有利商品经济发展的流通网络；7、改革外贸体制，实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打破长期实行的由国家统负盈亏、大锅饭的外贸经营体制；8、改革工资制度，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打破平均主义；9、改革劳动制度，实行劳动合同制、双向选择和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打破长期实行的一次分配定终身的劳动制度；10、改革物价管理体制，逐步慎重地放开物价，使之适应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

这些改革措施，基本上都是由我根据国务院领导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的大思路，组织有关部门制定方案后，首先提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论证，如认为可行，即提请胡耀邦主持的书记处或政治局审议通过，然后再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审议通过改革方案的常务会议多为万里主持，并做出决定颁发文件予以实施。有些重大改革措施，如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劳动工资制度改革、物价改革等，在财经领导小组研究后，赵紫阳还要带上我和有关同志分别向邓小平和陈云同志汇报，征得他们的同意。有的则在书记处或政治局研究后由代他们参加会议的秘书向他们汇报，然后把他们的意见反馈给中办。

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是在同传统经济体制、传统观念和某些个人暂时利益的矛盾与磨合中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厦门时,同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研究厦门经济特区规划

推进的,由于方向明确,步子稳妥,除价格体系改革一度出现曲折外,总体进展是顺利的,成功的,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为了让年轻一代了解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情况,特将十大经济改革措施的要点摘录如下:

1、关于“利改税”

中国税收制度是五十年代借鉴苏联的做法,适应计划经济单一经济成分建立起来的。全国解放初期,还保留了国民党时代的一些税收制度。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成,经济成分向单一化的全民所有制过渡,税种也越来越单一,除了工商统一税外,就是几个地方税的小税种,如牲畜交易税、屠宰税等。1965年还在重庆作过“税利合一”的试点,准备把工商税也改为以利润形式缴纳。理论根据是,社会主义企业固定资产都是全民所有,经营所得利润也应全部上交国家。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未及在全国推广。

八十年代初“利改税”的改革,就是想用税收的形式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不论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个体企业,在依法向国家纳税以后,其税后利润都归企业所有,归企业支配。其目的是适应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成分多

元化的新形势,增强企业的内在活力与动力,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和条条、块块分割的矛盾,企业对中央与地方只承担纳税的义务。并设想在利改税的基础上,用划分税种的办法,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我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阐述利改税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阐述城市和农村不一样,不能简单的把农村的承包制套用到城市,用来解决企业和国家的分配关系,但由于部门之间意见的分歧,影响了领导的正确决策,使利改税一度中止,再次实行改革初期的企业承包制,但最终还是回归到利改税的轨道。后来的实践证明,利改税这一改革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2、关于改革和完善财政体制

财政体制是国家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财政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划分中央与地方各级之间财政的收支范围与管理权限,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财务关系从而调动各方面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促进和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及各项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对财政体制进行过多次改革,实行过多种形式的财政体制。归纳起来,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统收统支”的办法,即地方财政收入全部上缴中央,地方支出则由中央拨款;另一种是以中央对地方实行“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的办法,即按照中央核定的支出,划给地方一定比例的收入,如收入超额完成了任务,地方可以按比例分成,使地方有一定的机动性。再一种

是中央对地方实行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体制，也叫做“分灶吃饭”，即由中央核定地方年度收支总额，收支挂钩、按比例总额分成，收入超额完成的部分，留给地方支配，使地方零用钱多一点。这三种办法，虽然形式不尽相同，但实质都是高度集权的体制，没有真正的地方财政。

与财政体制相适应，长期以来，国家对企业基本上是采取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办法，利润全部上缴，支出上边给，亏损国家补贴，把作为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的企业变成了各级行政机关的附属单位。总结建国以来实行的各种财政体制利弊，特别是考虑到未来发展方向是用税收的办法解决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同时，也借鉴了匈牙利、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我们提出用划分税种的办法来划分各级的财政收入，也就是说，在企业将上缴利润改为依法上缴各种税收的基础上，将税种分别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使地方财政具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这就是后来所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根据和来源。

3、关于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

建国以来，我国对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长期实行的是“统购统销”的制度，它的基本措施是：农民生产的粮食除自己的口粮和种子外，全部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一切粮食加工和经营粮食的企业，统一归国家粮食部门领导，所有私营粮商、粮食加工厂一律不许经营粮食或自购粮食、自销产品；对城镇居民、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农民和农村缺粮户，由国家按计划凭证供应；对食品及其他工业用粮，一律由国家粮食部门按计划供应，不得自行采购或转售粮食。

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同时，对油料、棉花也实行了统购统销。对生猪、烤烟、黄麻、蚕茧、羊毛、水果、水产品和中药材等数十种农产品，实行统一收购，即派购制度。

这种对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在粮食等农产品短缺的情况下，对保障社会的稳定，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制度不符合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发展的要求，它切断了农民同市场的联系，严重违背价值规律，长期以低价收购农产品，用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办法，说白了是用剥夺农民的办法保障供应，积累建设资金，极大地抑制了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越少越统，越统越少”的恶性循环。因此，随着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改革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势在必行。

八十年代改革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大体是按照以下三个步骤进行的：

第一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从1979年起，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提高了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等18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对超购部分再加价50%。同时，恢复了对粮食、油料的议价收购，在市场上开展议购议销。

第二步，减少统派购的农产品品种，扩大市场调节的品种。1983年10月国家将医药局管理的二类中药材从54种减少为30种，将商业部管理的一、二类农产品从46种减少为21种；到1984年底，国家统派购的农产品减少为38种。

第三步，从1985年起，取消统购派购，将粮食、棉花改为合同订购。粮食、棉花以外的其他农产品，实行自由购销。1991年，就提出了“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目标。

在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同时，在城镇也取消了凭证供应的配给制，各种票证自然消亡。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改革，总的是比较顺利的。现在改革开放前所使用过的各种票证已成为“文物”被收藏。

4、关于改革蔬菜购销体制

蔬菜是城乡人民不可须臾缺少的东西。长期以来，我们对城市蔬菜供应是采用由国家统购包销的办法，即由国营菜店向菜农包购蔬菜，再由国营菜店向城市居民统一销售蔬菜。蔬菜旺季时大量烂菜，损失由国家补，淡季时居民买不到菜，群众怨声载道。这是计划经济的弊端所致。从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就逐步放开了蔬菜价格，步骤是先细嫩品种，后大路品种，如白菜、萝卜、土豆等都是最后才放开的；目标是把蔬菜购销推向市场，多渠道经营，逐步拉开品种、季节差价。

蔬菜价格放开之初，价格一度大幅度上涨，群众怨言不少。为此，国务院决定，对城镇居民不分男女老幼每月给予7.5元的副食补贴。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一放就活，一活就多，蔬菜品种数量大大增加，质量提高，价格也下来了，群众也满意了，国家逐步甩掉了统购包销、大量亏损的包袱。

5、关于改革供销合作社体制

在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和城镇定量配给的同时,大力疏通流通渠道。首先是改革了作为农村商品流通主渠道的供销合作社体制。供销合作社,顾名思义就是合作经济组织,但我们却把它变成了所谓的“二国营”的官办商业组织。改革供销合作社体制的基本点是变官办为民办,恢复和加强其组织上的群众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和管理上的民主性,扩大农民股份和参与经营决策的权利,开拓业务领域,与农民联合兴办商品生产基地、农副产品加工和流通设施,为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

二是放手发展城乡集市贸易、建立城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至1987年,全国城乡集市发展到69683个,比1978年增加一倍多,集市贸易成交额达1557亿,比1978年增长八倍多。至1986年底全国大中城市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已发展到450多个,成交额24亿元。

三是鼓励农民以各种形式进入流通领域、自办流通服务,如贸易货栈、农工商联合企业、农民合作商业、专业市场、农民个体运销等,不仅大大缓解了农民买难卖难的问题,而且增强了农民的商品意识与承受风险的能力。

6、关于改革商品流通体制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工商业极不发达的国家,1949年工业总产值仅为140亿元(人民币),按当时的54,167万人口计算,每人平均25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合8美元。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30%,是个名副其实的农业国。

建国初期,个体经济曾经有相当的发展。但是随着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又经过“文革”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个体、私营经济几乎被斩尽杀绝。就连理发洗澡的,修脚捶背的,搞缝绉做衣服的,卖个大碗茶的,修鞋补锅的,卖点稀饭油条作早点的,摆个小摊卖点针头线脑的,等等,统统改造为国营了。一改为国营,生机活力也就没有了,许多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服务行业也就自消自灭了,“官办”哪能办那些“低三下四”的事?!许多以此为生的从业人员也就失去饭碗,社会主义也就成了“一切都难”的社会主义,贫穷的社会主义。回想一下那时候干什么不

难呀?走路难、吃饭难、做衣服难、洗澡理发难、修修补补难,什么都难。这种社会主义不仅想把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都由国家包起来,连一切生活琐事也都管起来。结果是误国害民。

随着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全面推开,农产品的丰富和农村集贸市场的活跃,以及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在城市、在整个商品流通领域国营商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再也难以维持了。1986年就明确提出,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基本目的是,使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四通八达,货畅其流,及时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多种需求。

改革的原则是:(一)必须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少环节、符合商品流向、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流通网络;(二)坚持政企分开,坚决砍掉一切不必要的行政性的中间环节,真正赋予企业以经营自主权;(三)采取多种形式探索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路子和形式。

供销社改革的三条原则是:(一)真正变官办为民办;(二)实行综合经营;(三)调整政策。在劳动工资、价格、税收、管理等方面,真正按集体企业对待。

八十年代,我国国营商业流通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按照这些原则进行的。

7、关于改革外贸体制

我国外贸体制的根本弊端在于吃“大锅饭”。如果说各行各业都存在“大锅饭”的话,恐怕外贸这个锅是最大的之一。全国有上万个国营外贸企业、几十万人的职工队伍,经营上万个商品品种,但是外贸单位基本上不计盈亏,能把东西买过来卖出去,就算完成了任务。赚钱赔钱,似乎与己无关,所谓任务就是完成出口计划。八十年代初期,对外贸体制也作过一些改革,比如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但效果不大。

1988年,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中央下决心对外贸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关键是自负盈亏和推行代理制。改革的原则是:(一)政企分开,权力下放。政企不分,以政代企,以企代政,这是中国经济体制的一个通病,也是外贸体制的一个顽症。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二)把各级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推向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推向市场，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

(三) 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把外贸企业推向国际市场经受考验，学习经营本领。四、加强行业管理，联合对外。外贸行政部门，把主要精力转到加强外贸的行业管理上来，包括制定经济法规，行业发展规划、制定方针政策、颁发进出口许可证、价格指导、监督检查等。这就是外贸企业改革的

基本原则，实践证明，外贸企业改革的路子是成功的。也为我国外贸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8、关于改革工资制度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工资制度，是五十年代比照苏联的办法制定的。这种工资制度当然比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即供给制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弊端很多，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例如劳酬脱节，职级不符，工资标准过多过繁，工资能上不能下，能增不能减，管理权限过分集中，政企不分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促进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不利于鼓励职工上进，增强责任心，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不利于正确处理职工内部的分配关系，加强团结和协作；不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和合理使用。所以，改革工资制度是人心所向，势在必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财政收入连年增加，不少改革措施陆续实施，为改革工资制度提供了可能。1984年10月4日，我与时任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将《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的意见》，报送小平同志审阅，小平同志批送赵紫阳：“总的方针，我很赞成，具体办法，提不出意见，请国务院审定。”

现在所实行的“结构工资制”就是1985年开始实施的，即把工资分为基础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工龄津贴。当然，考虑到当时财政承受能



日新月异的深圳城市建设

力，各种工资的标准定得较低，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多次提高了工资标准。但“结构工资制”作为一种制度还是1985年制定和实施的。

9、关于改革劳动制度

我国劳动制度，是五十年代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制度没有随着情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改革，以致存在许多弊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等，但这都是小修小补，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劳动制度存在的弊端。国营企业用工制度上统得过死、包得过多、能进不能出、一次分配定终身等状况依然存在。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专业化技术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要求劳动力必须进行合理流动，灵活调节。因此，劳动制度必须进行改革。

增强企业活力，最主要的是给企业以人权、财权、物权，特别是人事权。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的决定性因素，改革劳动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充分调动亿万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当时明确提出，改革劳动制度的基本目标和要求是：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和提高企业素质，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保障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和充分发挥职工的主人翁精神，促进人才的成长和合理流动；

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要求。改革的目标是：逐步消除现行劳动制度中统包统配和固定过死的弊端，建立一套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责权利相统一、稳定与灵活相结合的新型劳动制度，做到统筹就业、择优录用、灵活调节、能进能出，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合理使用，逐步实现劳动力管理社会化。

本着这些目标和要求，拟定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这四个规定均由国务院正式颁布执行，也是后来制定《劳动法》的基础。

10、关于价格体系的改革

风险最大、困难最多的还是价格体系的改革。我国的价格管理制度，同计划经济模式一样，是从前苏联“老大哥”那里搬来的。改革之前的价格，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几乎所有商品价格都是由国家统一定价，而且多少年不变。这种价格体系，不仅价格严重背离价值，更不反应市场需求，根本无法适应发展商品经济，更谈不上适应市场经济。但低工资低物价几十年了，柴、米、油、盐、菜、肉、蛋等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多少钱一斤群众都清清楚楚，而且习以为常，一说涨价，就人心惶惶。但改革就是要放，一放价格就涨，一涨生产者的积极性就高，商品不仅数量增加，质量也会提高。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问题就在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价格与生产、城乡人民收入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一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就充分估计到价格改革的难度，确定采取“走小步，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

1985年至1987年，价格改革基本上是顺利的。在农产品方面先是放开水产品、水果以及细嫩蔬菜价格。在工业品方面放开小商品的价格。1985年对粮食、棉花由国家统购改为合同订购，其他农产品实行自由购销，并且提高铁路运输价格，等等。虽然这几年物价指数比改革前高（1985—1987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分别上升8.8%、6.0%、7.3%），群众怨言也不少，抢购也时有发生，但未出现大的风波。

1988年上半年进一步放开了肉、蛋、大路菜、糖等副食品的价格，相应的给城镇居民一定数额的副食补贴，亦比较顺利。经国务院批准，从7月28日起，放开13种名烟、13种名酒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同时提高部分高中档卷烟和粮食酿酒的价格。由于步子迈的过大，加之中央决定价格改革要迈大步，以及媒体对价格改革要“闯关”的宣传，一度引起群众的恐慌，出现挤提银行存款的抢购风波。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与运筹下，价格体系的改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88年与1984年相比，国家定价的商品由67.5%下降为24.0%，国家指导价由14.4%上升为24.0%，市场调节价由18.1%上升为57.0%，为向市场经济过渡创造了条件。

回顾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措施，其基本出发点是逐步破除高度集权的、僵化的、对外封闭的计划经济模式，使作为上层建筑的经济体制有利于发挥中央各部门、地方、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并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有利于同国际市场接轨。

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形式，特别是合资企业、集体经济、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建国以来国家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9年到1987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都大体上翻了一番。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说：“从我们这些年的经验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到的。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1981、1982、1983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这个时期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邓选》三卷376页）所有这些，都为我国九十年代以后的发展和向市场经济过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责任编辑 徐庆全）

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

辛子陵

从王震访英说起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王震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约占全国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拥有在中国人看来相当阔绰的私人住宅和家用轿车，每年度假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王震来到一个失业工人的家。王老有点眩晕，这是失业工人吗！？他看到了什么呢？

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五十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用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王震看后感慨良多。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的副总理都高。柯华大使告诉他：“我曾问过一个清洁工人，他每周收入约一百英镑；一个开电梯的工人，每周收入为一百五十英镑。”按当时英镑对人民币汇率1:5.91概算，清洁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五百九十一元；电梯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八百八十六元。王震是五级高干，那时每月工资不到四百元，周工资不到一百元，相当于英国一个清洁工周工资的1/6，电梯工周工资的1/8。中国的贫穷社会主义太相形见绌了。如果不是拿中国高官与英国工人相比，而是两国百姓作对比，差距就更大了。据专家计算，1978年中英两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是：1:42.3。就是说，英国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高四十二倍。

我国驻英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于日参加了接待工作，他在《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一文中称：“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王震访英归来，成为当时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王震是中共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他对英国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过程，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从带有成见的怀疑、蔑视到惊讶、赞叹、向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把西欧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参照物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英国民主社会主义奠基人是工党首相艾德礼。王震访英时是保守党执政，撒切尔夫人当首相。按照我们原来的分类，英国保守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英国工党是修正主义政党，一资一修，把英国搞得“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看起来我们过去所批判的“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道路”并不是那么可怕，恰恰是我们梦寐以求实现不了的幸福社会。自视为根红苗正的共产党人办不到的事情，被“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办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和长期以来我们某些革命经典对资产阶级的看法有关。比如，《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展出的、周恩来所藏的《共产党宣言》(徐庆全摄)

《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的认识

发表《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三十岁，恩格斯二十八岁。恩格斯二十三岁来到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工厂里工作。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还陪同马克思参观了曼彻斯特的血汗工厂，他们认识资本主义是从这里开始的。

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托福于产业革命，一座座大工厂拔地而起，英国已经成了“世界工厂”。英国的产品几乎占整个世界工业产品的50%。财富像魔法一样从工厂涌流出来。鳞次栉比的商业街，豪华的大剧院，哥特式的教堂，林荫道两旁宽敞舒适的富人住宅，每一刻钟或半点钟都有公共马车经过。产业革命创造了灿烂的城市文明。

在这些城市文明光环照不到的地方，掩藏着一个悲惨世界，这就是工人的贫民窟。自由资本

主义时代，又被称为“野蛮资本主义”。曼彻斯特是英国纺织业的中心，是“野蛮资本主义”的典型，那里的工人受的苦难最深，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恩格斯访问过的一个贫民窟里，他亲眼看到：“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个孩子，有时还有祖母和祖父，住在仅有的一间十至十二英尺见方的屋子里，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全区在十个当家人中，很难找到一个除了工作服还有其他衣服的人，而且工作服也是破破烂烂的；他们中有许多人，除了这些破烂衣服，晚上就没有什么可以盖的，他们的床铺也只是装着麦秸或刨花的麻袋。”最可怕的是失业的威胁，一旦失业，全家人就陷入了绝境。

恩格斯看到了早期野蛮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悲惨的生活，义愤填膺地写道：

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

他举例做了细致地分析：由于头一个发明——一个工人摇动的珍妮纺纱机——的生产能力已至少比一架普通纺车高五倍，所以每一架新的珍妮纺纱机就要使五个纺工失业。生产力比珍妮纺纱机大得多而且也只需要一个工人操纵的水力纺纱机就剥夺了更多人的生计。自从许多纺纱工厂使用自动纺纱机以后，纺工的作用就全部化为乌有而由机器代替了。

恩格斯说，由于机器方面的各种改进，费力的工作一天天地被机器所代替，从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变成了简单的看机器的工作，这是纤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这个工作所得的工资要少一些，甚至少2/3；这样一来，尽管生产已经扩大，成年工人却一天天地从工业中被排挤出来，而且再也找不到工作；甚至由于机器完全代替了人力，整个的劳动部门被取消了。资产阶级老爷们可以去问问曼彻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清道夫，去问问那些在街上卖盐、卖火柴、卖橘子、卖鞋带等等或者竟不得不讨饭的人，问问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回答道：工厂工人，被机器剥夺了工作的工人。在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由于蒸汽织机的普及推广，

把八十万熟练织工抛上街头。

马克思深受恩格斯的调查报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影响，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搜集许多工厂调查报告，证明恩格斯的结论：机器夺走了工人的饭碗。马克思把机器看做是工人阶级的敌对力量，他是这样说的：

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罢工即劳动反抗资本专制的这些周期性暴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为了保护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出现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情失业工人，为失业工人鸣不平，想制止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在道义上百分之百的有理。但是，为了维持工人就业，保持工人稳定的生活，要求厂主不得添置新的机器设备，不得采用新技术，这就取消了生产力的发展，取消了财富的增加，取消了社会的进步。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用机器代替工人，或者说机器排挤了工人，是普济天下苍生、推动历史进步的首善之事，正是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地发展，逐渐地把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才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创造着物质基础。

共产党人反对了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坏蛋。他们是第三等级中最勤劳、最能干、最精明、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的祖先是农奴，他们的父辈是城关市民。《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最积极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方面又提出政治主张：为解放穷苦工人，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

段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正是英国宪章派准备在伦敦发动起义的前夕，接近爆炸的阶级斗争形势，对工人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义愤，使他们在给“宣言”定稿时带上了道德感情色彩，给资本主义判了死刑，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一定要用暴力。他们与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区别是：三大空想家是说服国王和政府采纳和实行他们理想社会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数日益众多的无产阶级可以作为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物质载体，认为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改造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新社会是建立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的经济基础上，这就是说，共产主义需要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是靠科学技术为支撑的新的生产方式，创造了高于封建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战胜并取代封建农奴制的。共产主义者手里有没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新制度能否代替旧制度的关键。正如列宁所正确指出的：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苏联和中国的共同经历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说：“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这篇文章的副题是《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他想通过发动群众加班加点、不领工资的办法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经过七十多年的拼命努力，苏联也没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来。1967年苏联官方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当年美国的——32715亿美元——67%，此后再未公布。据西方权威机构联合调查，苏联解体前19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120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10（美国同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64319亿美元）。可见当年苏联统计公报水分之大。

毛泽东也深知，劳动生产率，发展速度，是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生命线。他在八大的预备会上说：

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们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他发动大跃进，放出豪言两年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英国 1957 年钢产量是两千万吨，中国是 535 万吨。1958 年他下命令钢产量翻一番，达到 1070 万吨。命令九千万人“土法炼钢”，巨大的资源浪费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不算，还赔了（贴补）40 亿人民币，占 1958 年财政收入的 1/10，生产几百万吨无法利用的铁垃圾。而真正实现超英赶美，是在改革开放后的 2006 年，不仅在钢产量上超过了英国和美国（2006 年中国钢产量 41750 万吨，包括英国的欧盟 25 国钢产量 19899 万吨，包括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钢产量 13350 万吨），而且在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超过了英国。不过这不是按照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革命道路”，不是按照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赶上和超过的，而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赶上和超过的。中国如不是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会像苏联一样被开除球籍。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经过七十多年拼死努力，苏联和中国为发展经济赶超资本主义国家付出了饿死五千万人的代价（苏联饿死 1000 多万，中国饿死 3000 多万）。夺取了政权，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等于创造了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消灭小农经济，恰恰是在阻碍和破坏生产力。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给社会的是票证经济，这是 20 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经历。

东德亡党亡国的“痛处”

从 1945 年到 1991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人民恢复和发展的四十五年。无论是资本主

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除美国外大家都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这四十五年是两种制度和竞赛的四十五年。四十五年的比较，谁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谁给普通民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物质利益？人民已做了结论，历史也已做了结论。

东西德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前哨，二战后它们发展起步的经济基础是一样的。马克思的子孙们仔细地、深入地、长期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做了对比。“科学社会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一条就是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从 1945 年开始，东德的企业主即资本家们即开始往西德逃亡。东德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开始认为让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走掉是件好事，可以净化社会，减少反对派，有利于党的统治，不仅没有阻止，还给他们发了前往西德的通行证。到 1961 年跑了二百七十多万人。后来发现，不仅资本家跑了，科学家、教授、医生等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技术工人都往西方跑。这股逃亡浪潮愈演愈烈，直接威胁到了东德的生存，于是修筑了“柏林墙”。德国统一前夕，西德的人均国民收入比东德的人均国民收入高四倍。西德的产值占两个德国全部产值的 93%，东德带给大家庭的财富只占国家全部财富的 7%。统一后，联邦德国作为全德国的中央政府拨出巨额资金帮助东部同胞，对于帮助东部地区人民克服经济困难，加速经济结构的改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东德统一社会党垮台后，该党政治局委员、长期负责意识形态的京特·沙博夫斯基对本党的失败有深沉地反思。他带着亡党亡国之痛说出了两个令共产党人“沮丧”的真理：

一是国有制不如私有制。在“国有制框架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永远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制的优越性是理论家推导出来的，是虚幻的，例如理论家们最爱喋喋不休地宣讲：“工人们在国营企业干活是当家作主，是为自己干活；在私营企业干活是为资本家做奴隶，是受压迫、受剥削。”德国工人的实际体验是，在东德国营工厂里“当家作主”，挣五百马克；到西德私营企业里去“受压迫、受剥削”，挣二千马克。工人们“用脚投票”，逃往西德，宁可“受压迫、受剥削”去挣二千马克，也不留在东德“当家作主”。

二是社会必须要有资本家。这个“令人沮丧”的真理是共产党人最不愿意接受、但又必须接受的，只要他们不想像德国统一社会党那样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资本家是什么？是社会经济管理阶层。尼克松认为：“东欧四十五年的共产主义‘和平’，甚至比西欧五年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管理阶层的摧残更加严重。东欧国家普遍缺乏使资本主义杠杆起作用的高级经理、会计师及其他专业人才。”对资本家进行诋毁，把他们妖魔化，都赶到西方去，使东德发展经济时失去了先进生产力的领头人。这是一种痛苦的反思。东德与西德相比，多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包袱，少了一个管理阶层。这一多一少，是东德经济搞不上去的根源，是东德亡党亡国的根源。

当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进攻苏联，企图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验扼杀于摇篮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因为人民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优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富裕更公平的社会制度，经过一段艰苦努力老百姓可以过上好日子；当资本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和平共处了两代人的时段，用先进生产力创造巨额财富改善人民生活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旗帜的社会制度——的致命的短处就暴露出来了，除了“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立供高级干部享乐的“共产主义”外，下层干部和普通百姓得到的只是多做奉献、少拿工资的教育以及一大把限量供应的票证，“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办法造成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办法让人们过上像欧美百姓那样富足的日子。和平演变是双向的，公平的，不可抗拒的，优胜劣汰。

要重新认识资产阶级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

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是一个误区。

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要求，将一批私营企业改组为国营企业。后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1924年联合政府下台，停止了国有化政策的实

施。民主政治能够保证及时纠正重大政策的失误。

瑞典社民党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关键，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不是所有制，而是分配方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 and 工会来掌管，就是说由政府（在工会监督下）通过税收把一部分企业利润分配给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别，建设福利型国家。这样一种认识成为他们的新的施政纲领，1932年通过大选再次上台执政时，大得人心，既得到了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拥护，又得到了资本家的拥护，竟连续执政44年！

在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冲击下，经过一百多年的改良，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工人的劳动时间由十五六个小时普遍降低到每天八小时，工人的劳动报酬也已超过自己和家人的衣食所需，有了王震亲眼所见的花园洋房，有了汽车，有了电视、冰箱、空调等过去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消费品，有了自己和家人从生到死伴随一生的社会福利保障。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W·E·H·哈拉尔出版《新资本主义》一书，宣告“旧资本主义的消亡”，“新资本主义犹如一只从垂死的时代的灰烬中飞出来的凤凰”，“超越现有的‘旧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的僵化的意识形态。”世界进入新资本主义时代。“发达国家的收入增长了十几倍，从多数人每年只靠几百美元维持生活到今天（注：这些话是1986年说的）每个家庭的收入达到26000美元以上，而每周的工作时间却从70小时缩短到不满40小时。有史以来，生活的基本需要第一次得到了合理的满足，人的寿命延长了一倍，物质生活也普遍变得很舒适。”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掌握的先进生产力，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和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水平。人们的经济关系可以不再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残酷争夺，可以是双赢的结局，使每个人都成为受益者，尽管受益的多少有所不同，这是一种普遍受益的同向分化。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没有尖锐化，没

有出现爆炸性局势，秘密就在这里。

我们一直有一个大义凛然的说词：把私营企业改造成国营企业，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事实又如何呢？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后的20年间，新建的和改组的国营企业由于制度性的先天缺陷，连年亏损，职工工资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5.7%。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1957年的582元下降到1978年的549元。

日本是被我们视为“制度落后”资本主义国家。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三十人以上的企业职工工资提高了将近三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九倍。结果，剩余价值率从1955年的314%提高到1970年的443%，是一个劳资双赢的结局。

你要真想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像日本那样在二十年内给工人提高三倍的工资，就得团结资产阶级，保护私有制；私有制不仅和资产阶级利益攸关，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共损共荣的。

在中国，由消灭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到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经历了漫长的、曲折的探索过程。“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本意是要向全国人民宣示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为了防备左翼朋友攻击，宣传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虽然声势很大，但没有直接点破主题。要继续用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就必须点破这个主题，让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不仅在法律上合法，而且在理论上、在舆论上合理，成为光荣体面的事业，成为富民强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我以为，“三个代表”的新意是：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面的继承（正是《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科学发展观超越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姓马姓修的宗派狭隘眼界。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相容的。这是科学发展观中应有之义。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给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经过反复和对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给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比消灭资产阶级大得多的物质利益。2006年中国民营经济在GDP的比重为65%。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取消农业税是不可能的。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21万亿人民币，比1980年增长10.5倍；国家财政收入已达3.93万亿元，比1980年增长32.4倍。有了这样的经济实力，胡锦涛才能很有底气地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要把民营企业家当作管理层使用，并吸收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们的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最深刻的总结，用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两面政策。一方面“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保障职工合法权益”。讲团结时不忘调节分配，为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谋利益；讲斗争时不忘保护私有制，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中共在新时期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企业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一切过“左”过右的政策均不能达到既发展生产又实现社会公正、既繁荣经济又改善人民生活这样两项目的。

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突破了历史上许多过时的僵化框框，建立了改革派的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郑重宣告：这个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今后,指导改革开放兴利除弊的理论和衡量改革开放是非成败的标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主义和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注释:

柯华:《在马克思的墓前——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观察》,见《炎黄春秋》1999年第2期

参见刘国平:《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比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176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65页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0页

《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卷,第441页

见《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卷第23页

《伟大的创举》,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页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2007年版,下卷第762~763页

这篇讲话以《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引文见295~296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下卷第712页

见MEPS《世界钢铁总揽》

见《京特·沙博夫斯基采访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尼克松:《新世界》,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24~125页

见《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51页

[美]W·E·H·哈拉尔著:《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8页,第一章《旧资本主义的消亡》第3页,第9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第392页

刘仲黎主编:《奠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田纪云:《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第3页

见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一)、(二十二)条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2期目录

| | | |
|------|--|--------------------------|
| 书屋讲坛 | 骑士精神与“女儿”崇拜 ——关于《红楼梦》女性立场的讨论 | 刘再复 刘剑梅 |
| 口述历史 | 孙康宜教授访谈录 | 生安锋 白军芳 |
| 流年碎影 | “陈衡哲是谁?” 两个才子 | 刘 超 王嘉军 |
| 思史佚篇 | 湘潭王、叶:争而不矜两经师 国学大师与政治枭雄过招 ——章太炎“时危挺剑入长安” | 张晶萍 秦燕春 |
| 灯下随笔 | 《色·戒》:故事与呈现 电影·小说·历史 ——看电影《色·戒》后记 | 刘 畅 汪荣祖 |
| 裁书刀下 | 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 ——评张斌《丰子恺诗画》 略论明清叙事文学中的城市书写 《闲情赋》不是“白玉微瑕” | 卫攸宁 文洁若 胡晓真 邵逸青 |
| 说长论短 | 迈向平权社会:从慈禧问“礼”谈起 没有底层就没有国家 群体比个人更缺德 武士道与侠客梦 | 陈心想 摩 罗 张宝明 伍 国 |
| 前言后语 | 另眼看“鬼狐”士林(代序) | 傅光明 |
| 人物春秋 | 新娘赵五贞之死 郭沫若亲吻胡适的前后 ——从“旧友”到“论敌” | 吴润凯 蔡登山 |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我看宪法第六条

何 伟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一节中，重申了十六大两个“毫不动摇”，另外加上了两个“平等”，即“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的内容。将两个“平等”作为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新格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之义。但十七大的这些内容执行起来很困难，因为现实存在着所有制的平等，一是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二是这一规定是从苏联搬来斯大林的两种公有制理论，都规定全民所有制高于集体所有制。一个是国家大法，一个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都把这种不平等的理论置于崇高无尚的地位，很难形成平等保护物权和平等竞争的新格局。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形成了一个从理论到体制、从体制到制度、从制度到政策，完整的两种公有制不平等体系。理论上全民所有制高于集体所有制，导致体制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资源占有上的物权不平等，农民除了占有集体土地之外，一无所有，其余资源均被城市占有。在资源配置、财政投入和分配、社会保障、卫生、教育等等都向城市倾斜，使城乡差别扩大，将二元结构制度化。二元结构导致政策上的不平等，农民成为二等公民。在心理上，城市人有优越感，农村人有自卑感，这就形成“三农”问题的一个完整体系。虽然本届政府史无前例的大力惠农、支农，农民状况有所改善，但据农业部披露的数字，目前国家对农民仍然是多取少予。虽然农民这些年收入连年以6%的速度增长，但城乡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两种所有制理论把农民害苦了。在经济上存在四个剪刀差：即产品价格剪刀差，农民工工资剪刀差，征地价剪刀差，教育、卫生、社保剪刀差。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2007年7月9日，在《中国经济时报》上的文章讲，“仅仅以上工农产品剪刀差、土地、工资差和未上社保等几项，农民建国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估计也高达30万亿！”结果是城市发展了、富起来、现代化了，而农村相对贫穷。至于知识上的差距所造成农村相对愚昧，城乡知识差距比基尼系数还大。到目前全民所有制还强制集体所有制低价出卖土地，然后高价转卖，城市发展了，而农民不能从出售土地中得到相应的增值收益，又一次剥夺了农民的利益。4千多万失地农民，耕田无地、做工无岗、经商无资本、病老无保障，成为“四无”农民。可见两种所有制理论是“三农”问题的根源，如果这一理论不突破，就不能解决“三农”问题这一顽症。目前这一理论还导致国家只维护国有经济的垄断物权，而不维护农民的物权，更不维护非公有制的物权，这怎么能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很难健全现代市场体系，这是当前改革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不解决此问题，改革难以向前推进。

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苏联照搬来的，这一模式的理论基础就是两种所有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曾强制推行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穷过渡”，以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形式，对农民进行物权剥夺。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有口难叙。应当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很大突破，取得巨大成就，但唯独没有触动斯大林的

两种公有制理论。只有突破这一理论，农村才能发展起来。我们看到一些先进农村，就地实现工业化、就地实现城镇化、就地实现居民化、就地实现股份化。凡是实现这四个转化的，都是突破了两种所有制的束缚，摆脱了二元结构，实现了公有制和个人所有相融合的社会所有制。

目前有一些人误解宪法第六条，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制，而以国有企业来偷换公有制。认为国有企业比重下降，就削弱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违背了宪法，公有制不占主导地位，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其实，国有企业的内含小于国有经济，国有经济的内含小于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内含小于公有制。宪法第六条将公有制界定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国有企业既代表不了全民所有制，也代表不了集体所有制，更代表不了公有制。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并不能证明公有制不占主体的地位，削弱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和公有制的内含和数量完全不同，不能等同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种论点是逻辑混乱，断章取义。何况宪法还讲有集体所有制，为什么不把它包含在公有制之内。用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来偷换宪法所

讲公有制的内容，倒有些违宪之嫌。

宪法所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只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明确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公有制。这样，公有经济不只有国有制，还有股份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合伙制、各种社会基金、社团经济等等，已经打破了斯大林的人为的、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的公有制，而出现了开放式、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公有制，即社会所有制。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下降，并不意味着公有制的比重下降，如果按社会所有制标准来统计，公有制仍占主导地位，没有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宪法第六条现在的表述，我个人以为已经过时了，它不能包括现实公有制的内容。这一理论过去把农民害苦了，现在又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者的保护伞，阻碍非公有经济发展。应当用社会所有制来代替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既符合实际，又符合马克思的学说，更具有科学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16号
 电话：010-64071474 64074641 64002810
 传真：010-64055026
 邮编：100009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08B
 电话：010-84608848 传真：010-84608847
 邮编：100027

SW 声望听力 网址：<http://www.sw-tl.com>

**解决听得见
听不清
耳聋
耳鸣的烦恼**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

丁龙嘉

政权建设：具有抗日、民主选举、民主思想和作风三大特性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他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政治时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日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指示》对政权的性质，人员分配原则，政权选举的原则，政权的组织形式，政权的施政方针等做了明确规定：“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这是中共中央对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的第一个系统的指示。就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关注着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他指出：“目前正在开始的召集河北参议会和选举河北行政委员会，是一件具有严重意义的事。同样，在晋西北，在山东，在淮河以北，在绥德、富县、陇东等地建立的政权，也具有严重的意义。”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山东党组织加强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作。1940年2月，山东分局决定设政府工作部，以统一领导抗日民主政权工作；规定各区行政机构依次主任公署，专员公署，县政府，区、村公所；要求各级政权的成立，应尽一切可能发动群众民主选举产生。在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后，6月8日，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政权问题的新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充分认识政权工作的重要性，经常关心政权工作，选派优秀干部做政权工作；在各级政府中建立党团组织，以保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委不能直接干涉、包办、代替政府工作；各级政府、参议会要实行“三三制”原则。

此后，中共山东党组织除在新开辟地区建立政权实行委任制外，在根据地内普遍发动群众民主选举政权。民选政权时，在中、上层，实行间接选举；在基层，实行直接选举。

民主选举形成的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颁布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纲领》对于政治建设作出如下规定：“实施民主政治”，“使一切赞成抗战、赞成民主者”，“都能参加民主政治”。“实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权；村以上各级政权一律民选；成立各级参议会等民意机关。”《纲领》，就是旗帜。省临时参议会根据《纲领》，先后颁布了各级参议会的选举条例和组织条例，各级政府组织条例，村政组织与工作决定，选举

工作大纲。各地的参议会和政府，都是按照这些条例等民主选举产生的。

1940年8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之前，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村政权的改造没有提上日程。在此后紧接召开的山东省第一次行政会议上，确定民主改造村政权为行政工作的中心之一，并针对国民党政权的专制与腐败，提出以政权民主化为目标。改造村政权的程序，是宣传选举意义、公布候选人条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充分讨论，推选出候选人；符合选民条件的村民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由于文盲占相当大的比例，就采取“豆选”等有中国特色的方法。

一年之后，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决定取消乡一级政权，以村为政权的基层组织，实行行政村制。在每一个行政村中建立起按民主程序工作的机关，设立村民小组；以村民小组选出的代表组成代表会议，代表会议是村的最高权力机构；村民选出的村政委员会为代表会议的责任机关，村公所为日常政务政令推行机关，村长主持村公所工作。村民直接选举村政权，是中国基层社会的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

在民选政权中，中共山东党组织把普遍建立县、区、乡参议会，作为奠定山东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作。山东分局民运部长李竹如指出，实行民主政治，不但要有“合于民主的选举法”，还要“以合情合理合于民主的办法普遍召集山东的县区乡参议会”。为什么要普遍建立县区乡参议会，李竹如提出了三点特殊重要的意义，第一是可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趋于巩固；第二是可以密切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第三是可以真正实现民权主义的思想。对于第三点，他专门解释说：“因为人民只有在各级参议会中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才能真正实行人民的民主生活，才能使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生产上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参议会不仅是各地的民意机关，也是最高权力机关，其有决定各地行政官吏、颁布地方性进步法规、审核预决算、监督当地的司法机关与指导地方武装部队的权力。”

在政权建设中，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民主选举政权，二是政权人员构成实行“三三制”，三是依法施政（下文将专门论述后两个特



罗荣桓

点)。民众是否拥有选举权，是检验主权是否在民和社会性质是专制还是民主的试金石。如果民众没有选举权，那么主权就不可能在民众手中，那么这个社会决不是民主社会。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反侵略战争的硝烟中，真诚而非虚伪地实行民主选举，选出的政权按照新民主主义纲领施政，所以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而日益巩固发展。而同时与之并存的日伪政权则日渐萎缩，国民党政权则无法立足，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不得不于1943年8月退出山东。

在这种形势下，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于8、9月间举行了一届二次议员大会，决定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对原施政纲领进行了修改，其中对于民主政权建设增加了“实行‘三三制’，欢迎各党派、各阶层的拥护抗战及赞成民主的人士参加政权”；规定“发扬民主精神，健全各级参议会和各级行政机关”；“彻底完成村政权的民主改造”；“树立民主集中制的领导”。自此至1945年8月，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达到5个行政主任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同月13日，“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成

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唯一的省政府。

在注重组织建设的同时，将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建设提上了日程。为此，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提出了“三个反对和三个树立”。第一，反对官僚主义的忘本意识，树立为广大群众办事的群众观念和战争观念。其内涵是，明确政权的性质既是抗日的又是反封建的，政权的任务既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又要推翻封建统治；明确民主的基本运动表现为民选政府运动；明确政权主要维护对抗日民主事业做出最大贡献的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也要照顾参加抗日的地主、资本家的利益；明确政务人员应深入群众、接近群众、通过群众，协助群众团体组织群众自愿自动，不要强迫，也不要“恩赐”。第二，反对官僚主义的统治权威思想，树立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平等思想。其主要内涵是，在政府对人民方面，反对管教、统治人民的态度；在上级对下级方面，反对权威思想、等级观念、文牍主义、家长领导的态度；在下级对上级方面，反对“为上级服务，不为人民服务”和妄分职务贵贱等级的态度；在个人对职责方面，反对计较个人地位前途和贪污腐化的态度。第三，反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树立集体主义的整体观念。其内涵是，反对个人英雄主义、私情观念、享乐腐化思想以及独立主义、孤立主义作风。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的建设，不只是提高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效率和威望，促进了抗日、民主事业的发展，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支具有民主思想和作风的公职人员队伍，为尔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中坚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委任制到选举制；从组织建设到思想作风建设，表明民主政治已在齐鲁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

政权人员构成：实行“三三制”

通过民选实行“三三制”的参议会与政府，同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部队、抗日群众团体是一体的，共同支撑起敌后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同参议会、政府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共产党如何实施领导？绝不能像国民党那样一党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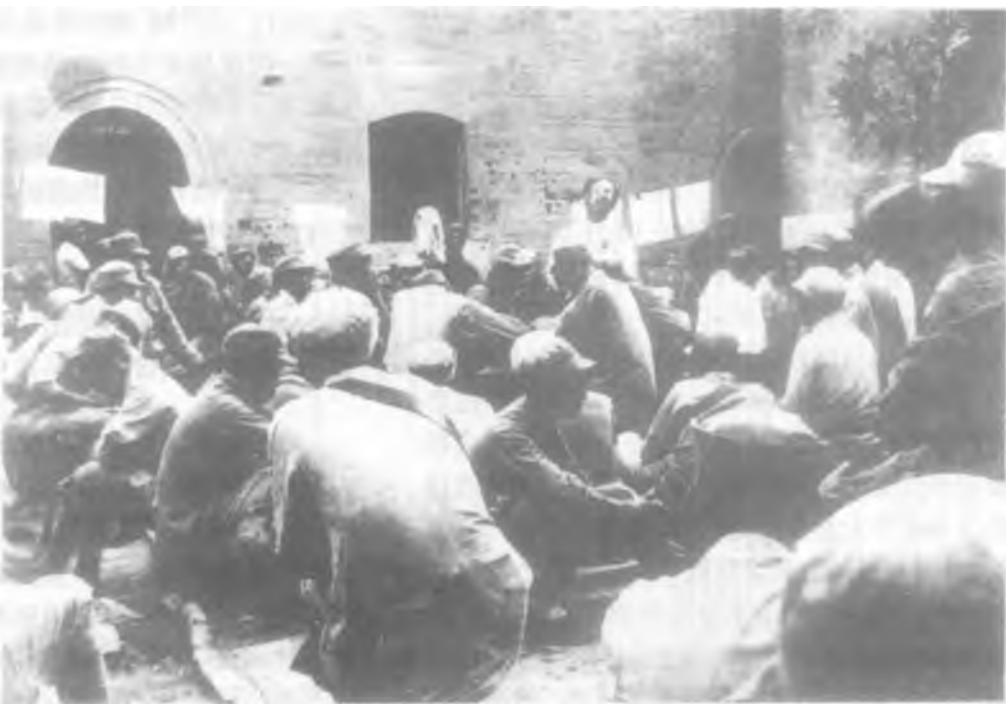
一切包办、一切代替、绝无民主。正确的是实行政治上的领导、路线上的领导，是经过政权工作中的共产党员组织党团去实行领导。八路军同参议会、政府的关系是支柱与营盘的关系。绝不能像国民党那样以军干政、以军代政。正确的是相互支持。抗日群众团体同参议会、政府的关系，是基石与大厦的关系。抗日群众团体要支持、拥护参议会和政府，参议会和政府要代表人民群众特别是基本群众的利益。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党组织、八路军部队、抗日群众团体的一切行动都要符合参议会和政府颁布的法令、法规、条例。因为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大部分抗日群众团体是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群众组织，所以在这一组关系中，决定性的关系是共产党与参议会、政府的关系。

必须承认，民选的“三三制”参议会和政府，约束共产党不能以多数去压倒少数，必须去争取其他民主人士的合作；要求共产党必须使自己的主张正确，并通过与各方面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去实施。这就从组织上和政策上保障了抗日政权的民主性质。

从1940年3月“三三制”的提出，直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五年半的时间内，中共山东分局及其领导人，一直都在强调“三三制”的重要性，强调实行“三三制”。起初提出“贯彻民主，实行‘三三制’”；后来强调“认真实行民主，彻底实行‘三三制’”；中间一再指出“‘三三制’是最具体的组织形式”；“‘三三制’是统一战线的真实政策”，多次批评“对于‘三三制’的民主制采取怀疑态度”，执行“‘三三制’不全面不彻底”，反复要求“建设真正进步与彻底民主的抗日政权，政府、参议会等组织成分必须逐步实行我党中央‘三三制’的决定，在我党我军较巩固地区，我党数目还可以少于1/3”，要经过“民选方式实行‘三三制’”。

这期间，1943年9月之前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于1942年在刘少奇指导下代表山东分局所作的《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中，对政权实行“三三制”进行了深刻的总结，提出了明确要求。他说：“政权还未成为真正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权。首先在成分上，‘三三制’还未开始执

行,上层是党在包办,下层不少是地主士绅包办。其次在运用民主方式与尊重民意上还未认真去做,县、区、村政权及民意机关 1/3 或 2/3 还不是民选的,即使是过去用民主方式选出之政权,也还不是真正经过群众的自觉与自愿。政权机关与人员军队化、党化,部分官僚化,工作上重复着军队与党及旧政权的方式,压抑着群众



1938年底,八路军第115师主力一部挺进山东,发展山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图为罗荣桓在泰(山)西东平湖召开的山东津浦路西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形势报告

的积极性,束缚着群众的自动性,形成与群众脱节,群众未能感觉到自己是主人,是执政者,故对民主政权也就表现部分冷淡,因此民主政权也就表现无力。”他在这里说的“‘三三制’还未开始执行”,是指实质性的、普遍的执行。他在报告中提出的今后的八大任务之一是,“改造政权,认真实行‘三三制’”。山东分局于当年10月1日决议将这一报告发布全党深入讨论和执行。第二年,朱瑞又代表山东分局作了《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指出:“政权工作方面,……‘三三制’工作未开展,民主作风仍有一定限度。”他在这里指出的“‘三三制’工作未开展”,是指实质性的、普遍的开展。报告中要求:“不应只限于政权机构内实行‘三三制’,而应在青年、妇女、文化救国会当中也实行‘三三制’,就是工会、农会也必须实行‘二二制’(即中共党员与非中共党员各占一半)。”山东分局于当年8月19日发出执行这一报告的指示。

1943年9月之后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罗荣桓,于1945年1月16日在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闭幕典礼上,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就是人民的政权,阐明共产党对政权的正确态度与正确关系。他说:“我们的党委过去对政权工作不

够关心,甚至某些领导干部中还存在着错误观点,认为‘三三制’政权既是统一战线的机关,对党外人士就看成是‘请客’,没有足够认识‘三三制’政权的实质就是人民的政权。”他在谈到共产党对政权的正确态度与正确关系时说:“共产党自己所提出政治纲领及某一时期的政策方针,是要通过党员取得党外人士的合作,而不是站在政权之上去命令包办政权。……‘三三制’政权是各抗日阶级合作的体现,其内部必然存在各种不同的立场,共产党员应该公开表示自己的独立立场,和党外人士合作。在贯彻纲领中,某些方法和程度上是存在着距离的,首先要求党员为民主奋斗并接受党外人士的批评,保证发展合作,并以此作为自己的首要的任务。”

从朱瑞和罗荣桓的上述报告和讲话可以看出,山东分局及其主要领导人对于“三三制”的观点是正确的,实行是坚决的。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实行“三三制”的阻力是不小的。

中共山东分局在省级政权中坚决实行“三三制”。在1943年8、9月间举行的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议员大会上,通过了超过“三三制”的共产党员参议员17人、候补参议员8人辞职,同时补选了缺额的党外民主人士。这一行为,为全

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权的“三三制”建设，树立了楷模。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十大政策之一是“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设。为贯彻中央指示，山东分局于10月10日做出了决定，其中要求：“贯彻民主建设，切实实行‘三三制’，还应引起各级党的注意。在明年阴历正月，无例外地进行拥政爱民与拥军运动，同时完成各县参议员与各地区参议员的民主选举，并建立‘三三制’的参议会，选举行政委员。各级党应根据省参议会通过的八一纲领、黎玉同志的施政报告及参议会大会决议，及省行政委员会最近宣布的半年施政计划，领导政权中党员贯彻之。”这里说的八一纲领，即山东分局于1943年8月1日通过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其中关于“按照新民主主义原则，加强民主建设工作”的第一条就是实行“三三制”。中共山东党组织的代表向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议员大会建议对八一纲领请予讨论通过，作为山东抗日人民今后共同努力的方针。大会通过了这一纲领，使其成为山东人民以后坚持抗战、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具体方案。这里说的黎玉的施政报告和参议会决议，即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黎玉于1943年8月20日在省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议员大会上的施政报告和大会决议。报告中说，“‘三三制’是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适合于敌后山东的，但还没有彻底完满的实现”。报告提出今后要切实掌握“三三制”，健全民主制度。议员大会同意报告的全部内容。这里说的半年施政计划，即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于1943年10月1日发出的训令《努力实现政府工作半年计划》。毛泽东十分重视包括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各抗日根据地执行十大政策的情况，于1944年7月28日亲自电示各根据地主要领导人“调查和答复十项问题”。其中一项就是“‘三三制’的推行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倾向”。8月12日，罗荣桓和黎玉复电毛泽东，第一项是关于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执行“三三制”的问题。毛泽东阅后于12月25日致电山东分局，称“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后来又称赞说“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

实行“三三制”的目的是实现民主政治。这对于第一次在局部区域内执政的中共山东党组织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实践证明，中共山东党组织不但较好地实行了民主选举政权，而且较好地实行了政权人员构成的“三三制”，在推进民主政治的游泳中学会了游泳。

政府施政：脱出人治，保障人权，初步实行法治

敌后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如何施政？是人治还是法治？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又一个重要问题。1940年8月之前，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在施政中基本无法可循。1940年8月公布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1943年8月对《施政纲领》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前者规定，“整饰司法，保障人民一切抗日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武装之完全自由”。后者规定，“保障一切抗日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之自由，保障一切抗日党派、抗日团体之政治自由及合法权利”；“保障人权”；“健全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贯彻法治精神”。纲领，就是旗帜。两份纲领的先后公布，就举起了依法施政的大旗。

实行法治，首先要有法制，即有法可依。1940年8月《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公布之后，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即依据抗日、民主这一总原则和《施政纲领》，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和条例。从1940年8月至1942年4月期间，制定了总则类9部。从1942年5月至1943年2月期间，制定了民政教育、司法方面的法规7部。从1943年3月至1943年7月期间，制定了民政、经济建设、司法方面的法规17部。从1943年8月至1945年8月两年期间，制定了各级参议会和各级政府组织条例，各级参议会参议员选举办法，各级工商局组织条例，婚姻、子女继承以及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20部。这些法令、法规、条例，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经实际执行，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是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

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11月11日由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通过并公布施行的《人权保障条例》。这个《条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条例》是由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李竹如组织起草的。

《人权保障条例》，共 12 条 597 个字。其首条开宗明义阐明了制定本条例的宗旨是：“发扬民主，动员全民参战，贯彻法律保障人权之真精神。”其第二条规定了人民群众专制制度走向民主制度的基本条件：“凡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职业、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政治上一律平等。”其第三条规定了人民群众享有的四项权利：“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其第四条规定了人民群众享有的四大自由：“身体与抗日武装之自由；居住与迁徙之自由；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与通讯之自由；信仰宗教与政治活动之自由。”其第六、第七、第八条规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和拘禁者，其执行逮捕或拘禁机关，至迟应于 24 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对人民因犯罪嫌疑有逮捕之必要者，非持有逮捕状不得逮捕之，县以上之政权机关，团以上之军事机关，有签发逮捕状之权。”“区、乡、村政权，各群众团体，除对现行犯及涉有重大嫌疑而有逃亡之虞者外，不得径行逮捕或拘禁。”其第九条规定：“凡经判处死刑之罪犯，非经主任公署批准后不得执行，若无主任公署之地区，须得专员公署之批准，县政府不得径行执行。”其第十条规定：“凡各级公务人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惩戒外，应负刑事民事责任。被害人就其所受损害，得依法律请求赔偿。”

从今天的民主与法治的视角审视 67 年前的《人权保障条例》的基本内容，可以说其至今还在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其第二、第三、第四条所规定的国民“在法律上、政治上一律平等”，有“选举、罢免、创制、复议”四项权利，有“身体与抗日武装之自由，居住与迁徙之自由，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与通讯之自由，信仰宗教与政治活动之自由”四大自由，是保障人权和实行民主政治的



1941 年 1 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

最基本的内容。特别是“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与通讯之自由”的规定，使人民群众享有表达的自由。这一规定极为重要。如果人民群众没有表达的自由，哪还有什么人民主权？！如果没有人民主权，又哪有民主政治？！此后的 1948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宣称所有人都具有包括上述内容的权利，政府不应任意剥夺。其第六、第七、第八条关于对犯罪嫌疑人的逮捕、拘禁和对死刑犯执行的规定，足以显示在反侵略战争的严酷环境中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难能可贵。其第十条关于对执政的公务人员违法侵害人民自由和权利的惩处的规定，更是难能可贵。

同时，也应该指出，《保障人权条例》的基本内容，虽然反映了当时决策层的认识水准，但并不说明当时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各级领导层也达到了这个认识水准，因为执行过程中的艰难曲折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制定这一条例的原因之一，是吸收了此前一年湖西地区制造“肃托”假案，无辜逮捕五六百名、杀害三百多名党、政、军干部的教训，可是这一条例颁布后并没能杜绝其它地区继续制造“肃托”假案、滥杀无辜。泰山地区在 1940 年 8 月至 1942 年 2 月的所谓“肃托”中，错误地逮捕了 250 多名、杀害 160 多名党、政、军干部。山东解放区在后来的土地改

革中又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践踏法制、破坏人权的事件。历史进程告诉人们：保障人权，在中国是多么的不易，是需要多代人的艰苦努力。

实行法治，只做到有法可依不够，还必须做到有法必依。在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重视检查、督促，保障法令、法规、条例的执行，并重视根据实践情况对法令、法规、条例的修改。中共山东分局要求“采取各种方式来检查、督促、保障政府施政纲领与法令政令政策的施行，与一切违犯政策法规之行为作斗争，并执行法令制裁”。各级参议会定期听取、审议同级政府的施政报告，并特别重视听取、审议如何执行《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1943年9月6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议员大会在听取、审议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施政报告后，决议通过各级参议会定期对同级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定期检查有关法令、法规、条例的执行情况，并督促其依法施政。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战时行政委员会)注意根据法令、法规、条例的执行情况及时加以修改。例如，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于1940年11月制定、公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施行一年半之后，经调查研究，进行了修改，又于1942年5月公布了《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和《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并且新制定、公布了《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条例》。这三个暂行条例，为全面地、深入地开展减租减息增资运动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法律依据。此后，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增资运动依法健康地开展起来，从而极大地改善了广大基本群众的民生，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政治的进程。

建立司法机构和司法制度，开展司法工作，是实行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于1940年8月成立之后，逐渐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工作提上日程，从1942年5月开始比较系统地建立司法工作。首先，建立各级司法机构，采取三级三审制。其组织原则与工作方针是：采取维护各抗日阶级与保护大众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司法，并为适应敌后环境，采取简便手续，强调调解作用。其组织特点是：司法与行政机构合一。其工作方针特点是：执行宽大与镇压相统一的政策。其次，建立新的司法制度。其主要有取消一切诉讼费用；改订诉讼程序；厉行责付保释，严

禁滥押犯人；厉行调解和建立调解委员会；严惩诬陷；取缔恶俗；严格审级，厉行判决批答制度；建立复审制度。再次，根据新的司法制度展开具体工作。据统计，在组织机构方面，到1944年底，整个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内，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战时行政委员会)设立了高级审判处，有的行政主任公署设立了高级审判处分处；五个主任公署区共设有56个司法科，有133名在职工作人员。在具体工作方面，办理了大量民事和刑事案件。例如，1943年一年，滨海专署共计办理刑事案件37起，其所辖各县共计办理民事和刑事案件3216起。其同年处理的民间纠纷，加上调解成立的纠纷，远比上述数目大。总之，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司法工作初步确立起来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府，在施政中逐步做到有法可依，而且有法必依，特别是制定法规、保障人权，标志着开始脱出专制政治的人治，初步实行民主政治的法治。

推进民主：广泛开展宪政与民主运动

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中，还先后开展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宪政运动和民主运动。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为了举国团结抗战，热烈要求实行宪政。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代表民意，作出决议：“建议政府定期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1939年国民党举行的六中全会为了回答国民参政会的提议，通过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此后，各抗日根据地都成立宪政促进会，开展宪政运动，推动宪政的实现。

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什么是宪政？毛泽东说，“就是民主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说，“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

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宪政概括为民主政治、新民主主义政治，并指出新民主主义政治是既不同于欧美式也不同于苏联式的一种民主政治，这无疑是一种全新的观点。但是，他没有指出宪法是为社会治理确立最基本的准则，也没有指出宪法是决定如何限制政治权利以及如何以一种最平等的方式平衡多数人的需要和个人及少数人的权利，这反映了他认识上的不全面性。

在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党组织以毛泽东上述观点为指导，从1940年春开始，成立了全省宪政促进会和各地宪政促进会，领导推动宪政运动。这期间，实行了山东国民代表大会试选，以试选代表作为正式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山东代表，争取宪政的实现。同时，全省宪政促进会针对国民党有关宪政的错误指示，提出了六点商榷意见，通电全国，并派出代表团到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宣传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宪政运动。

中共山东党组织认为，在抗日根据地建立各级参议会，是实行宪政的基础；建立民主政府，是实行民主、实施宪政的实际的中心的问题。当时提出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又是最高权力机关，这在今天看来，就是一院制的议会。1940年7、8月间山东省联合大会的召开，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宪政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联合大会举行期间，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其《政治报告》中专门报告了宪政运动：“山东之宪政运动开展之迅速与普遍，比之华北其它各地均不稍让。此次联合大会的召开，山东临时参议会、战工会、各救总会的选举，这是大家亲身经历的，是第一次的真正民主平等的选举，使真正民意得申，使抗战的领袖，进步的士绅，抗战的青年、妇女、工人、农民、文化人的优秀领袖，都被以民主的方式选出来作人民的代表；共同主持山东的军事、政治、经济、民运、文化等各种抗战事业。这是全国的创举、华北的曙光，这是山东民主斗争的空前奇花与空前成绩。”山东省宪政促进会秘书长李澄之作《宪政与民主》的报告。此后，宪政运动在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开展起来。

国民党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国民代表大会

也没有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自1941年至1943年上半年，是各抗日根据地最为困难的时期。就是在极端困难的局面中，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也没有停止宪政运动，而是深入开展宪政运动，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1943年冬，国民党第十一中全会又决定于抗日战争胜利一年后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这一表示再次引起了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各地的讨论。

1944年5月6日至7日，为督促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省临时参议会、省宪政促进会暨省妇女宪政促进会联合举行宪政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和政府、军队、地方代表，还有朝鲜独立同盟和日本反战同盟代表。与会代表联系孙中山倡导的民主思想、国民党专制独裁及其宪政的虚伪，联系抗日民主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发展与成就，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共山东分局任秘书谷牧发言说，“今天座谈宪政的意义，就是要促进宪政运动使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起来”。“我们对于宪政问题的态度，宪政就是民主政治，共产党、八路军从来都主张中国应当实行民主政治，敌后的抗战实践证明了抗战和民主是分不开的”。“我们看：同样的敌后环境，为什么我们就能在敌后坚持了斗争而且取得了胜利，而我们的友党友军就不得不转移到大后方去抗战呢？”“这就是因为我们办了民主，我们替老百姓办了事，维护了老百姓的利益，而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而他们不主张民主，不办民主，甚至反对民主，破坏民主，反民主就是反人民，所以老百姓就不拥护他们”。谈到实现宪政的条件时，谷牧认为，第一是“给人民以民主的自由”，第二是“开放党禁，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的问题”，第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在座谈会上，黎玉作了《宪政运动的现在与将来和我们的责任》的讲话。他以敌后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为例得出结论：抗日战争期间“是可以实现民主的”，“只要有诚意，就能实现民主”。座谈会指出，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保证抗战胜利。座谈会通过三项提案：把宪政运动扩大到各地去，造成广泛的宪政民主运动热潮；向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提出立即实行宪政的三个先决条件，即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国大代表选举法；重

选国大代表,早日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扩大民主思想宣传,加强民主建设,巩固根据地广大人民的团结。座谈会后,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宪政运动更为广泛地、更为深入地开展着。

伴随着宪政运动的开展,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又开展起民主文化运动(1941年7月至1944年4月)和民主运动(1944年4月至1945年9月)。

中共山东分局于1941年7月4日决定在抗战第五年开展十项建设运动,其中要求:“加强群众政治教育与新闻报道,使多数人民知道下列几件大事:甲、什么叫抗日民主政权,为什么要实行民主选举。乙、为什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我们应如何去争取胜利。丙、为什么投降派与反共顽固派必然要失败。丁、创造山东抗日根据地与坚持山东抗战有何重要意义。”这实际上就是民主文化运动的开端。不久,由于残酷的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以及反对顽固派剧烈的军事、政治磨擦,民主文化运动的开展受到影响。1943年春天之后,随着对敌斗争和对顽反摩擦斗争的逐渐好转,民主文化运动的开展有了更大的进步,主要内容是反对各级政权,特别是区、村政权中的官僚主义。

进入1944年,随着八路军山东部队攻势作战的展开,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扩大,中共山东分局于4月决定开展民主运动。民主运动与减租减息增资运动、大生产运动成为互相促进的三大运动。

民主运动的中心内容是:第一,在中共党内和党外深入开展民主教育,以使党员和人民了解民主政权的性质、重视选举工作,并在党员中纠正宗派思想,克服包办一切、独断专行的作风。第二,改选县及行政区的参议会、县及行政区的政府。第三,将改造村政权作为经常性的任务,特别是民主制度和民主作风的建设。第四,改造中共党组织对政权的领导,纠正党出头计划、布置一切事务,甚至包办的作风。

中共山东分局在1944年的最后三个月结合整风运动开展了民主检查运动。这在山东党内是第一次。这次运动,以检查领导为中心,全面地彻底地暴露了存在的官僚主义、包办代替、脱离群众、宗派主义残余等问题,经过自我批评和相互

批评,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思想教育,收到了较有成效的结果。特别是在民主检查运动中,启发自由思想、发挥平等精神、普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观念、制度、方法,对于以后党内的民主的思想、制度、作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于1945年5月发出了开展民主运动的训令,不久,又对民主运动的宣传教育专门发出指示。训令指出,“深入民主教育,加强民主建设,为全国树立楷模,以促进民主联合政府的实现,并团结敌后人民,进一步扩大解放区,布置反攻阵地,实为刻不容缓之举”;决定“自夏季起,开展全省性的民主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改选行政区和县的参议会以及政府,深入改造村政权。在宣传教育指示中指出:对于干部的教育,重点是提高他们对民主运动的认识,克服他们对民主运动无信心,不相信人民,不相信民主,怕民主的倾向。对于群众的教育,重点是启发他们认识民主力量,提高民主热情;了解公民权利,提高管理政治的觉悟;了解人民和参议会、政府的关系,积极参政。民主运动虽然开展不太长时间即进入了抗日战争大反攻阶段,但依然取得了较大成效。

中共山东党组织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的宪政运动和民主运动,产生了两大成果,一是普及了宪政、民主知识,推进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二是唤起了社会底层力量的觉醒,争取了社会中间力量的同情,得到了他们的拥护,提高了公信力。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至今已经七十年了。抗日战争胜利,也已经六十二年了。回顾与研究六十多年前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建设,特别是政权的民主选举、政权人员构成的“三三制”、政府的依法施政、广泛开展的宪政民主运动,真是留给了我们太多的经验、启示,也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这是一份用鲜血凝成的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科学地去继承。一个不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切实地,而不是敷衍地;真诚地,而不是虚妄地从自己的历史中,也从其它民族的历史中汲取智慧,推进政治民主化,就一定能够实现民主政治。

(责任编辑 萧 徐)



顾 骧

从对一篇小说的评价说起

年前，从维熙兄从文海中作了一番钩沉，重读了胡乔木，引发了我对这位前辈乡贤的若干回忆与思考。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1985年早春，文坛上流传一则消息，说我顾某人给胡乔木写信，向他推荐从维熙新作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这种子虚乌有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传到我的耳中，令我莫名其妙。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那时正是乔公一生春秋鼎盛，身居中央意识形态总管的高位，手持尚方宝剑，一篇《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宏文铺天盖地，不仅《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先后全文转载，而且书印三千万册，钦定为高校学子必读教材。一时吹谏之风蜂起，什么“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理论上重大突破”，反正高帽子不必花钱。在此时，我若是真有上书言事之举，不是明摆着趋炎示好么？而这时，正是周扬同志身卧病榻，我的好友若水遭整肃受查办之刻；若传言确凿，我的人格何在？人品可堪？

事情不难弄清楚，一个电话给维熙，就把经过弄明白了。正像维熙在这篇文章中所述，乔木同志给他写信，谈读了他的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的感受，还特意注明，读作品多少也是由于我的评介引起的。乔木同志写于2月16日的原信，在维熙文章中作了披露：“维熙同志：好久没有看过小说了。近来因身体欠佳，偶然翻看刊载在小说选刊第二期你的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这多少也是由于顾骧同志的评介），竟然一口气读完了。你的作品给了我关于‘右派分子’劳动生活的许多知识，你对小说中两个主角的刻画和在他们的故事中所赋予的崇高意义，都很使我受益。……”乔木同志是读了我公开发表的评

介文章，但他语言简约，理解上有可能发生歧义。“评介”也有可能是面述，也有可能函荐。误会也非无因。事情既然清楚了，我就再也未把它当一回事。不过，乔木同志对维熙这部作品的称赞，颇耐我思索。

我这篇评论文章是如何写出来的？

那时，阎纲兄主持《小说选刊》，他虽然无总编、主编的名义，但确实是里里外外，拳打脚踢一个人在经营，当然还有肖德生协助，后来分配来一位大学毕业生李敬泽打下手。一天，他给我电话，说刊物下一期拟选载从维熙新作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头题；准备同时配发一篇评介文章，要我来写。

我说，作品我还未读过呢。

他说，马上派人将作品送去。相信你会喜欢的。

以我与阎纲的默契，我应承了下来。他告诉我下一期刊物稿件已全部下厂，留两页三千字篇幅给我，三天内交稿，悬版以待。作品读后颇感意外。这部作品在价值判断上有严重问题，不是枝节上毛病。这部作品写两个“右派分子”在劳改过程中的恋爱悲剧。一个大学西语系学生，一个医学院学生，男的名范汉儒，女的名陶莹莹，一双“右派”，两个知识分子，在“大墙”内共患难，产生了生死恋情。但在二人被释获得婚恋自由之时，范汉儒却决然了断与陶莹莹的情缘。原因是获知陶莹莹被打成“右派”后，曾试图潜越国境，泅游界河。被范汉儒称为“受难的维纳斯”的陶莹莹，是一个忏悔的形象，她自认是犯了“叛国罪”，她是“叛国犯”。而范汉儒认为：哪怕是犯了杀人罪，只要改了，可以不计较；“唯独对于祖国，它对于我们至高无上，我们对它不能有一次不忠……。”陶莹莹万劫不复。这里作品将“祖国”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权力架构概念混同了。祖国是什

么？是生我育我的大地、山川、森林、草原、海洋，是久远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是与我们血脉相连、呼吸相通的生命摇篮，是乡亲邻里，是风俗人情，是幸福与痛苦，是回忆与梦想，它与我们生命每一根神经相连。祖国是历史范畴，是文化体系，是价值观念。祖国至高无上，对祖国的感情神圣。怎么能将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苛政、暴政的逃离与反抗，称作“背叛祖国”呢？既不是受外国指使而损害本国利益，也不是投靠外国而出卖本国利益，怎么能称作“叛国犯”，犯了“叛国罪”呢？“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氏遁入日人使馆，亦未闻后世史家称之为“叛国”。须知，人民受难之时，也是祖国蒙羞之日。怎么能将范汉儒乖常的愚忠，当作“崇高”行为呢？这种概念上的逻辑混乱，也曾为白桦兄带来灾难。他的《太阳与人》中不是有一句著名台词：“祖国我爱你，你爱我吗？”就被一些人抓住辫子，施以拳脚。后来我方知道，这里被人做了手脚。白桦剧本原文是“国家”，被刀斧手们调了包，改为“祖国”（拿来批判）。这也表明，长期“左”的思潮在我们心理上的淤积，自拔是何其艰难啊！我们这一代人免不了像胡风先生所言，浑身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后来维熙兄对这部作品已有反思，还写了文章总结。当时我犯了难，文章怎么写？推辞不写已来不及，那时通讯联络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一时找不到阎纲。交稿时间只剩下一天，文章不写，刊物必然要脱期。只好勉为其难，敷衍成篇。作品的问题点到了，可是观点不鲜明，态度暧昧，语言委婉，问题未说到位。我自认为这是一篇不好的文章，是一篇失败之作。在我后来所有的文集中都未收录，资料都未留存。可是我这篇失败之作却引起乔公对这部作品“崇高意义”的赞赏。更令我思索的是乔公对我这个小人物关注的目光。因为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件事发生。

在这之前不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白桦新作，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白桦真是有才啊，他愣是把一个老故事翻出具有现实启示价值的新意来。“卧薪尝胆”已成为一句国人皆知的成语，故事一再被收进中小学教科书，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戏剧家曹禺还写了一部《胆剑篇》，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激励世人。白桦续写了后半生的勾践，“破吴归”的勾践。勾践取得了胜利，

掌握了权柄，登上了至高无上的王位，就转而改变亲民政策而镇压人民。他杀功臣，囚禁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勾践可谓是中国“烹狗藏弓”第一人。勾践是历史上封建开国之君的艺术典型，从吴越春秋到天国春秋，有着一一条共同的历史轨迹。戏演出后，评论界、新闻媒体一片沉寂。有人担心，这又是一部攻击“君王”的戏，作者又是白桦，而那场批“苦恋”的硝烟还未散尽呢。白桦老兄啊，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一点不懂中国“国情”么？在中国是可以骂皇帝、骂君主的么？在有皇帝的年代，骂皇帝罪犯天条，杀无赦；在形式上没有皇帝而有总统、委员长、主席的年代，同样骂皇帝遭忌。不是早给你打过招呼：“劝君少骂秦始皇”么？哪怕你是中国头牌大诗人，也容不得你放肆。你难道不知道，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那场大戏，序幕就是批那个骂皇帝的海瑞开锣的啊！你自己被批的《太阳与人》（即《苦恋》），不就是因为“红太阳”上做了文章么？

在此期间，白桦、王蓓伉俪一同来京，我们几个朋友小酌相聚。席间，《戏剧报》编辑约稿，我一口答允。这是我自愿的，我已看了戏，这是一出鉴古知今难得的好戏。文章以《史笔·哲理·诗情》为题，发表在《戏剧报》上。抓影射，就像是高悬在历史剧头上的那柄达摩克里斯之剑，“文革”十年，从“海瑞罢官”到“三上桃峰”，“影射”与“文革”共始终，一提到“影射”，不免令人惶悚。抓影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索隐法，是我国封建时代从东汉的讖纬神学到明清两代的文字狱所惯用的方法。我在文章中还特意写了一段，在正常情况下，作家不应搞不科学的比附影射，随意剪裁历史；读者也不要牵强附会地寻找作家影射之笔。为了写那篇短文，我还翻阅了《国语》、《史记》、《吕氏春秋》等正野史籍，感到这出戏基本情节、主要人物都有历史记载的依傍，我心里有了底。我力陈古为今用与影射的区别。可是，我文章中吁请免抓影射的微弱呼声，丝毫也起不了作用。有政治嗅觉特敏锐者，从白桦的戏中闻到了异样的气味。有的人看到了文艺作品中颂扬圣主明君，则大放宽心；若是一旦捕捉到咒骂昏君暴君便会立刻竖起警觉的耳朵。南方某市以该市社科院的名义，向最高意识形态领导层递送了一份“简报”。（顺便说说，“简报”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

上世纪五十年间，“简报文化”连接着中国政治风云变化，常常是波谲云诡政治风云变幻的引发点。比如，被领袖称作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序幕、与林彪摊牌的1970年的庐山会议，是由那份“2号简报”，也就是“华北组6号简报”作为导火线的。在扳倒了刘少奇、林彪之后，又来敲打周恩来的信号，是那份被领袖斥为“屁文件”的1973年外交部《新情况》153期“简报”。)某市社科院的这份“简报”，用春秋笔法，摆了两方面材料：一方面是港台海外言论，绘声绘色论



胡乔木

述勾践是影射某某，以表达“简报”作者的“潜台词”，白桦是“恶毒攻击”，另一方面是“吹捧”言论，点了两个人，两篇文章。其一是我顾某人，另一是文化部艺术局长方杰，他的文章发在《人民日报》上，他是时任文化部部长王蒙的爱将。

乔木同志在看了这份“简报”后，发出的一句诘问：“顾骧也写了文章？！”我无法破译这句话的含义，因为我本人未直接耳闻。这是时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我的好友郝某某向我转达的。

乔公注视的目光，是前辈乡贤对我这无名晚辈的“关照”？

“红墙有幸亲风雨”

乔木同志是我同乡，而且是小同乡。

有些初见面的朋友，常常会问起我的家乡，籍贯。我则答曰：“江苏盐城”。对方往往会连带道出：“哦，与胡乔木同志是老乡。”我会立马跟上一句：不敢高攀，不敢高攀。我忌讳那种借名人以自炫的“月光效应”，但是与乔木同志是老乡一点不假。在我们家乡刚刚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时，我还是儿童团的年纪，就知道我们“盐城二乔”胡乔木与乔冠华了。乔木同志老家张本庄现属盐城市盐都区，乔冠华同志老家东乔村现属盐城市建湖县，我的老家现属盐城市阜宁县。一个地区，相隔不远，都是大户人家，扳手指头叙叙，说不定七拐

八拐，还有点沾亲带故呢。打我参加革命起，就听老一辈人说，我们盐城在共产党内有两位名人，两位才子：大乔木与小乔木，也就是后来人们通常说的南乔木与北乔木，不知为什么家乡人当时称之为大乔木、小乔木？是比照三国时代“江南二乔”，因与名人孙策、周瑜联姻，称为大乔、小乔而来的？乔木同志比乔冠华同志也就年长一岁，成名时间相近，可能乔冠华还略早几天于胡乔木。从1939年起，乔冠华以“乔木”笔名撰写的时事评论便已经风靡香港与南洋。毛泽东将“乔木”之名断给胡乔木的断名案，是否有点偏心？解放战争时期，我被调往范长江为校长、恽逸群为副校长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二期）学习，教材是华中新华书店编印的一本《新闻工作文献》，内收列宁论编辑工作，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等文章，此外，还收有胡乔木的一篇谈新闻写作要简短的文章，标题用了“短些，再短些”五个字。谈新闻写作要短小，配上这短得不能再短的标题，真是令人叫绝。我对这位乡贤的才华佩服不已。直到近四十年后，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我写过一篇文学评论文章，谈了些文学要与生活贴近等陈旧的话，用了一个“近些，再近些”的标题，自以为得意之笔，其实是从我这位乡贤的文章衍化而来。几十年了，这位乡贤文章在我心中积淀着。说实在的，以我浓厚的故乡情结，加上对“清华才子”、“苏北神童”二乔才情的景仰，打小就对大乔

木、小乔木怀有一种亲切的感情。

到了1951年，改了朝，换了代。那时朝鲜半岛虽然还在打仗，但国内战争基本停息，受了二十多年战争之苦的中国人终于迎来了四海升平。那时物价稳定，人民安居，吏治清廉，共产党的威信空前提高。适逢建党30周年大庆，《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胡乔木署名的《中国共产党的30年》文章，实际上是官定的简明党史，中共第一次正式公布的党史。五十年代，我在大学里讲授中共党史课程，这是基本教材。我那时在苏南一家报社工作，记得报纸用几个版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大概全国各地报纸都是这样办理的。这一下子胡乔木的大名陡地飚升。据说，这篇文章本来准备署刘少奇的名，是毛泽东决定把胡乔木推到国人面前，名扬四海。这篇文章以胡乔木署名倒也顺理成章，实至名归。不仅文章实际上由他执笔，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也是参与起草。我的这位乡贤，对他作为党史研究专家这点看得很重。他在语言文字、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方面均有造诣，而在中共党史方面着力最多。他在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职务时，自己填写的专长是“党史学者”。他被毛泽东相中，到了领袖身边，襄赞枢机，第一项任务就是协助毛编校《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两书（以后又有一本《六大以前》）为他打下党史研究的根基。这两本书非同小可。遵义会议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军事路线的错误，但是当时中央的政治路线呢？端出来火候不到，暂且按下不表。到了1942年，在陕北站住了脚，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内形势相对稳定，毛泽东要算总账了：开展整风运动。在这之前，党内高级干部学习党史，毛泽东端出了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政治路线问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问题。王明不干了，称病罢会。于是，毛想出一招：编书，口说无凭，有书为证。这一下子两条路线一目了然，大家信服。经过整风，经过“七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出来了，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最终正式确认了，“毛泽东思想”提出来了，“毛主席万岁”喊出来了，《东方红》唱出来了，毛泽东像挂起来了，一轮红日从陕北冉冉升起来了，一个对共产国际教条的神话打破了，另一则神话则影影绰绰地向我们走来。我的这位乡贤，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红墙有幸亲

风雨”（胡乔木自述诗句），伴君终身，厮守到老。他没有像陈伯达那样被抛弃，更不可比拟田家英维护人格独立而自全，甚至不似陈布雷受不了士大夫良知的煎熬而捐身。虽然君臣相处中，也有被冷落、被责备的时刻，不过夫妻过日子还有红脸的时候呢。“伴君如伴虎”的感觉，似乎在他身上难以察觉。（可参见《七十述怀》）

乡贤一生，若论其功绩，莫若协助领袖编纂、整理、出版领袖著作为最。其实，这与党史研究、著述是合二而一的事。过去不是说，中共党史就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么？他终身担任毛泽东著作出版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赢得了“党内第一枝笔”的美誉。过去人们读宏文四卷，那些对中国社会、阶级、历史的分析，对中国革命战略配置的构思，对中国革命走向的预测，尔后，无一不被验证，读其书几疑为神人。近年来，历史透明度与党内外人士知情权都略有增加，当人们从尘封的档案中，发现个别文章的原始发表文字与现公之于世的经典有较大出入，面貌有异时，怎不令人惘然。同时，也不由得不敬佩协助文字整理的“党内第一枝笔”真是“生花”的“妙笔”啊！

我中华第一枝笔是两千多年前的董狐笔。“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那如椽铁笔，秉笔直书，而绝不曲笔阿世的优良传统，赢得千古传颂。那是永世长存的“第一枝笔”。

五十年代初，我由江苏奉调北京，供职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是胡愈之，副署长有叶圣陶、周建人等几位。胡愈老是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民主同盟副主席。与出版总署并立的新闻总署，署长便是我心仪已久的乡贤胡乔木。那时，我心犹难甘的是，为什么在民主人士领导下工作，而没有在乔木同志麾下以亲警效？

年光淹忽，岁月如流，我得缘与乡贤结识已经是那以后二十多年的事了。1979年早春，我因参与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与部分文件起草工作，住颐和园。每日清晨，在公园未向游人开放之前，我们都喜欢沿昆明湖散步，呼吸新鲜空气，观宿鸟起飞，赏湖水波漾。一天，我正和冯牧同志同行，默涵同志陪乔木公迎面走来。默涵、冯牧都是我们起草组负责人。乔木公那时也住颐和园休养。默涵同志将我介绍给乡贤，还说了一句：你们是老乡。算是认识了。当时说了些什么

话，乡贤有何垂询，我是如何作答的，都不记得了。我这个人，凡是遇到位高权重者，本能地缺乏结交的热情与主动，潜意识存在着避免攀附之嫌。虽然乔木公已为我私心仰慕数十年。

那时，我对乡贤的敬佩日增。因为在那一年春天，他在中宣部碰头会上，提出对两个命题、论断要重新审议，实际上持否定看法，这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接着又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四次文代会报告时，对“文艺从属于政治”与“文艺为政治服务”被称作方向的口号、命题加以否定。这些已被证伪或早已过时的理论、命题、口号，如今已是明日黄花，人们不再理会了。而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这些可是“铁的法则”啊。乔木公之言，对我有着振聋发聩之力。

吾尊乡贤，吾更尊真理

历史曲折前进。思想解放运动大潮在八十年代初出现了回流。一种人们自己都承认说不清楚的标准，却被钦定为坚持的原则。凡不合自己口味者则被称作“异议”。这时，我的乡贤地位有了历史性变化。他不再是一名普通“笔杆子”、“秀才”，不再是“翰林学士”，而成为官居一品的军机重臣，意识形态的总管，坐上被西方神话中比喻的“魔椅”。他在“文革”中“批邓”的失误，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宽宥。最高领导人的宽大胸襟获得了乡贤“士为知己者死”的回应。老一代的领袖毕竟已经故去。进入晚年的乡贤，人生轨迹起了微妙的变化。

最早使我感到困惑的是他调转风向，对思想言论自由的非难。“文革”十年，专政十载。军师张春桥提出“全面专政论”的命题，颇得领袖晚年思想的精髓，也道出了“文革”的真谛。动乱结束，一股强烈要求批判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争得人的自由权利，首先是思想言论自由权利，像寒凝大地的春华怒放。人们从经典中找根据，从领袖言论中找合法性，搬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做文章。而这，确实是毛思想精彩之处。周扬一出山在社科院讲话，就强调“双百”方针，而每每都加注解“即两个自由”。我对周扬产生好感也是从此时起。虽然，“双百”方针不是法律用

语，而是政策，随时可放，也可收，有别于宪法规定的公民固有的自由权利。但是在历史过渡时期，人们为了取得思想的合法性，常常利用原有的语言外壳，如同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人们常常利用圣经语言，运载人文主义思想一样。八十年代初，乔木公多次在不同场合申述“双百”方针“不是唯一方针”，对“‘双百’方针是唯一方针”说进行批判。开始，我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有谁说出这样不通的话，认为“双百”方针是“唯一”方针？在文化领域，明摆着还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厚古薄今”……等方针嘛，靶子是谁？乔木公说话善于弯弯绕，后来我才悟出，乔木公是对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强调“双百”方针是意识形态领域一项“基本方针”的针砭。“文革”后我痛苦地反思我们祖国这一段曲折的历史，反思个人的人生道路，思想历程，努力从迷信、盲从、个人崇拜的网罗中挣脱出来，努力按照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行事。出于对祖国现代化事业的责任感，我自不量力地写了一篇题为“双百方针简论”文章，对我长期仰慕的乡贤一击。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否定“双百”方针是党的基本方针的观点与倾向，批评了乡贤的一些论点。文章发表在我的好友、评论家李子云主持的《上海文学》杂志上。当然人微言轻，很难说这样的文章能起到什么作用，它只是表达一个共产党人、一名文艺理论工作者的良知。同时，它也是表现了我对乡贤态度的变化。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吾尊乡贤，吾更尊真理。

以后我的这位乡贤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在一次中央召开的重要的全国性会议上，他作了长达三个多小时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报告，系统地论证了这个命题。乡贤高擎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旗，确立了他的角色地位。“自由”是每一个人天赋的权利，是当今世界一种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它可以堵住产生专制主义的门路。在共产党人的“圣经”《共产党宣言》中宣告，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这样一个人“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呜呼，将“自由”加上“化”，冠以“资产阶级”姓氏，就一巴掌打到敌对营垒里去冠冕堂皇的大反违反了。悲夫！乡贤迈出了危险的一大步。不是说

乡贤个人处境有什么危险，我是指这对中共，对国家、民族。1990年“8·19”事件以后，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有着1500万党员，领导世界上一个超级大国的共产党——苏共，转眼间曲终人散，垮台了。这是20世纪一件历史性重大事件。它的原因，惹起人们议论至今，众说纷纭。它有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必然因素、偶然因素。有些看法甚至互相对立。其中，作为当事人、历史见证人，现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的沉痛反思颇受世人重视。他认为苏共亡党最基本原因是三个“垄断”——即对思想言论垄断的意识形态体系与对权力垄断的政治法律体系，对财富垄断的特权体系。殷鉴不远啊！

紧接着一场震惊海内外对“人”的批判爆发了，“文革”结束后一次大规模左倾思潮回潮了，一场不叫运动的“运动”重现了。我们的乡贤与另一位意识形态的大腕人物一起，执掌帅印，推涛作浪，掀动了名曰“清污”的批判“异化”与人道主义的风暴。详情且不细说，请参阅拙作《晚年周扬》一书。应该说，以1976年“清明”天安门事件的民主运动为序幕，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起始的20世纪中国继“五·四”以后的另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主潮是人的重新发现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现，是人道主义的复兴。不同于过去长期被阉割、歪曲，“掐头去尾”的马克思主义，人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是围绕着实现崇高的人道目标建立起来的。人道主义作为有数百年历史的欧洲一种社会思潮，有各种流派、学说，众说纷纭，可谓一言难尽；但它的基本要义却可以一言以蔽之，即关于人的价值学说。是把人与人的价值放诸首位的观念。是关于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幸福、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责任等的学说体系。用一句大白话说，即要将人当人来看待。十年“文革”，十年“全面专政”，“神道”沉重，“兽道”施虐，“人道”泯失。用《白毛女》一句唱词就是“把人变成了‘鬼’”，新时期到来，人们要“把‘鬼’变成人”。于是从1979年起文化界、学术理论界、文学艺术界兴起了“人性与人道主义热”。这是人民群众从内心发出的对“人”的呼唤在理论上的表现。我在80年发表的《人性与阶级性》一文，从理

论上给长期被冠以“修正主义”的“共同人性”说正了名。当周扬在1983年的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中，举起“人道主义”旗帜，并承认他自己过去批判“人道主义”与“人性论”的“错误”，这就不仅是他个人的忏悔，也应看作是老一辈共产党人、从战争中走过来的革命者，在这个问题上与过去错误决裂的勇气，与时俱进，面向未来的坦荡胸怀。这是九十年代后出现的“两头真”现象的先声。全民上下自发性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热”遭到了乡贤等二位的当头棒喝。乡贤写出了《论“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精心之作。这一篇批“人道主义”与前述一篇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两篇宏文，无可挽回地证明了他在一场伟大的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作为一位理论家的角色、作用，他在历史新时期的历史位置，他晚年的悲剧。在20世纪最后一场新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中，我的乡贤，在“自由”和“人”的价值论这两个重大理论问题上，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有违于时代潮流，有逆于历史前进方向。而他是管领意识形态的人物。乡贤不是不承认任何意义的“人道主义”，他还自称是“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他主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而这“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只能容纳被“改造”了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伦理道德范围的作用。他断然否定“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提法，他断然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包含人道主义，他断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与人道主义根本对立，因为“人道主义”是唯心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论，最核心的是人的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既需要对历史的认识，也需要对世界的价值评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怎么能与价值观不相干呢？当乡贤网开一面说马克思主义可以在伦理道德范围内容纳“人道主义”时，只给“人道主义”留下一块有限的地盘；当他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人道主义根本对立时，关于人的价值学说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最优秀传统之一完全被排斥在马克思之外了。乡贤完全否定人是马克思主义出发点，说这是抽象的人性论的人道主义。他把“人”与“社会”关系对立起来，哪怕你说的是社会的人，实践的人。饭要一口一口吃，话要一句一句说。可是，只要你一张嘴说“人”，就是“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而他们理直气壮地批

的是“抽象人道主义”而非全部的人道主义！他就是这样“热烈的人道主义者”！

问题还不在于观点，“左”的观点并不可怕，怕的是“左”的观点与权力结合。数十年间，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症结在此。在天津，我们协助周扬同志起草那篇《关于马克思主义若干问题的探讨》报告时，在准备谈“人道主义”一章尚未动笔前，我提醒周扬同志说：“在这个问题上乔木同志有不同看法。”周扬不以为然地说：“有不同看法可以讨论嘛！”可是以后发生的事，我完全没有料想到，饱经沧桑的周扬大概也没有料到，事情居然闹得那么大。意识形态领域对异见上纲上线，采取高压手段整人的一套，“似曾相识燕归来”了。作为人道主义思潮的代表性人物周扬、王若水被选定作为惩治的靶子。培根曾说过，“真理不是权力的儿子”，而偏要用权力来垄断真理的仍有人在。在周扬的那篇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乡贤与另一位意识形态领导人物二人联手，打算以“违纪”的罪名，以“红头文件”形式，采取组织手段对王若水撤职、对周扬责令检讨的处分。只是在胡耀邦阻拦之下，才未能实现。这大概也是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而被罢黜下台的罪状中的一笔吧？！之后，我见证了一场精心布置的对周扬的批判围攻。作为列席者，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平常讲话轻声细语、温文尔雅的乡贤，在会议上声色俱厉地呵斥周扬，像爷爷训孙子一样。我惊异乡贤怎会如此暴戾？难道就因为官大一级就要压死人嘛？！在会上，周扬孤身独持己见，凛然不屈。周扬的形象在我心中高大起来，而乡贤在我心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尊敬的形象坍塌了。

到了这年秋天，随着西风起处，在乡贤与另一位宣传大臣策动下，一场以批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风暴，达到了巅峰。对“人道主义”与“异化论”上纲是“政治问题”，戴上“诱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不满”的大帽子，发展到了以组织行为开展了一场“清污”运动。结果是周扬被迫在全国人民面前作留点面子的“检讨”；以至数年后郁郁而终。王若水受到党内除名、撤销职务的迫害。“板凳要坐十年冷”，我在那意识形态领导部门，坐了十年的一半、五年的冷板凳，看来是从轻发落了。

乡贤发表了那篇宏文以后，以为大获全胜，凯歌行进了。然而历史无情。事情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如今，谈“人”色变的的日子已不再。“以人为本”成为举国上下的无比强音，“以人为本”的观念已融入主流意识形态。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权”观念，已被合法承认。“保护公民人权”已写进国家根本大法，写进中共党章。虽然，纸上写的，嘴上说的，还不等于实际做的；但与25年前相比，已经又是一个天下了。我的乡贤若九泉有知，会作何感想呢？

那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在25年后，它的意义远比之当初看得更清楚了。它不仅是总结过去，它是全球化形势下，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社会价值标准的确立与置换问题。将人的价值放诸首位，这是万事之本，没有这一条，什么“改革”、“开放”，什么“小康社会”，什么“和谐社会”，什么“科学发展观”，一切的一切都谈不上。

好像读过一篇王蒙兄写的回忆文章，记不清是回忆胡乔木还是周扬，记下了这么一个小场景：一次会议，周扬坐在主席台上，胡乔木在一旁悄悄地对人揶揄他：“还颇有点日丹诺夫气派”！说到日丹诺夫，无论是胡乔木还是周扬，好像都未曾谋面，但是肯定对于他们俩人都有深刻影响。何止对他们二位，对于一代中国文学艺术界人士都难以忘却，因为“进城”前后，文艺界曾学习过日丹诺夫《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日丹诺夫的作为，恐怕也是尔后中国文艺界历次大批判运动的渊源之一。二战后，日丹诺夫是苏共第二号人物，也是苏共意识形态的总管。他用苏共党的决议形式，对两本文学杂志加以惩治，粗暴地批判作家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和诗人阿赫玛托娃，用污秽语言辱骂这位女诗人。他大批所谓“世界主义”、“颓废派”，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领域横扫一切。日丹诺夫是斯大林生前绞杀文艺的最后一名刽子手。虽然有人认为日丹诺夫这样做另有隐情，他还是懂文艺的，他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都曾有好感和照顾；他是讨好斯大林，看斯大林眼色行事。若是果真如此，日丹诺夫也许显得更卑劣。我想，若论地位与影响，胡乔木与周扬不知哪一位更有资格被称作“中国的日丹诺夫”？周扬官运乖违，几十年

一贯制,从新中国一诞生到他离休,始终是“副部长”,只是最后定了一个“正部级”顾问作为安慰。

八十年代末,乡贤去了一趟美国,到大洋彼岸访问,在各地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问得多好啊,这由胡乔木先生嘴里讲出来能不觉得怪异么?原来乡贤是说给洋人听的,你们不是说我是“左王”么?!

人性的本真与异化·故乡·时代

乡贤毕竟是文人,他有和文人相通的一面。八十年代,他和不少文化界人士接触,礼贤下士,嘘寒问暖,扶危济困,延医送药,颇有诸多感人之处,年届高龄,怀旧之情日增,与当年同窗季羨林、钱锺书等时有交往;他曾登门拜访过施蛰存、张岱年、冯友兰、朱光潜等名家;为聂绀弩诗集作序,为沈从文解决住房困难;他与文学界后辈王蒙、陈祖芬等结为忘年之交,甚至枉驾琴岛看望青年诗人舒婷而吃了闭门羹。凡此,显示了一位蔼蔼可亲的老人形象,自然流露出人性本真的一面。乔公去世后,一些人写了悼念文章,缅怀彼时的美好情谊。可是,同样是知识分子,若是被他视为“异己”者,触犯了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利益,作为政治家,与中国以往历史上言论权力拥有者一样,便会对之进行压制与打击。笔不留情,手也不留情。王若水是乔公颇为赞赏有才华的理论家,但是他不服于压力,在乔公宏文发表之后,仍然写出《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答辩文章在港岛发表,便被追查与“地下组织”有无联系,最终被革出教门。一位正直的新闻界元老胡绩伟,只是坚持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的科学结论: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看法,被胡乔木蛮横地指责为“主张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将党性与人民性对立起来”,对胡绩伟进行组织处分,“批一通,赶出门”。至于后来胡绩伟发展了自己论点,基于人民至高无上,人民高于党这个常识,提出“党报的人民性高于党性”这个论断,则更难为乔公忍受,在“清污”中,对王若水、胡绩伟“收网”,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全国典型来批判。

对于故乡,对于盐城,乡贤有很浓的情愫。北京有一个“振兴盐城北京咨询委员会”,由曾在盐阜地区工作过与盐城籍人士组成的咨询组织,乡

贤作为党的领导人屈尊俯就“名誉顾问”,而且实际参加活动。我也忝列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有时见面,出于对长者的礼貌,只是远远颌首。乔公将他的部分图书捐赠盐城市图书馆。乔公逝世后,盐城市图书馆在其广场建立了乔公的塑像,1997年举行了揭幕仪式。我这几年虽然有多次回乡的机会,但至今仍未有缘前往瞻仰。今年是我母校盐城中学建校80周年,去年底母校负责人来京与在京校友商量校庆活动事宜,我建议他们可仿效国外一些学校在校园内建杰出校友的塑像。乔冠华无疑是我们校友班头,若是在校园中建他的塑像,我乐观其成。当然,这位小乔木也非完人。在他的夫人章含之笔下与他战友我尊敬的张颖大姐笔下的晚年乔冠华,颇有差异。不过以我所见,除了1973年毛指派江青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恩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将小乔木“扩大”进来,乔在会上究竟讲了些什么,讲到何种程度外,其它事,在那种高压形势下均可以理解。小乔木对他在会上的发言,后来一再向总理认错,作为终身受总理器重、培养的人,这一点在道德上有亏。但究竟说了些什么,章含之、张颖都没有掌握,看来只有等将来档案解密了,这一点不妨存疑;但乔冠华毕竟是性情中人,他那张著名的“乔冠华在联合国大笑”照片,很有感染力。我是喜欢小乔木这位学长的。

淮东大地,平畴千里,湖河纵横,蒹葭苍苍。春临,杜鹃声声,金灿灿油菜花无际无涯;入秋,渔舟唱晚,“芦花翻白燕子飞”。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平静。魂兮归来,“盐城二乔”在外面绕了一圈,如今倦游归来,大乔木塑像矗立在盐城图书馆广场,小乔木故居在东乔村开放。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都是热血青年,奋发有为,走出故园,在大时代中发挥了他们聪明才智,报国为民,建功立业,这是时代的造就。到了晚年,大乔木在那历史转折关头的人生高位上,却对时代潮流起了若干负面作用。作为晚辈,我对这位乡贤不胜惋惜与感伤。这同样是时代局限性的投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惰性力太沉重了,太深厚了!

(2007年12月草于北京,2008年1月修改于洛杉矶)

(作者系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作家、研究员)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我的父亲马洪

马雅

大风起兮云飞扬，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现在风住了，浪止了，爸爸也走了。

父亲马洪，山西定襄人，原名牛仁权，又名牛黄，意为牛中之黄，代表了他一生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到底的宗旨。马洪这个名字，是延安时期主管组织部门的陈云给起的，预备日后派往白区做地下工作。

爸爸小时候家里穷不能上学，但他无师自通，备受乡亲的瞩目。村里的开明绅士牛明轩先生请他誊写县志、宗谱，换作学费，爸爸才得机会进了学堂。刚上到三四年级，校长认为爸爸已有资格毕业，随即聘他为高小教师。乡里视他为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又进一步把他举荐到同蒲路铁路局工作。在爸爸的童年时代，我奶奶给了他最大的关爱。她每天天不亮就起身为爸爸烧水做饭，站在路口目送他上学。后来爸爸奔赴延安，杳无音信，奶奶忧困交集，早早过世。而爸爸在出走之前，每夜仍在家中为牛先生抄抄写写，以挣钱赡养父母。多年后我上了小学，阅读“少年笔耕”，引起爸爸的关注。然而只有和老家的亲戚们交谈，我才对爸爸的这段往事有所了解。

1936年，爸爸去了同蒲路。当时日本侵华，国难危难。“牺盟会”（山西爱国牺牲同盟会）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爸爸与其他爱国青年，包括工人和学生，为抗日救国，参加了“牺盟会”，并参与筹建总工会。不久，他便与同会的游云、游军两姊妹过从甚密，后来又与游军有了恋爱关系。游军出身商人家庭，爱好文学，常常一人躲在家里的阁楼上入迷地读小说，多愁善感。三十多年后，到了文革初期，我也爱读外国的古典著作，感时伤世，爸爸对我有告诫，所以提起旧事。爸爸与游氏姊妹等同去延安。由于爸爸出身贫苦，又参加过工运，属于根红苗壮，成为组织上重点的培养对象。游军则因成分不好，又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情调”，

被组织上视为与我爸爸不般配。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被统战的地方军阀，不久便抑郁病逝。我记得我们家长年有一株绿绿的细致的云竹，爸爸亲自给它轻轻淋水，我小妹的名字也取为“筠”（军）。

共和国成立后，我家从热河搬到沈阳东北局。我大概三四岁，已略记二三事。记得大约是给干部放内部电影，同声翻译，是一部苏联作爱国主义宣传的历史片，演的是库图佐夫如何大战拿破仑。爸爸告诉我，拿破仑是一个大英雄。我当时已说得上几个洋人名字，比如列宁、斯大林，可这拿破仑听起来就跟别人不一样。

1953年爸爸调到北京国家计委，爸爸妈妈把我送进北海幼儿园。于院长刚从苏联留学归来，我应在那里受到最好的教育。因为是供给制，我家带去的衣物全被退回来了，我也想和那些退还的东西一起跟父母回家去。爸爸知道我是舍不得让他们走，于是带着我第一次逛了北海公园。那是一个大晴天，刮风，还挺冷。爸爸头戴鸭舌帽，身穿深蓝色的呢大衣，两只手插在大衣兜里，柳条在他身后的春风中飞舞。我记得清清楚楚，他站在那里，身材高而挺拔。

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宣布高岗、饶漱石为“反党联盟”，爸爸被定为“高饶集团”的“五虎上将”之一。爸爸出事后，被发配到北京建筑公司当副经理，一段期间不准回家。他住在一间空空荡荡的大屋子里，一扇布帘把房间隔为两半：里面一张硬硬的木板床，外面一只办公桌，上头堆满书报。我去工地看他，他怕我闷，借来《三国》、《水浒》、《红楼梦》等好多小人书。于是他读他的文件，我看我的小人书，几小时的探望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随后我迅速升级，开始阅读这些名著的正本。

爸爸在公司期间，单位组织去了一次周口店。爸爸和我十几个人站在一辆小卡车后边，很挤，加上近百里山路的颠簸，我在路上吐了几次。但通过



1986年，作者与父亲北京家中

这次参观，我知道咱们中国五十万年前就有了类人猿。

1956年，爸爸被薄一波调到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主持工作，却没有正式的职衔，大概算是“戴了帽子继续使用”的干部吧。像从前在东北局，后来在国家计委一样，他从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和复旦，挑选了一批高材生，在他手下工作。有天，一位瘦瘦高高、文弱书生模样的青年被请到家里吃便饭，饭后那青年还带我一同去机关礼堂看了电影。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王笃，我不知道“笃”字怎么写，他一笔一划地在我手心上写给我看。后来我再问到王叔叔，爸爸说他已经调走了。文革中，爸爸才告我，王笃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兴安岭去劳改，一棵大树倒下来，把他压死了。那些年爸爸赏识、提携的新秀，不少人受牵连，影响了升迁，朱镕基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

1960年代初，每年开计划会议时，爸爸住在北京饭店，附近的人大会堂，总有京戏一类的文艺节目供与会的干部欣赏。爸爸因工作忙，很少去看戏，于是票自然地落到我头上。我听遍了马连良、荀慧生、谭富英等诸大名角的看家戏。虽然没变成戏迷，可《二进宫》、《将相和》、《宇宙锋》这些传统戏，确实让我长了见识。之后在北京音乐厅又有中央乐团的合唱和交响乐，起初我没有兴趣，爸爸劝我去开开眼，接触一下不同的文化。真没想到我日后听西方古典音乐成癖。

在同一时期，爸爸不时为《人民日报》和《红

旗》杂志写社论，每次得十五元至二十元的稿费，便与党内其他几位“秀才”（笔杆子）一起下饭馆。那是困难时期，能下“东来顺”、“同和居”这样的馆子，非得有稿费这样的外快不可，这算是爸爸少有的一种消费。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业余爱好只有读书和游泳。当时爸爸常去红旗杂志社，找同为“秀才”的邓力群，在他那儿聊天和游泳。有时两人还去琉璃厂的书市买点旧书，多半是清末民初的一些杂书，都在文革中抄家时失散了。

仍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爸爸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蹲点，在那里积累经验，写下《工业七十条》的草案，为后来党和政府在过渡时期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方针提供了依据。据说毛泽东临终时的枕前，还摆着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爸爸曾带我去机床厂，告我如果将来不上大学，可下厂当工人。后来“文革”爆发，学业中断了，依我的家庭条件，不够留城进厂，便下乡插了队。

1964年前后，在一次北戴河政府工作会议上，党内某要人撞见了爸爸，大怒，摔门而去。此后他要求薄一波将我爸爸调离经委。当时爸爸正在主持编写《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一书。在巨大的工作和精神压力下，爸爸突患严重的腰肌劳损，卧床不起。我已经懂事了，记得每天都有十来个中青年干部来家里，围坐床前，听爸爸口述，他们记录，经过数月，终于完成任务。书成后爸爸离开经委。那要人坚持要把他发放外地，经薄一波、谷牧的疏通，才勉强留京，派到化工部设计院。《企业管理》一书成为我国当时企业管理的指南，后来，又分别用俄、英文在国外出版。

1966年“文革”风暴袭来，一开始群众不明了主席要整刘少奇的意思，就把爸爸这些“已有问题”的干部揪出来斗。种种人格上的侮辱，使爸爸想不通。在经委接替我爸爸职务的梅行，是爸爸几十年的老友，他既有士大夫风骨，又侠肝义胆，能为知己两肋插刀。他不断替爸爸撑腰打气，先拉他上附近的回民小饭馆大吃一顿，然后一同鼓足劲头，上台迎接批斗。后来梅行因死保朋友田家英

(毛的秘书), 被关入政治要犯监狱秦城, 一押十年。

1971年, 我插队时去山西探望爸爸, 他当时随单位疏散到那里。他窗前有一棵新栽的树, 朝阳, 树干挺直。他跟我说, 如果他在这里终老此生, 他要看着这棵小树长大成材。

1976年“文革”结束, 77年爸爸复出。我考上了文革后第一批的研究生和留学生, 准备出国。爸爸虽然被解放, 而且再度受重用, 但因“高饶事件”仍为党内遗留的唯一悬案, 因此爸爸没有得到“正名”。他跟我说, 如果人没有压力, 那就会满天飞了。他详细地询问我在国外能做什么, 怎么做, 然后认真地说, 只有在中国, 他才能真正做出一些事情。我意识到, 爸爸历尽政海劫波, 之所以仍能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去看问题, 只因未脱学者本色。他不计较个人得失, 又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 站得高, 看得远, 因此具有不同常人的远见卓识。

80年代初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工作为中心”, 爸爸这样的党内学者才有了发挥才智的舞台。他陆续写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等重要文章, 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政策上和理论上的基础。别人在不同的文章各有论叙, 我这里便不赘述了。值得一提的是, 近来西方的一些学者已把中国现代的经济改革, 与英国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 说它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重大事件。

1987年, 爸爸和人大代表团访美, 我上华盛顿看他。在同行的路上, 我们遇见一美国人汽车发生故障, 导致数部行车停留, 几人下车帮忙。爸爸问我这种情况是经常的还是偶然的, 我说美国别的短处有, 可助人为乐倒是蛮常见的。爸爸观察事物敏锐细致, 甚至对外国的道德民风也如此。

80年代中, 邓小平在接见印度议长之前, 特地与参加会见的爸爸单独谈话, 除了谈及其他问题之外, 强调了他俩都是几上几下。爸爸对于宦海沉浮毫不在意, 真正关注的是国计民生。他从自己的经济研究及政治经验出发, 洞悉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注重经济改革的可操作性,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的观点。例如84年和88年, 经济两度发展过热, 出现了通货膨胀。爸爸作为赵紫阳的智囊之一, 力主冷却、压缩, 84年赵采纳了爸爸的

建议, 稳定了时局。88年出于种种复杂的因素, 赵未能采纳爸爸的建议, 这对89年经济、政治有一定的影响, 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宋平是爸爸在延安马列学院时结下的好友。宋平曾对我回忆:“你爸爸从前脸是白的, 我们经常在延河里游泳。有一次赶上发大水, 他被洪水冲下来, 从此他就成了红脸。”爸爸因“高饶事件”落难之后, 宋平是极少保持与爸爸来往的同志。“文革”中, 虽然爸爸仍未解放, 而基于彼此的信任与了解, 两人结为亲家。后来却因世事纷扰, 渐渐来往不多了。几年前, 我和爸爸经过北河沿, 那时北京还不像现在这样面目全非, 他指着一处小饭铺的门脸说道:“刚来北京筹建计委时, 宋平我们几个下了夜班, 常到那里吃夜宵。”后来爸爸住院, 一天夜半醒来, 跟医生护士们说:“我要找宋平聊聊, 有些问题还得同他谈一谈。”身处一个社会改革与转型的大时代, 兼具学者与高干双重身份的爸爸, 不得不在学术与政治、私交与公谊之间艰难地行进。爸爸, 我知道你尽管不说, 心中有时还是念旧的。

爸爸晚年久病, 但始终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三年前, 我们全家从美国回去探望, 爸爸和我儿子隔代纵谈天下事, 老少一拍即合。他对我们预言:二三十年后, 中国会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赶上美国。后我去北京医院探视, 他思潮澎湃。虽然被护理人员扶着, 他在地上来回踱步, 激动地侃侃而谈:要从宏观的角度, 从理论上进一步探索中国和第三世界, 怎样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次我回来奔丧, 见到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联想爸爸和其他几位已不在人世的前辈, 披荆斩棘, 创业维艰, 为改革开放铺平了路。他们是为国家和人民立了大功的。

据家里人说, 爸爸弥留之际, 北京风雨大作, 雷电交加, 那是立冬时节少见的天气。他去世之后, 北京十几天大雾弥漫。2007年11月7日的追悼会, 除亲朋好友外, 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该到的都到了。胡锦涛主席对我们几个子女说:“马洪同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我个人很崇敬他。他一生坎坷, 我们会纪念他的。”葬礼后, 北京天开云散, 我家所在的万寿路院里, 天上地下, 处处是喜鹊。我虽不迷信, 也但愿这是一种吉兆, 会给爸爸和他热爱的祖国带来祥宁。(责任编辑 萧 徐)

袁振英——陈独秀的得意弟子

李继锋

郭彬

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中的师生

袁振英与陈独秀第一次见面是在1917年，地点是在北京大学。他们最初的关系只是单纯的师生。那时的陈独秀已是声名满中国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袁振英则是默默无闻却桀骜不驯的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但要论起进入北京大学的时间，学生却比老师要早了两年。

袁振英字震瀛，号黄龙道人等，出生于广东东莞县温塘村。袁姓家族是当地的望族，先人中以明朝末年的民族英雄袁崇焕最为知名。族人们建有“袁督师祠”。袁氏后人读书会得到“袁督师祠”的津贴。但对记事以后的袁振英来说，家族的官宦辉煌已经不再，只剩下了诗书传家的传统。袁振英幼年曾在父亲办的私塾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他的父亲袁居敦中过秀才，以后一生就完全靠教私塾为生。袁振英生在这样并不富裕的家庭，可衣食并无匮乏之虞，他也能够安心向学。

1905年，对全中国的读书人是转折性的一年，延续千年的科举被废除了，读书、中举、当官这条路突然堵塞了。袁居敦收入锐减，为了生存，他决定到邻近的英属香港去讨生活。11岁的袁振英跟着父亲去了香港，先后在英皇书院与皇仁书院读书，接受了西式的教育。

袁振英是皇仁书院的高才生，但并不认同当时香港的主流文化。他既不喜欢已经成为商业社会的香港，也反感严厉而功利的西式教育。自尊心极强的他对英国人在香港表现出来的不可抑制的优越感，更是深恶痛绝，无法忍受。同时，他在皇仁书院读书时了解到无政府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憧憬的理想社会情有独钟，改造不合理的中国社会是他坚定的信念。他把无政府主义称为“无治主义”，这个信仰几乎伴随了他坎坷的一生。因此，从皇仁书院毕业时，他做出了迥异于他所有同学的反常决定：返回内地，投考国立北京大学。1915年，他如愿以偿，进入北大西洋文学系。而这一年，陈独秀在上海办起了《青年杂志》，开始了新文化的启蒙。因为《新青年》杂志，他一跃而为中国思想界的明星。

1917年，当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第9天，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也从上海迁到北京。民主和科学，是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公开亮出的武器。北京大学成为席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狂飙的中心。

奇怪的是，这位声名大振的文科学长一开始却没有给袁振英留下好印象。当时的袁振英甚至对陈独秀的学术水准很有怀疑，他后来这样写道：陈独秀“根本不懂得教育为何物，绝对没有教育经验。陈独秀听说曾到过日本，但他读过什么书，得过什么文凭和学位，都没有人知道，他也没有什么专长，只会作些政论罢了”。

围绕一位任课老师的聘用，性情刚烈的袁振英还和陈独秀发生了冲突。袁振英晚年详细描述了事情的原委。当时，陈独秀聘用的一位英文老师刚从日本高等师范毕业，年纪很轻，陈独秀便任用他来教北京大学英文文学系的毕业班。这让学生们感到吃惊与气愤。袁振英写道：“我们中国国立北京大学是与日本帝国大学同级；我们中国的国立高等师范也是与日本的高等师范同级。中国高等师范毕业生从入北京大学还要从第一年级起

读；日本高级师范毕业生如果要入北京大学也要从第一年级读起，因为中日两国常常也会交换教员和学生的。所以陈独秀任用一个日本高师的毕业生来教我们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班的英文，这简直是国家一种耻辱。”袁振英当时正好是班长，副班长是后来写《马克思传》的李季。他们直接找到陈独秀申诉，并声称：“假如他不赶走那一个教员，我们只有不上课”。学生们不惜罢课的警告，使得性情刚烈的陈独秀难堪而无奈，最后只得顺从了学生的要求。从此，他对这位英文优秀、思想激进、性情倔强的袁振英有了深刻印象，但他没有因此歧视这个学生，反而给他机会，让他成了自己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投稿人。

《新青年》杂志：主编与投稿人

袁振英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一篇译文，题目为《结婚与恋爱》，这篇文章是美国女无政府主义者高曼女士写的，文章批评没有爱情的婚姻，指责与抗议男性在社会与家庭里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这篇文章载于1917年《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五号。当时能够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学生凤毛麟角，袁振英甚至自负地说：“学生中亦我一人”。他的英文水准与激进的思想令他的两位老师胡适与陈独秀刮目相看，胡适还给袁振英上过英文课。这两位老师的赏识让袁振英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也因此和陈独秀、《新青年》结下了不解之缘。

袁振英在北京大学求学的时期，发表的最有社会影响力的文章是《易卜生传》，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易卜生传》发表于1918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六期上。这一期为“易卜生专号”，里面除了袁振英的《易卜生传》，还同时刊载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罗家伦、胡适等译的《娜拉》，陶履恭译的《国民之敌》，吴弱男译的《小爱友夫》连载。这也是陈独秀创刊《新青年》杂志以来第一次以个人为主题来组稿出版。

这档专号出自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策划。直接导致易卜生专号出现的触发点是当年昆剧



陈独秀

突然在北京盛行开来，昆剧的内容依旧是传统的伦理观念。新文化阵营的人们对此有所不甘，胡适便想到用易卜生的话剧来对抗。鲁迅在十年后写的文章通过引用日本学者的文章对此事留下了赞赏性的记载：“民国七年（1918）六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那阵势，是以胡将军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适罗家伦共译的《娜拉》（至第三幕），陶履恭的《国民之敌》和吴弱男的《小爱友夫》（各第一幕）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勇壮地出陈”。

“易卜生专号”的发表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开始关注起挪威伟大戏剧家易卜生。易卜生是19世纪欧洲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欧洲现代戏剧的创始人，“社会问题剧”的开创者。他是西方文坛上继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之后出现的第三座戏剧高峰，有“现代戏剧之父”之称。

正在挑战中国传统伦理的陈独秀与胡适需要得到易卜生这个挪威人的帮助，在新文化运

动初，易卜生的戏剧与思想对于消解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禁锢、树立男女平等的新观点以及唤醒国人的个性与自主意识等发挥了特殊的启蒙作用。

在胡适策划“易卜生专号”的时候，他的学生袁振英当时正在着手撰写毕业论文，胡适便建议他以易卜生为题，袁振英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开始寻找并翻译与易卜生相关的资料，用英文撰写易卜生传记。这个论文题目非常对袁振英的口味，他和陈独秀、胡适两位老师一样藐视中国传统礼教，直到晚年，他依旧称孔子是孔老二、孟子是孟老三，赞同全盘西化。胡适、陈独秀在那个时代已经是激进的象征了，可他们的这个学生比老师还要激进许多。他追求的目标不只是个人的自由与独立的人格，还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在传记的写作中，易卜生日渐成为他推崇的英雄，极表钦慕与赞美。在他的笔下，“易氏虽为一有名之大剧曲家，然亦一大革命家也。”他高度评价传主的思想与为人：“易氏之新思潮，如好花怒放，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果敢无伦，前人之不敢言者，彼乃如鯁在喉，以一吐为快；发聋振聩，天下为骇，此氏所以有‘惟天下之最强者，乃能特立独行’之语也。”

在胡适和陈独秀正式决定推出易卜生专栏以后，袁振英就忙着把英文写完的易卜生传翻译成文言文，胡适与陈独秀因为忙于出版，再三催促，袁振英匆忙之下没有译完，就只好把翻译好的一部分浓缩成《易卜生传》登载出来了。

易卜生的作品与思想很快引起了城市青年学生的兴趣与共鸣。袁振英后来对五四时期与易卜生的这种共鸣做了清楚的说明：“易卜生是一个少年的思想家，适合于现代的新思潮，……中国的恶社会底势力，还是很大，不知有多少的青年人，做他的牺牲，易卜生主义实在是：战胜这种万恶的环境的很好的工具。”娜拉的形象印在了众多女性的脑海里，而“惟天下之最强者，乃能特立独行”这句话也成为众多追求独立思想与人格的年轻人案头的座右铭。1918年8月10日，远在南国广州的《广东中华新报》特地转载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袁振英的《易卜生传》，文末附有编辑写的感言，题为《冷观附识》，

他在文中写道：转载胡、袁两位的文章，“以博读者之欢迎，抑亦记者同情于文学改良思想之表示也”。

1920年2月22日，广东“新学生”社将袁振英的《易卜生传》单独成书出版，已经离开北京大学的袁振英为新刊的《易卜生传》写了题为《近代戏剧大家易卜生传序》，序中，他回忆了成文与成书的经过。他这样写道：“新学生把我这篇旧作，印成单行本，作他们的增刊，是我很赞成的。因为易卜生的生平和著述，不仅可以作我们‘新学生’的模范，并可以针砭我们中国旧社会的‘旧学生’！”

袁振英编撰的《易卜生传》是用中文撰写的第一篇易卜生传记。他不仅是中国研究易卜生的第一人，也是中国近代戏剧理论研究的拓荒者之一。1919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六卷二期上，袁振英用笔名“震瀛”翻译了美国人撰写的《近代戏剧论》。这一贡献也就是日后袁振英自诩为“五四运动急先锋”的底气所在。而他另外的一个自我评价是“共产主义马前卒”。如果说成为五四新文化的急先锋只是他间接的得到了陈独秀的帮助，而化身为共产主义马前卒则完全是陈独秀一手促成的。

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同志

1920年7月，袁振英从海外游历归来，路经上海，并遇上了陈独秀。当时的袁振英与老师陈独秀已经长达两年没有见过面。

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以后，思想日益激进，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初，他到上海以后正在忙着组建中国共产党。而离开北京大学的袁振英远赴广东、香港、南洋，远离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但他仍然为他的社会理想而奔走活动。为了反对日本的对华侵略，他参加了“广东省游东记者团”到日本、朝鲜、台湾等地从事宣传活动长达数月，直到1920年7月，袁振英等才返回上海。在上海与陈独秀的相见使袁振英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的推动者，他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并因为担任《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栏目的主编而在介绍苏俄与宣

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成就斐然。

晚年的袁振英这样写道：“回国经沪见到了陈独秀。他要我帮忙他组织了共产党小组。”陈独秀为什么请袁振英协助他，有诸多原因。其一是袁振英不仅是他的学生，也是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袁振英与无政府主义的渊源。那时候的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都属于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都对俄罗斯的十月革命表示欢迎与支持。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等极力促成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并要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陈独秀当时与无政府主义者是盟友，袁振英可充作他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桥梁。其二是陈独秀要借助于袁振英的英文，因为陈独秀当时与国际上的社会主义者来往频繁，让英文很好的袁振英做翻译非常合适。其三，陈独秀考虑将《新青年》从北京迁到上海出版，但杂志遭遇主题转型与文章匮乏的问题，他需要既会写文章，又熟悉社会主义理论的人协助他办好《新青年》杂志，而袁振英正是合适的人选。

袁振英回忆当时的上海共产主义组织时给予后人一个令人诧异的描绘。他这样写道：当时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中“有许多外国人，不过地点是在‘中国’罢了”。在他的笔下，上海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有各国人士加入。成员除俄国人外，还有朝鲜人、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和英国人。袁振英的描述显然和参与建党的其他早期党员的回忆有相当的差异。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差异呢？这和袁振英当时特殊的角色有关，他因为英语能力，可以直接和各国社会主义者交流，并充当陈独秀与他们之间的翻译。同时，他是《上海俄文生活报》的英文译员，另外他还担任了《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版的编辑，这三项工作使得经常与外国的革命者接触与合作，因此对共产党组织萌芽时期的情况有着最直观的了解与印象，这种印象在他的脑海里一直强烈而深刻。可惜他这种印象一直没有研究者予以特别的注意，尤其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本土性以后，他的宝贵的片言只语更被自觉不自觉的遮蔽了。如今他的回忆可靠性得到了新发现的苏联档案的证实。

当时的上海是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推展东亚共产主义运动的秘密大本营。而这个大本营的所在地便设立在袁振英时常进出的《上海俄文生活报》报馆。《上海俄文生活报》社址即为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所在地

袁振英是经陈独秀推荐进入《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的，他充当的是英语翻译员。这份工作让没有正常收入的他有了份不菲的报酬。《上海俄文生活报》是1919年9月21日创刊的。1920年2月，苏联共产党官员以5000美元买断，自此以后，《上海俄文生活报》就成为一份有着充裕资金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了。1920年5月，维经斯基按照上级指示于5月在上海组建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以后，《上海俄文生活报》便很快成为该处拥有的重要俄文报刊，维经斯基的公开职业便是《上海俄文生活报》编辑。当时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下辖三个部：下设中国部、日本部和朝鲜部。当时，共产国际的干部与远东的革命者在这家报馆频繁出没，袁振英也是其中的一员。无意中的他已经深入到了远东共产主义革命风暴的心脏。

从1920年7月到上海，到1920年12月离开上海赴广东，5个多月的时间里，袁振英异常的忙碌，也非常的专注。他要为陈独秀充当翻译，要担当《新青年》一个新办栏目“俄罗斯研究”的主要编译者，要为《共产党月刊》与《劳动界》撰稿，还要为《上海俄文生活报》提供英文译稿，参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担任外国语学社的英语教师。此外，他还曾远往武汉争取另外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恽代英加入共产党组织。劳累的他后来甚至感慨道：陈独秀“民九”在上海组织共产党小组，也要我帮忙一切。实际上只有我们俩！这句感慨显然太夸张了，但用在复刊以后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出版上倒是名副其实的。

《新青年》杂志随它的创办者陈独秀从北京迁到了上海。迁到上海以后，这家中国最知名的启蒙杂志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转变涉及到编辑方式、经费与政治倾向。1920年9月，陈独秀将5月以来处于停刊状况的《新青年》复刊。复刊后的第1号，即第8卷第1号开始，该刊实际上成为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在

复刊号中，登载了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宣言《谈政治》一文。复刊中还开辟了介绍俄国革命的“俄罗斯研究”专栏。这个重要的专栏，陈独秀交由袁振英主持。

对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苏俄，当时人们不是赞扬就是反对、不是喜欢就是失望，对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政治试验既充满期待，又有着莫名的恐惧，总之，很难做到平静。作为俄罗斯的邻居，中国人对新苏俄也观感复杂。袁振英致力于把社会主义的苏联实况介绍到中国来，以正视听。因为远离了北京大学，《新青年》杂志的稿源匮乏，为了填空，袁振英自己翻译了大量介绍苏联的稿件登载，占了新青年杂志的相当篇幅。这点，袁振英自己留有记载：“……因为当时‘新青年’的赤化已现，‘北大’一班教授已不敢投稿……所以我便不能不多翻译一些美国共产党机关报‘苏维埃俄罗斯’周刊的稿件。”

这种内容上的剧烈变化引起了《新青年》杂志某些社员的强烈不满。袁振英的英文教授胡适尤其不满，他抱怨说：《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袁振英的大量翻译文章都源自此刊物。另外一位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给胡适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清晰地表明自己对这种变化的无奈：“《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版？”

“俄罗斯研究”中的文章让中国最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第一次能够了解到俄国革命的真面目，同时能够读到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文章。袁振英不仅编辑了这些文章，而且他本人就是栏目最主要的译者。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1日）上十一篇文章全是袁振英一人翻译。第五号第六号两卷翻译了四篇占了一半。事实上，没有他辛苦而高效的翻译，这个栏目肯定难以为继。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习惯：“我平生作文不起稿，写得文潦草，不成字，因为自少读西文，不懂得中国文字！”他在文革后期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曾强调了这一点，他

写道：“苏维埃、俄罗斯研究一部门的稿件差不多完全是我的稿件，只有一个留俄华工杨明斋能够翻译些俄国的工农生产的字数，因为也不懂得理论。”

袁振英一生用过许多笔名，这段时间，他用得最多的就是“震瀛”，取振英的谐音。袁振英那时专心工作，写文章很多，也很快。他曾经用唐朝诗人李白来打趣：“李太白所谓：‘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也不是一件难事！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

广州：中学男女同校风波

1920年底，陈独秀与袁振英从上海来到了广州。他们当时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袁振英对这次回广州，最初的态度并不积极，当时，他正把精力专注在《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栏目的编辑和文章的译述上。对两人南下的原委，袁振英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民九’（1920）粤军入粤，赶走了莫荣新（桂系）。孙中山先生要我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广雅）校长。我因为上海的工作重要，不肯回来。后来陈炯明又要陈独秀来粤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职。俄国的同志也要来粤，想解决‘联孙’和‘联陈’的问题。他们都不懂广州话，要我传话，所以便一齐来到广州。”显然袁振英回到广州是要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的校长，并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他的另外一个使命是创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袁振英后来也成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广东省第一中学的管理上。1921年1月，袁振英正式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校长。

广东省第一中学就是如今的广州广雅中学。它有着百年历史，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活的见证”。在这个中学担任过校长的有梁漱溟等知名学者，在历任校长中，袁振英任职时间最短，只在校长岗位上干了短短几个月，但血气方刚的他却因为率先招收女子插班生，实行男女同校，从而在校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同时他的这个举动被铭刻在中国教育史上。对这件事，广雅中学校史上有这样的评价：“是为该校

有女生之始，亦开广东省中学男女同校之先声。”

民国成立之后，实行全国小学男女同校。自此以后，升入中等学校的女生日益增加，为数不多的女校已经无法满足女性接受中学教育的要求。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陶行知便针对这一现象指出：“现在小学女毕业生一天多一天，一部分是一定要升学的。若不许男女同桌吃饭，就须另外为女子开一桌饭。既不为女子另外开饭，又不许男女同桌吃饭，是不是要看她们饿死呢？”他呼吁普通的中学应该允许女生进入就读。但因为社会风气未开，中学男女同校一直没有进展。

袁振英出任校长时，年仅 27 岁。他一直密切关注着女性的命运，始终认为没有爱情的家庭是一种妨碍人发展的桎梏与束缚。他自己极端主张自由恋爱，而反对包办婚姻。他常说的话是，宁要没有婚姻的恋爱，绝不要没有恋爱的婚姻。他曾在报纸上公开申明，放弃父亲给他订的婚姻，他自己认识了一位叫黄式坤的新女性。这位新女性是学医的，很早就成了职业女性。后来他们一起到法国留学，经过数年的执着追求与甜蜜的恋爱以后，在 1924 年终于结成夫妻。显然，袁振英是一位思想开明进步且血气方刚的青年校长，他实行中学男女同校不是偶然，更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或者赶时髦之举。

开先河的行为必然引发与主流传统的强大冲突，在当时的中国，包括被认为接受西方影响较早的广州，男女之间授受不亲的传统积习仍依旧根深蒂固，让男女中学生同校共读对绝大多数士绅来说，就意味着对少男少女出现有伤风化的行为开了绿灯，他们担忧实行男女同校的中学将成为道德沦丧的渊藪。不满袁振英办学理念的反对派对这位思想激进的新校长列举了十大罪状，袁振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曾写道：“我在‘省一中’招收女生，许多卫道的先生们投匿名信来恐吓我，说什：‘败坏中国封建宗法以及孔老二的礼教，要飞剑取我头’，更有公言宣言，宣布我‘十大罪’。”



袁振英与妻子

在十大罪状中，有两条涉及关于他和女生之间的问题，当时也是最容易激发众怒的话题。反对者列举的罪状之一是说袁振英在广雅书院“无邪堂”专门约来数十名女生举行演讲及茶会！这个指责不仅暗示袁振英对女生心怀不轨，而且还发生在“无邪堂”这样本应纯净无邪的地方。但这个罪名完全是捕风捉影，是莫须有的陷害。对此，袁振英专门做了解释，他说：“一切男女同学问题，我常在大礼堂对男女全体（学）生演讲，用不着向女生特别演讲，不许男生来旁听！”另外一条罪状是指称袁振英招收女生入学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自己选未来的妻子，是见不得人的、卑劣的“择妃主义”。这个罪名没有提出任何事实上的证据，而完全是想当然的猜测，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这样的罪名提出来让袁振英只有苦笑，面对这根本是主观臆断的中伤，袁振英后来嘲讽地解释道：“虽然我当校长的时候只有约廿六岁，还没有结婚，但我绝对不会同一个初中女生来结婚。因为当时只招

旧制中学一、二、三年级女插班生。同时，我的爱人在市立医院已经做了医生几年了，我也认识她几年了！”

袁振英在孤军奋战，只有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是袁振英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与后盾。那段时间，陈独秀常到广东省第一中学去作讲演以示支持。当袁振英的男女同校的设想遇阻时，他立场坚定的支持袁振英的大胆设想，为了化解阻力，他建议袁振英去找广东省教育会长汪精卫，寻求这位会长的支持。听从陈独秀建议的袁振英到汪精卫家里拜访，请求他支持在广东省一中实行男女同校。时任广东教育会长的汪精卫在二十年代初还是思想比较新潮的人物，但就是这样的“时代精英”，当时也觉得实行中学男女同校的时机尚不成熟，认为袁振英的计划操之过急，而且含有风险。他给出的理由是：“大学生性情已定，小学生不知不觉，尚且可以男女同校，而中学生性情不定，不宜男女同校。”汪精卫担心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处在一校会在男女生交往上出现难以预料的问题。事实上，汪精卫的担忧在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倔强的袁振英并没有收回自己的意见，他竭力在汪精卫面前阐释实行中学男女同校的理由。袁振英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高小学生同初中学生相近，高三学生同大学一年级学生也相近，小学、大学可以男女同校，中学也可以。我提出一切学校都应该男女同校，不分男女都可以读小学、中学和大学。你反对中学男女同校，实际上不就是反对各县之女子进中学读书了吗？各县哪有那么多女子中学呢。”由于袁振英冲动而强硬的语气，当时的气氛很是严肃甚至紧张，两人之间已经不是谈话而是如同辩论。但最后被说服的是汪精卫。

袁振英在广东省一中实行男女同校成为轰动广州的一件大事。虽然反对者给了他十大罪状，甚至想将他置于死地。不过赞成者也颇不乏人。在广东省一中开始男女同校以后，广东的妇女组织——广东女界联合会随即在2月间发起了男女同校运动。

1921年2月27日，广东妇女界的领袖们举行集会，她们一致认为广东省一中的袁振英校长已经着手添招女生，以前视为禁区的男女同

校问题已经被打破了。但妇女界领袖伍智梅表示不能满足于此，在会议上她进一步表示：“今日高师虽有女生，一中虽招收女生，但今日所讨论的，是一般学校，不是一二间显赫小有几个女生，我们便觉满足。”她提醒到：“至一中招女生，不过由袁校长一人主张！”妇女界想把广东省一中的个案普遍化，决定为了中学男女同校问题向省长发动请愿。要求省长命令各校一律开放，使妇女们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陈炯明省长在听取请愿代表阐释的理由以后，表示同情这种运动。代表们又追问，政府的男女同校的命令什么时候可以宣布。陈炯明省长说：此事由教育委员会布告。代表们认为要表达郑重的态度，最好由省长亲自署名布告，陈炯明也答应了。由于陈炯明的首肯，汪精卫的同意，加上陈独秀的具体操作，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于1921年3月23日决议在全省中学开放男女同校，广东省第一中学男女同校的模式推广到全省中学。中学男女同校在广东终于合法化了。著名的广州执信女子中学也随后实行男女同校，招收男生插班生。

在任校长的那几个月里，袁振英全力以赴，在文章创作方面没有在上海那段时间那么高产，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内的活动也略显沉寂。除了招收女插班生，实行男女同校的大胆改革，性格严肃而认真的袁振英还着手强化学校的校风校纪的管理，但结果却因此而激成了一次让他心灰意冷的学潮并最终被迫离职。

广东省第一中学本来是桂系军阀所把持控制的，学风非常腐败，学生常常不遵守校规，新上任的袁振英认为非严办不可。当时正好有一学生在晚间自修时间，还在湖中泛舟，级主任看见，叫他回去自修，但他不但不服从，反而张口谩骂。袁振英得知以后，叫工友把那个学生叫到教务处教育，但这个学生仍然没有悔改之意思，仍继续谩骂。袁振英和他的同事都觉得这个学生既不守校规，又不服从师长，反而谩骂，应该给以惩处。当时便呈报了陈独秀主持下的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会会议之后，给予那位学生开除学籍的严厉惩罚。但这个学生家里很有势力，他召集了许多年纪大的学生，压迫年少的学生，集体向教育行政委员会请愿，要求恢复自己的学籍；但教育行政委员会不许，风潮便闹大了。

最终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顶不住学潮的压力，强悍的陈独秀也无可奈何，袁振英作为当事人更感到心力交瘁。他后来坦承自己没有责任的臂膀，只是个书生，做不了行政职务。在难堪困窘之际，正逢广东省府派遣一百名公费留学生入法国里昂大学，心灰意懒的袁振英决定辞职，前往法国里昂大学博士院深造。当袁振英出国之际，广东省第一中学的全体女生怀着感恩的心集体写信给行将远赴法国求学的袁振英校长，向他深深致谢！她们感谢这位年轻而勇敢的校长实行男女同校，让她们得到求知深造的机会，让她们得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对任职不久的袁振英，这封信是极大的安慰。

据统计，1921年，率先实行男女同校的中等学校除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外，后来还有广州执信中学、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湖南岳云中学。继小学和大学后，女子在中等学校终于开始获得了与男子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中学男女同校是袁振英与陈独秀最后一次成功的合作。

留学法国：悄然的分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当时陈独秀忙于广州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工作，没有参加中共一大。袁振英忙于准备到法国里昂留学，也没有参加。此后，他去了法国留学，从此与陈独秀及共产党不再有组织上的联系。

对袁振英脱党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日本劳动年刊认为他是因为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而退出。还有的认为袁振英在留学以后热衷做学问。但袁振英自己的解释有两条，一条是他深受无政府主义强调自由的影响，适应不了中国共产党严格的纪律；第二条是陈独秀个人的缘故。尽管他与陈独秀有师生之谊，又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但他对陈独秀作为一个政党领袖的前景并不看好。他解释自己退出共产党的理由很简单，只是不喜欢陈独秀，不愿意跟陈独秀走，到广东以后除了做翻译，就没有在党务方面有过什么活跃的表现，他自己承认：“我自从做了‘省一中’校长以后，因为事忙，便与他完全脱离关系。”他对追随陈独秀到广州以后的活动情况叙

述极少，而且广东方面也很少有人回忆到他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内的具体活动。

袁振英对陈独秀缺乏内在的尊敬，最大的原因是道德方面的。在特别重视道德水准的袁振英眼里，“陈独秀是一个不道德主义者”。他在北京大学时就听说陈独秀打茶围、找妓女，“我后来又发现陈独秀另恋小姨，把妻子置诸脑后，所以弄到儿子延年、乔年等衣食无着，更无法读书，迫得去法国勤工俭学去了。”他对陈独秀在经济上的有些做法也抱有不满意。多年以后，他仍然愤愤地写道：在上海那段时间，“我的薪水只支回一百元稿费，其他一切任务都是义务的，可是陈独秀还要扣除我每月廿五元膳宿费（一半是宿费）。其实机关的房钱已经由公家付给，陈独秀的扣除又是入了私囊。因为陈氏又爱上了小姨，费用越发多了。当时又生了一子一女。”

1924年，袁振英从法国留学回来以后，在广东大学担任教授。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他到武汉担任武汉中央军校教官，与恽代英等共事。在武汉，他与当时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在不同的场合见过几次面，但只是客套的叙叙北大师旧情，而不再是工作伙伴和亲密同志了。解放后，袁振英经周恩来总理介绍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1979年因病去世。

（责任编辑 萧 徐）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2007年合订本（上、下卷）已于2007年12月出版，每本45元（含邮费），有订购者请与我刊广告发行部联系。

另：我社2005年、2006年《炎黄春秋》合订本库存数量已不多，欲购请速汇款。

2005年简装 70元
2006年精装 85元 简装 80元
2007年上卷 45元 下卷 45元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我们连里的七个“反革命”

利川 津津

1967年12月8日，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人生转折点。这一天，我们怀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困惑和经风雨见世面的崇高理想，从北京奔赴北大荒。这一年，我们十七岁。

我们在北大荒一待就是六七年，同去的知青有的待了十来年，还有的扎根当地，直到今天。我们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奉献了青春、汗水甚至生命，张扬了理想与狂热，度过了百般磨难的蹉跎岁月。每每回忆，都充满着恋与遗憾、亲切与怨恨相互交织的复杂心情。

在那一页页的回忆中，常常袭上我们心头的，就是我们连里的那些“反革命”。真的，而且还不小，就在我经历的六年中，前前后后一共出了七个。

俗话说，“天高皇帝远”，远离北京数千里，那种令我们有些厌倦的文化大革命的火药味淡了许多。没有武斗，也没有造反派组织。但是，在那个“突出政治”、“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上纲上线”的年代，哪个地方可以逃脱厄运呢？是啊，只要你有个性，或者一不留神，就会带上这个可怕的光环，让你的命运就此改变。

我们还是一个一个地介绍吧。

第一个，遗留的反革命：王廷举

我们被分配在绥滨农场第三生产队，后来改为建设兵团时叫九团八连。不久的一天，连里安排我们在连部附近挖土，和我们一起干活的是一位老职工（我们对知青来之前的农场职工的称呼），叫王廷举。什么？！“王连举”？！我们都笑起来，谁都知道，王连举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叛徒，他俩就差一个字。连里领导说，你们别笑了，王廷举就是反革命，还是现行的。你们要好好监督他劳动。

我们警觉起来，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绷紧

了。

“现行反革命”看起来三十来岁，怎么当了反革命呢？在北京搞文革时，我们见过不少“反革命”，也亲自斗过“反革命”，所以并不觉得神秘。一边干活，就一边与王廷举聊天，加上以后侧面打听，才知道了这个“反革命”的来历。

原来，在那个处处都是“红海洋”的时代，人人都必须有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这是一个政治道具，早请示、晚汇报、开会、学习甚至吃饭都离不开它。一次，王廷举漫不经心地翻看这本小书，并且拿支笔随意写划着。他想起毛泽东的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就试图把他写下来。但他文化水平不高，写到“四海……”就不知道“翻”怎么写了，写成了“反、反、反……”，倒霉的是，他接着写了诗句作者的名字：毛泽东。连在一起，成了一句典型的反革命言论。

这还了得！王廷举理所当然地成了现行反革命。他面临的，必然是调换工作（只能干“黑五类”干的活）、监督劳动和无休止的批斗……

王廷举毕竟是我们到农场之前的“反革命”，而下一个，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并且居然是我们知青中的一个。

第二个，写“反标”的北京女知青

记得是到北大荒的头一年，一天早上起来，发现连部附近熙熙攘攘，有些异常。女生宿舍外墙上发现了“反标”！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心头一沉。好家伙，阶级敌人如此猖狂！当听到“反标”内容后，更是大吃一惊，居然写的是——“毛主席万碎”。

什么人如此胆大？是我们连的，还是过路的？是思想反动，还是精神失常？大家小声猜测着。

连队马上紧张起来。领导将全体人员（包括

老职工和知青)集中到操场上,需要核对笔迹,以此查出这个写反标的人。我们排起队来,一个一个地在指定的纸上写下指定的字。

很快,没有怎么费事,写反标的人就被查出来了,结果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竟然是陆岫罄,我们一起来的北京知青!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谁也搞不懂,一个根红苗正在“毛主席身边”长大的十七八岁的女知青,干嘛要干这么一件不着边际的事情?但是,毋庸置疑,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为,需要立即专政。

批判会,认罪,调换工作,监督劳动……也许是实在找不到她的反革命阶级根源,不知什么时候,她调到另一连队,可能压力会小些吧。

现在想来,在那个红色恐怖年代,政治紧张度极高,一边是造神运动、狂热崇拜,一边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生怕碰到高压线,许多人为此造成巨大心理压力,陆岫罄也许就是一种强迫症的表现吧。

第三个,因为受批判,他卧轨自杀了

从政治标准来说,如果把罗北知青李震算作反革命,他并不够格。因为,像他这样做过错事、说过错话、挨过批判的多了去了,但是,他自杀了,卧轨,这就成了一件大事。

1969年6月农场改为建设兵团后,我们部分男知青经过政治审查组成武装连队,并于10月份开进兴安岭打山洞。准确地说,是与解放军工程兵一起,开凿国防弹药仓库。

对于我们豪情万丈的知青来说,这可真是放飞理想、考验意志的浪漫而又艰苦的工作啊。在这个叫做“苍青”的山沟里,我们流过汗,受过伤,牺牲过我们的战友。但是,不

应该的,是另一种死亡,李震的自杀。

李震是罗北知青,在我们看来,怎么能算屯垦戍边的知青?因为罗北就在我们附近一两百里地儿,不过从家门到家门,不像我们才是远赴边疆呢。

那个年月,斗私批修是必修课,一点事也要“上纲(阶级斗争为纲)上线(毛主席革命路线)”。做点好事都是学习毛选、政治挂帅的结果,作了坏事都是资产阶级的腐蚀。

1970年冬天里发生了一件现在看来很小的事情:记不清是谁的手表丢了。那时没有几个人戴手表,一来是整个社会都物质匮乏,何况我们在山沟里;二来是戴手表显得有点资产阶级。所以,丢手表也就成了大事。

山沟里只有我们的连队,与打山洞的兄弟连队来往也不多,进来个人都稀罕。所以,并不难查。记不起有什么证据,查来查去,查到了李震头上。

这下完了,大会斗,小会批,查三代,挖老根。连里正愁没有大批判的活靶子,阶级斗争搞得不活跃呢。李震当然压力巨大,无法抬头。

一天早上发现,李震不见了。我们赶紧分头去找。山凹里,除了我们架起的棉帐篷营地,一片大雪茫茫,他能上哪里去呢?我们首先沿着山下



本文作者摄于八连大食堂前

的铁路线,各站去询问。又有人报告,有一行新脚印一直延伸到山那边,一个排长立刻带人踏着深雪追上去了。

我当时在连部任文书(还是连队团支部书记),紧张地配合连领导分配任务,搜集情况。大约深夜两三点,有铁路局电话通知,在附近车站发现一具尸首,男性,是卧轨被火车压死的。我心头一沉:也许就是李震!一分钟也未耽搁,我们一路乘着临时借用的卡车来到火车站认尸。一路上,我的心像冬夜一样冰冷。

结论不需再说了。李震,我们同为知识青年,是一个连的兵团战友,为了一只说不清的手表,我们分成了“先进”与“落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在我们都积极地参加“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的运动时,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毁灭了。

第四个,萧东北,也是笔误

同样是在“苔青”沟里打山洞的时候,事情好像静悄悄地发生了。有一天,萧东北来找我,说:我要下山了。他也是北京知青,第二批来到我们连的。人很内向,干活很卖力。我看他沉着脸,灰溜溜的,就问:为什么?他跟我讲起了原委。

原来,他出了重大的政治问题,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毛主席著作——黄书”等字样。至于这些字怎么跑到一块去了,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好像是在一次学习会上批判大家“黄书”(那个时候所有描写爱情的都是黄书),他在做笔记,写着写着,把“毛主席著作”和“黄书”连在了一起,就成了一句反动话。还好,也许是私下发现的,没有上报,躲过了批斗。但是,光荣的知识青年是当不成了,尤其还是在开凿备战弹药仓库。

紧接着,他回到山下连里办了回京手续。也算歪打正着吧,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最早回城的知青之一。以后,这件事如何影响着他的命运,我就不得而知了。

第五个,有知识、有思想的“反革命”

我们尽管在文革发动一年多就到了北大荒,但文革仍然是我们最关心的政治大事。记得刚到连里没多久,因为私下议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被领导找去谈话,这还属于善意地劝阻。

杨惟谨就不同了。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北京钢铁学院著名教授,有点个性孤傲。我们下乡知青那时自发组织了“学马列小组”,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交换书籍。在当时政治背景下,我们自认为还算有个性了,但杨惟谨的话仍叫我们觉得大胆。她说,林彪说毛主席“五百年出一个”是不对的,说毛主席比马恩列斯还高也是不对的。林彪摔死前,全国人民每次吃饭前,都要手摇语录本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令人惊诧的是,杨惟谨在饭前敬祝仪式上,居然说“敬祝包子万寿无疆”,因为那顿饭吃包子。这些话在当时,堪称另类了。不过,这些虽已成为坊间奇谈,知青中并不太当回事。

“平时开玩笑,运动当材料”。这句政治格言名不虚传。大约是一九七零年冬天,团部政治处到我连开展“捍线 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权(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学习班,在学习、讨论、揭发、批判中,政治处领导知道了杨惟谨的言论。终于,一个新的“反革命”被揪出了。

直到今天我们还为此内疚:我们都参加了对杨惟谨的大批判会。居然敢于贬低毛主席,攻击林副主席,有思想,有言论,罪名是货真价实的。最可深挖的,杨惟谨有个“软肋”,她出生于香港。这可不是什么好事,甚至马上可以联想到“反动”、“特务”。我还记得我当时引为得意的大批判词:“从杨惟谨出生一睁眼,看到的是米字旗,乘坐的是花旗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港货。”可见“文革”大批判风格一斑。

马上,杨惟谨不再当农工了,她被派去烧锅炉。这个今天需要专业审批的岗位,不知为什么那时却当作惩罚性的工作。以后,这个有思想、有知识的教授的女儿,因为不能返城,只好委屈地与当地老职工的儿子结婚了,以后也就丧失了返城回京的政策照顾。后来,听说又离婚回北京了。再后来,改革开放给了她最后的机会,远渡重洋,去了美国。

第六个,可爱的车老板,上吊了

“快来人哪,樊庆远上吊了!”一天清晨我爬起来,就听到这声嘶哑的叫喊。我不顾一切地向远处的旧猪舍跑去。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吊死的

人，不敢细看，和一起跑来的人们合力把他从房梁上放下来，人已经冰凉了。

樊庆远，我们连里赶大车的，东北叫车老板儿，四十多岁，人朴实中带点小聪明，外号“饭桶”，我们经常和他开玩笑。

1971年9月13日凌晨，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我们是从一位回家的北京知青来信中猜到这件事的。他信中说，北京近来气候异常，而且，信的结尾只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却没有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我们几位要好的知青紧张而又神秘地私下猜测和传播，讨论着中国的命运。不知怎的，又被团部政治处知道了，找我们谈话——总之，不要造谣。

两三个月后，“谣言”终于被证实了。从上到下开始传达林彪谋害毛主席、抢班夺权、仓皇出逃、最后摔死的罪证，开展声讨批判。

喊惯了“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基层百姓们一下子蒙了，整个连里气氛都慌慌的，好像坐标都反了，弄不清怎么回事。有人问：“谁？！是不是×彪啊？”记得第一次大会批判，大车班班长、优秀共产党员李昌明首先发言，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这个，这个，林彪同志——”发现说错了，又不知怎么改。台下木然而又哗然。

樊庆远的祸可闯大了。小组会上，大家都在口口声声地声讨“林贼”，他却莫名其妙地冒出几句“虱(毛)贼”。据说有人提醒他，他还接着说。事后大家议论，好像是他那天喝多了酒。学习小组长(一位上海知青)在连里召开的汇报会上说了此事。不由分说，马上揪出来，谁敢掩盖这样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啊！

除了批斗，立即把他从大车班这样重要的岗位上换下来，调到农工班在场院上监督劳动。

樊庆远死后，有人回忆说：老樊前些天曾问道：这个扬场机的电路是不是一摸就电死啊？

就这样，糊里糊涂，老樊去了。朴实的老职工啊，他们不懂什么政治，可是政治却把他们送上绝路。

第七个，开康拜因的大个子，李义

批斗会的目的本来是消灭“反革命”的，却经常造出新的“反革命”。可能是患上了“政治紧张综合症”吧。这不，除了樊庆远，又出了一个李义。

李义是个山东大个，干机务，专开苏式的自动联合收割机(康拜因)。我都记不清事情怎么发生的了，反正是在一次学习或者批判大会上，他在一份文件上乱画，好像是把“反党集团”几个字和“中央文革”写到一起了。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什么“帮”啊，“派”的，可是，成天价让他们学习、发言、揭发、批判，完全不知所措了。

为此，竟然也被拉到大会上批斗。既是批斗，少不了挖祖宗，查根源，找动机，同事们纷纷揭发平时表现，劳动怎样，有什么牢骚话，对工作、领导有什么不满。反正不管平常表现如何，到这时，一股脑儿，只有坏的，没有好的。

最不像话的，是把李义他爹拉到大会上批斗，一个罗锅小老头。两人站在一起，反差极大。记不清是不是发现“出身不纯”什么的，终于找到了阶级根源。

后记

以上这些，都是正式定性批斗或者组织处理的，其他的因为一点儿问题挨整挨批作检查就不计其数了。比如就我自己而言，一九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时，被吸收进了“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后来因为我父亲被审查，我这个昨日的“革命后代”也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清理”出那个领导小组了。总之，那时每隔一年半载就要来一次冠以新名目的“运动”，只要政治运动不断，就会不断揪出“反革命”来。

北大荒，对我们来说真是酸甜苦辣，又有着不寻常的人生价值。但是，每每想起那些个被无辜批斗、处理并为此改变了命运以至失去了生命的老职工和知青战友时，心中就充满酸楚。因为，他们就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就像我们看到有人落水呼救而无能为力、看到有人打劫伤人而不能挺身而出一样，我们每个人甚至都不能逃避责任。回想起来，我们以及我们连里那些领导谁是坏人呢？直到今天我们都深深地想念那些朴实的连干部。那么，这些“反革命”又是怎么造出来的呢？四十年过去了，如果我们以及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对此深刻反省，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被泯灭的人格、鲜血和生命呢？又怎么能创造更人道、更自由、更公正的社会呢？

(责任编辑 萧 徐)

日本战犯重到南京

叔弓

1964年3月6日，最后一批中国在押的日本战犯踏上了归途。4月，我置身抚顺战犯管理所狱中两个月，参与写作《十四年来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工作基本总结》。

时任所长金源，追忆10年前听取周恩来总理于1956年5月3日传达国家主席毛泽东在一次国务院(局)长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毅然延伸高墙深院的“灵魂再造工程”，组织上千名在押日本战犯分批外出参观，广泛接受社会视听虚实帮教的情景。

毛泽东主席说：

我们对战犯问题有个宽大的处理：准备一个不杀。现在先放他们到各处参观，不管是康泽(本文作者注：原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王耀武(本文作者注：原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主席)，或者是宣统皇帝(本文作者注：爱新觉罗·溥仪)，都让参加。前天晚上天安门放焰火，让战犯们都去看了。

既然要教育他们，就要他们看看群众嘛，这样才会影响他们。完全关在屋子里，怎么能影响他们呢？这个办法，对于一些外国朋友来说，觉得很别致很奇怪了，但实行的结果是好的。

日本战犯，也要他们参观。

于是，战犯们沿着当年铁蹄遗迹，远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1个城市的99个单位，留下了一地地追悔与见证的历史记录，踩下了一步步走向新岸的人生脚印。

远东审判追忆 圣诞前夕问绞

在当年民国首都(今南京)参观雨花台，听取参与屠城战犯的自供，日本战争罪人面对全市向30万死难者致哀。

关于南京大屠杀，远东(东京)国际军事法庭

审判的判决书浓笔写道：

中国军队在南京陷落前就撤退了，因此日军所占领的是无抵抗的市……日军单独地或二三成群地在全市游荡，任意实行杀人、强奸、抢劫和放火，当时任何纪律也没有……对一点也未开罪他们的中国男女和小孩毫无理由和不分皂白地予以屠杀，终至在大街小巷都遍地横陈被害者的尸体……中国人被像兔子似地猎取着……

这批关押在今日抚顺的日本战犯被告知，早在1946年5月3日开庭的对东条英机等28人举行的东京审判，受理文字证据4336件，有12个国家的419名证人出庭，有799人书面作证。经过长达两年又7个月的818次开庭审理和131次秘密审理(内部裁定175件)，法庭英文速记48412页，日文为10卷千万字以上，最后做出了1231页的书面判决书。

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与自杀未遂的甲级战犯、日本内阁首相东条英机一起，被远东国际法庭处以绞刑。法庭上，这个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简直是一个驯服得像绵羊似的可怜虫。英文报说，这位当年杀人如麻的大将，像一个失了业或欠薪已久的银行小书记。他吓得面无人色，魂不附体，两足瘫软，不能自支，由两名宪兵扶持，始得拖步走出法庭，于1948年圣诞节前夕问绞。

7天后，世界迎来了1949年的元旦，又开始了一个春天。南京审判前，东京审判后，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举行伯力(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判处日本细菌战犯、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等3人25年(废除死刑后的最高刑)以下有期徒刑。这是眼前这些当初关押在苏联收容所的次级战犯所不甚知道的，也是他们所不愿意知道的。他们被移交中国后，不想知道也得知道。今天，他们不仅想要知道，而且想要更

多地知道。

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法庭定讞的判决书宣读了8天时间，堪称“马拉松宣判”。判决书第5章，赫然地以“日本的对华侵略”为题，“认定对华战争自1931年以后是侵略战争”，严明指出：这期间，日本出动陆军百万，超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百年英、法、德、俄、日、美历次侵华战争兵力的八九倍（“七·七事变”）后时间连续8年，接近于百年外国侵华战争时间的总和；中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一半（富庶地区绝大部分）被占领，930座城市（占总数47%，大城市占80%）被盘踞，53座城市遭浩劫，3840家工厂被破坏，战祸灾区人口2.6亿，无家可归人口4200万，伤亡人口2100多万，军民被杀戮1200多万，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寥寥数语不啻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写真图。

当然，长达千页历历如绘的判决书，也不过只能略录其大端罢了，而种在亿万中国人心目中的此类情状之惨，要远比录存在案的那些具体得多，深刻得多，沉重得多。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人口损失总计表》如下：

| 地区 | 死亡 | 受伤 | 地区 | 死亡 | 受伤 |
|-------|----------|---------|-------|----------|---------|
| 江西 | 313249 | 191201 | 广西 | 512131 | 436045 |
| 湖南 | 92085 | 1697298 | 福建 | 7751 | 3251 |
| 河南 | 1126954 | 229939 | 四川 | 22500 | 26000 |
| 陕甘宁 | 5229 | 3536 | 云南 | 13039 | 28810 |
| 贵州 | 27406 | 17399 | 部会机关 | 5603 | 4414 |
| 华桥 | 253000 | | 冀鲁豫辽察 | | 1385539 |
| 国民党军队 | 1852458 | 1915233 | 共产党军队 | 225383 | 362610 |
| 兵役壮丁 | 3554670 | 3476811 | 南京 | 300000 | |
| 上海 | 122082 | 19775 | 江苏 | 1527661 | 298537 |
| 浙江 | 461243 | 281534 | 安徽 | 834325 | 260517 |
| 湖北 | 964129 | 1778547 | 广东 | 958741 | 816309 |
| 东北地区 | 462531 | 118741 | 劳工 | 2312830 | |
| 长城抗战 | 7543 | 10057 | 伪军 | 453285 | 554014 |
| 台湾籍日军 | 43999 | 11394 | | | |
| 死亡总计 | 20620939 | | 受伤总计 | 14184957 | |

“抽大麻有瘾，吸毒品有瘾，你们还不知道杀人也有瘾，”日军第三八师团二三联队一二队三四小队宫本见二在日本病危中忏悔，“这是一种在世界上能居首位的瘾。它能让你产生一种屠戮的快感，也能让你知道什么是生杀大权的实质，这是最刺激的人间游戏。你可以由于杀人而感到自己存在的伟大和自豪。”他说，“我和我的军人，都成了杀人狂。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1937年12月12日的南京大屠杀，所以我当时认为（我们的屠杀）这是全军的杰作。后来回国

后，听取中国军事法庭对第六师团谷寿夫将军的审判广播，才知道我们的屠杀只是他们的百分点。”

同样，新中国关押的这些战犯知道了这些，也自然明白，作为日本侵略军的一员，他们所创造的罪恶数字也包含在这笔统计之中，不必计较所占比例是几分之几，或是几十分、几百分之几，反正没有埋没就是了。

他们更知道，今天不是论功行赏，而是要论罪行罚。他们无奈，都在暗地里对号入座，各自寻找自己在被告席上的位置，衡量自我在法律天平上的分量。

松井石根，在戴着“MP”臂章的宪兵监押下，站在被告席上接受判决：“……这种暗无天日的犯罪是从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市开始的，迨至1938年2月初还没有停止……他（松井石根）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制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怠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根据起诉书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绞刑。”

1948年12月23日零点，松井石根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武藤章，进入刑场。40只电灯一齐点亮，明如白昼，如光天化日。他们4个人先步于佛堂中签名后，各自呷下一口葡萄酒，鱼贯地走上了绞架的13个阶梯，套上绞索，弹开脚板，一一离开了大地。

对照这一幅幅文字画像，眼前这些战犯无不维妙维肖地判认自我，承领罪罚也当有过之而不及。

南京审判定讞 谷寿雨花受死

重游故地参观，追悔的战犯们，最关心的是那个擢升为日本国中部防卫司令官、广岛军管区司令官的乙级日本战犯谷寿夫。

他及其手下帮凶、那个赌酒杀人300的中队长田中军吉等，1946年8月3日和1947年八月间，先后被南京政府引渡到中国上海，关押在提篮桥监狱里，等候国防部的军事审判。

他们也许不知道，这里是由公共租界工部局1901年始建、1903年5月18日启用的东方最大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前，日本战犯向死难烈士默哀

的监狱，可他们知道 1946 年 1 月 24 日 10 时，美国军事法庭借西人监舍二楼开庭审判虐杀美军俘虏的日本战犯，日军第三四军参谋长辘木正隆等 5 人，于 4 月 22 日 8 时在同监三楼被绞死。这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

1946 年 8 月 1 日，谷寿夫由巢鸭监狱被押赴羽田机场。登机前，他向东方三叩首，舌舔地面，吞咽了 3 口黄土，像一个死灵魂呆立在望乡台上，追忆 1937 年由日本率军侵华，与中岛十六师团、牛岛一八师团、末松一一四师团各部会攻南京之时，因遭中国军队坚强抗抵，血战 4 昼夜，始于斯年 12 月 12 日傍晚由中华门用绳梯攀垣而入，翌晨进城报复，留驻一旬，双手沾满鲜血而于 21 日移邻芜湖。

一天晚上，转押于南京小南门看守所的谷寿夫突然被宣布死亡，停尸市郊教会医院。南京国防部军法司特勤组特派看押少尉军官邢子健怀疑内中有诈，当夜潜进医院太平间，午夜 12 时击毙了潜狱劫人的谷寿夫手下干将冈田次郎，揭破了另一干将河野满收买看守所副所长毕尚清用特殊药丸制造假死再演太平间“借尸换人”的阴谋。谷寿夫被解押于南京特别军事监狱后，河野满又绑架看守员、夺得通行证，闯狱抢人被擒时自嚼毒药而亡。

南京审判持续到 1947 年 3 月。军事法庭全

城张贴布告索证。1000 多人举证约 459 件罪案。法医专家在中华门附近 5 处，挖出成千上万颗颅骨。

2 月 6 日 14 时，南京中山路（今 307 号）励志社彩绘的门楼上，高高挂起了白布黑字的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庭的横幅标帜。几万居民在庭外广播喇叭前收听审判实况。

战犯们被告知，谷寿夫穿着拆去了星章、绶带的日军军服，走出小营战犯拘留营，在法庭上狡展

图卸，空言抹煞，谰妄延宕，乃殊无抵赖之余地，毫不可采。

“杀了这个大刽子手！”“杀死他！”“杀死他！”旁听席上突如火山爆发的咒骂声、怒斥声、号啕声，汇合成巨大的声浪，大有掀翻屋顶之势。

检察官提供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及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等人证词，以及其他证据材料，堆积一尺多高。法官又让他在日军自己和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以及牧师约翰·马吉实地拍摄的播放 105 分钟纪录片中，在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特伯勒、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杜廷、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密斯和贝德斯等人出庭证言中，看到了自己，瞠目结舌。

法庭开列参议会调查 2784 件屠城确凿众证，痛陈如绘，至为明显，无可掩饰：“被告与各会攻将领，率部陷我首都后，共同纵兵肆虐，遭戮者达数十万众，更以剖腹、枭首、轮奸、活焚之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与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无与伦比。不仅为人类文明之重大污点，即揆其心术之险恶、手段之毒辣、贻害之惨烈，亦属无可殄全。应予科处极刑，以昭炯戒。”

66 岁的谷寿夫，东洋胡须，低着光头，脸色苍白，双目呆滞，脚穿布鞋，身穿草绿军服，强力支撑着矮胖的躯体，被关在被告围栏里受审。3 月 10 日，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宣布判决。

《战犯谷寿夫判决书》正本主文，断然写道：

被告因战犯案件，经本庭检察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执行官验明正身，说道：“你还可以最后陈述。”谷寿夫打手势要吸烟。宪兵队长递给他一支香烟。他颤抖着手笔，用日文给其妻谷梅子写下了遗嘱：“昭和22年4月26日受死刑于中国南京雨花台，身葬异域，魂还君旁，永远诀别。”

谷寿夫早知大限已到，惜时如命，竭力拖延着死神到来的时间，又迟缓地从衣服兜里掏出了一个早已备好的白绸小口袋。“袋里面装有我的头发、指甲和一首诗，请先生转寄东京都中野区富士町53号我的家属。让我的身体发肤回归故土。”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生处于濒亡体验，大都会有上乘的表现。绝命诗曰：“樱花开时我丧命 / 痛留妻室哭夫君 / 愿献此身化淤泥 / 中国不再恨日本。”

这不是迟来的人性复归，而是人性的回光返照。然后，谷寿夫的手握着笔，在笔录上签了字。然后，谷寿夫颈挂木质斩标，坐上红色刑车。然后，囚车尖声呼啸着，在人巷中驶向雨花台刑场。

“锄一兽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4月26日，南京市民倾城而出，从中山路到中华门，20里长街两旁，约10万人来到刑场，用阵阵掌声向他索命，零距离感受凶魔的末日。沿途观众如潮如涌，欢声雷动，爆竹齐放。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不到”。12时45分，时辰已到，谷寿夫得到应有下场，以其凶残的恶名遗臭万年！

今天，战犯同类们参观、拜谒雨花台，自然想到谷寿夫从这里侵来，又从这里出去，一去不复返！

谷寿夫纵兵在雨花台砍掉二三十万中国人的头；一二十万中国人又在雨花台前观砍谷寿夫的头，这是历史的必然。

杀人赛手3凶，同时同地归西

1947年12月18日，南京5万军民草鞋峡

遇难10周祭日那一天。

南京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

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故处死刑。

1948年1月18日，以屠杀竞赛为娱乐的向井敏明（1947年9月2日在东京被捕）、野田毅（1947年8月在日本被捕），与日军第六师团第四十五联队那个赌酒杀人300的大尉田中军吉一起，同时同场归西。

其以屠戮平民，以为武功，并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蠢贼，文明公敌，非予尽法严惩，将何以肃纪纲而维正义。

判决书肃纪纲，维正义，人民拍手称快，搭肩，握手，呼朋唤友，头顶万里晴空一片蔚蓝。

庆胜利，鞭炮啪啪，锣鼓喧喧；祷英烈，祭香袅袅，酒水醅醅：石头城苑红颜醉陶陶、泪滔滔。与其加害的中国受难者的殉命相比，他们这天只是“一枪之罪”，死得过于人道了。

战犯鹤野晋太郎发表观感说，把中国俘虏不经审理而当作试刀的尸体之类的事情，对当时拥有日本刀的日军军官来说是“极常见的现象”，一次也没有拿俘虏试刀的事例“倒是很少见的”。像向井敏明、野田毅那样“偶因报纸大张旗鼓地宣扬才尝苦果，‘代表’众多同罪的日本人受刑。仅此而言，也可以说这几个小军官却是不幸的倒霉蛋儿，可怜牺牲品吧！”

南京，雨花台特产的雨花石，染着中国革命烈士的鲜血。南京人民目睹日本军国主义的末日，大屠杀的阴影却在心中不能抹去。

南京，日本军国主义在这里为汉奸汪精卫建立傀儡政权，把江南佳丽之地作为压迫人民的中枢，使这个古老的城池饱尝辛酸。

“故园不堪回首月明中（亡国皇帝李煜语）。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改写历史。

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换了人间。从此，这儿欢歌笑语荡漾。扬子江上，江淮平原，再也听不到哀笛怨角了。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荒淫嗜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责任编辑 赵友慈）

龚老师 您的心愿可以了却了吗

韩 钢

这是龚育之老师在病中亲手编辑的最后一部书稿。

我在龚老师的指导下，帮助他做些编辑的具体事务。经过一年的工作，这部书稿即将问世。作为编者，我却丝毫没有功成的兴奋，反倒充满哀痛和悲伤，因为，它的作者、我最敬重的党史学家龚育之老师永远也看不到它了！

怆然掩卷，往事如昨

去年七月中旬，龚老师告诉我：李辉准备再版他的《在漩涡的边缘》一书。那是李辉主编的《沧桑文丛》的一种，一九九八年出的。龚老师觉得原书再版意思不大，考虑到那本书主要是回忆“文革”前中宣部的人和事，这些年他又新发表了一些写中宣部人和事的文章，大概有十来篇吧，他打算增添进去，改个书名。李辉当然赞成。其时，龚老师因心脏病住进医院，而且肾功能衰竭，他嘱咐我帮助他编辑这本书。

义不容辞！我满口答应

篇目都是龚老师确定的。我的工作，也就是校对文字、核实史料、编排目录，还有配发照片。李辉建议多找些照片，插在书中，增加可读性。这件事多亏龚老师的夫人孙小礼教授，她提供了不少照片。我还请朋友帮忙提供了一些历史照片。

龚老师向来严谨，认真得近乎“挑剔”。按照他的习惯，书编好之后，他一定会自己过目并动手修改的。不过，疾患在身，又是一本已发表过文章的集子，我想他这次不大可能太投入吧。我也尽力把编辑工作做得细致一些，以减少他的工作量。

然而，龚老师一仍旧贯，精益求精。他不仅修改文字，还对内容作了增补。原书《在漩涡的边缘》

作了若干文字校改，他将校改的地方折页，让秘书马伟带给我。《听毛泽东谈哲学》一篇，原来发表时有些删节；这次编书，他嘱咐我将原稿的电子文本发给他，他在病房里补充完整。修改三十多处，增加两千多字，补充的几段毛泽东谈话很有史料价值。《胡绳琐忆》一篇，有个细节我有疑问，作了改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和关锋谈话。这时，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发表，毛的谈话却没有提及。整整一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一日，毛再次在杭州同五个人谈话，谈到了姚文，谈到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记得的材料都只提到后一次谈话，以为“十一月二十一日”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之误。龚老师回复电子邮件说：那个情节不改，他是有根据的，根据的是胡绳自己的回忆，记不清是不是回忆田家英那篇，反正胡绳自己写过，是两次谈话，不是一次，后一次是前一次的继续。一查，果然不错。胡绳在《忆家英二三事》的文章里，就是那么写的。胡绳的文章我也读过，可是我却忽略了这个细节。《自序》一篇有一段话，说“文革”开始后中宣部被砸烂，这个机构就不再存在了。所有干部，被一锅端，相继到旧北京市委党校去办学习班、到宁夏贺兰县去办五七干校。任务是：斗、批、散。“斗、批、散”？“文革”中的标准提法可是“斗、批、改”，“改”与“散”字形相近，莫非是误排？龚老师回信：“斗、批、散，不是斗批改之误，因为中宣部的结局只能是散，当时对这一类机关都有此提法。”我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惭愧，更被他的严谨、敏锐、细心和记忆力折服。

说到细心，他不仅确定选目、审改内容，而且对书稿编辑的细节也有周到考虑，目录编排、照片选择都一一提出要求，连照片和照片的说明文字也让我到医院送他过目。

编好书稿，八月五日到七日，龚老师在病房里



1998年，龚育之、孙小礼夫妇摄于中共中央党校

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自序，交代这本书的原委。自序说，他无意对“文革”前的中宣部历史作总体评价，只不过是写了他的一些亲历亲见亲闻，力求不溢美也不饰非，提供一点史料，留给后人评说而已。这是他一贯的治学态度和风格。研究历史和写作历史，他从来主张从史实本身出发，按照历史原貌来写；他自己回顾往事，同样如此。

今年二月二十日，出版社寄来书稿清样。这时，龚老师因患肺炎再次住院已近两月，炎症冥顽不去，高烧时退时起，心脏病也在加重。医生严禁探视。二十二日，我打电话给孙老师，询问他的病情，请她转告龚老师：书稿清样已经收到，我会做好校对，请他安心养病。孙老师说，这几天他又在发烧，过几天医生将作会诊。

第二天，接到龚老师的电话，一是嘱咐我将书稿的数字统一为汉码（前一天电话里我告诉孙老师：清样的数字不统一，有的用汉码，有的用阿码）；二是告诉我他正在考虑要不要收入一篇写于光远的文章。这本书原来只收回忆已故者的文章，所以没有写于光远的回忆。龚老师和于老交往半个多世纪，在中宣部共事十四年，是上下级和同事，更是师生和朋友，历经风雨而友谊弥坚。龚老师回忆中宣部的人和事，缺了于光远，的确是个遗憾。我也觉得应当收入一篇，而且有篇现成的稿子。二五年，于老九十华诞。在“于光远学术思想研讨会”上，龚老师作过一个题为《祝于光远九十寿》的发言，概括于老一生的工作和贡献，情真意切，许多与会者称赞他讲得好。会后，《炎黄春秋》杂志还全文刊登了这个发言稿。

第三天，他又打来电话。我谈了想法，他却说那篇只是概括了于光远的工作和贡献，体例也与其他文章不合。他想新写一篇详细的回忆，写于光远的人品和特点，从认识于光远开始写起，题目就叫“于光远琐记”。他说有许多事情想写，文章会比较长。比如于光远和钱，八十年代有人批判于光远“向钱看”，其实于光远是一个不在乎钱的人。他还讲了一个于光远和钱的故事。中宣部里，于光远最有钱，又最不在乎钱。一个服务员偷了他寄给母亲的钱，他竟从未发现。直到东窗事发，法院通

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于光远还一问三不知：不知他的钱被偷，不知什么时候被偷，不知被偷了多少，引得严肃的法庭哄堂大笑。于光远有钱，是因为他的稿费多。他的稿费大多交了党费，也留了一些自己支配，他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赞助公益事业。电话里，龚老师说他精力体力不济，写文章恐怕困难了，准备写一个提纲，嘱咐我待他病情好转些，去医院听他谈，录音记录，然后整理，再交给他修改成稿。

这样一来，校对好的清样暂时不能退回出版社，书稿的出版也就推迟了。万万没有想到，这天的长电话，竟成了我听到他的最后的声音！

两天后，突然传来他病危的消息。二十七日，我赶到医院，医生只许在病房门口看看：床边摆着抢救设备，身上插满管子，看不清他的面容。我难过极了，心里一阵阵颤栗。

从孙老师那里，我才知道一些情况。那几天他一直在考虑回忆于光远的文章，想起了许多往事，怎么认识的于光远呀，于光远怎么到清华“选兵”呀，于光远如何在科学处“练兵”呀，于光远在“肃反”运动中怎样保护干部呀。得知身边的护工会电脑录入，他非常兴奋，还说他“发现”得晚了，早知道就好了。他口述，护工录入，写出了几页类似初稿的提纲，包括“初识”、“选兵”两节；孙老师也帮助录入，又写出“整风反右中的科学处”一节。不知是他太操劳加重了病情，还是本来病情就恶化了，二十六日凌晨三点，龚老师突然昏迷不醒，心脏和呼吸系统衰竭，心脏和肺部都有积水。经全力抢救，下午两点多才苏醒，但仍时有危险。

几天后，龚老师病情稍有稳定，但还是发烧，喉管因插呼吸机受伤发炎，尤其是肺炎症状不减，身体极度虚弱。他谈我记的打算无法实现了。三月十六日，我去医院，但医生不让探视。孙老师在医院走廊上，给我讲他的病情。令我感动的是，孙老师给了我几页提纲，字迹开头还算清晰，渐渐显得无力，后面则模糊起来。那是龚老师稍感有点精神时，在病榻上写下来的。三月初，他讲话困难，只能费力地用笔写，常常写上几行字，心率就加快，不得不停笔。孙老师告诉我，有的模糊字迹连龚老师自己都认不出来了。看着那些模糊的字迹，我不知道他付出了多少超出常人的力气！

孙老师真是一位坚强的女性。这次龚老师病危，医生已经告诉她做好最坏的准备。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现在随时可能面临诀别，孙老师强忍悲伤，一边精心照顾龚老师，一边坚持完成龚老师的心愿。她嘱咐我和她分别辨认那些字迹，打印出一个稿子；她会按照提纲，在龚老师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抓紧时间一点一点听他谈，记录整理出稿子。因为不让探视，她甚至问我还有什么要问龚老师的，她可以帮助我问，帮助我记。我听出这话里含有最后机会的意思，心情更加沉重，也油然而生起对她的敬意：这样做无疑会加大生命的透支，然而深深了解龚老师品格的孙老师，作出了帮助他完成心愿的选择。这是一种更博大、更深沉的情感。我不忍问，也不能问，只是在心里不断地为他祈祷，唯一的心愿是他能康复。

四月八日，接到石仲泉老师电话：龚老师在透析时休克，呼吸受阻，再次病危。医生当即通知党校领导到医院，报告病情危险。经全力抢救，龚老师又一次暂时脱离危险，但是情况仍很不好，继续发烧，衰竭症候更重。

四月二十八日，孙老师来电话，竟告诉我奇迹般的好消息：今天撤掉了全部抢救设备，龚老师病情开始稳定，只是还非常虚弱。撤掉抢救设备，意味着生命危险已经度过。那会儿，我真地以为，可能他会从此逐渐康复。

此后一个多月里，我时常与孙老师或他的秘书马伟通电话，询问龚老师身体情况。他的病情还是时缓时急，肺炎逐渐减弱，但心脏情况一直不好，血压时高时低，血色素也异常低，每天要做八到十个小时的血透（透析）。但是他仍然在断断续

续地口述于光远的往事，还把题目改成了“于光远素描”。身体极度虚弱的他，声音微弱，常常只谈上半个小时甚至十几分钟，就因体力不支而昏睡过去。孙老师来电话，除了谈病情，就是谈稿子，有次还要我查实：于光远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哪年出版的？她记得好像是当时唯一的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发行量很大。几个月里，孙老师整理出十一个小节的稿子，大部分给他读过，开头和第一、二小节还读过三四遍，他亲自作了修改。他嘱咐孙老师，每个小节分别打印，他好些后要一节一节地仔细修改补充。病重到如此程度，龚老师依然如此镇定和坚毅，依然那样细心和严谨。医生不得不多次“干预”，但是龚老师还是没有停歇。孙老师后来告诉我，医生有禁令，他们就偷偷口述和记录。护士都被感动了，为他们“打掩护”。

六月十一日晚，又一次传来龚老师病危的消息。我以为生命顽强的他会再次抛开死神，但是第二天上午九时，他竟撒手人寰！

龚老师终于安息了。

活着的人们却陷入了极大的悲痛！

他去世后，我常常问自己：最后这些日子，龚老师是透支生命来坚持工作，还是坚持工作以延续生命？细细想来，我的问题真是多余。对这位生命不息、思考和写作不止的学者而言，生命与工作的意义难道还有什么区别吗？

这些天，怀着巨大悲痛的孙老师，料理完龚老师的后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完龚老师未了的文章。说是写完，其实也还是未了：提纲上列出的问题，龚老师并没有谈完，这只能成为永久的遗憾了。完稿之后，孙老师像龚老师那样一丝不苟，分别打电话或送稿给中宣部原科学处的几位同事以及于光远本人，请他们核对事实，提出意见。再经修改后，本书的封篇之作《我的第三个上级——于光远素描》定稿。这是龚老师一生中最后的文字。

书稿到这时终于可以编就了。我又一次潸然泪下，默默地问他在天之灵：

龚老师，您的心愿可以了却了吗？

（二 七年七月十六日改定于千翠山下）

（本文为《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编后记，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本刊发表时有个别文字修改，标题为编者所拟）

《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读后

章立凡

2007年11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本人忝为民主党派成员，在认真研读了这一文件之后，决定试用一下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承诺的“表达权”，谈谈读后感。

白皮书谈到：“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日益发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也将不断发展”。在政改呼声日高的今日，出台这一文件，是否意味着中国现行政党制度也将列入改革议程，白皮书没有说，但强调要“坚持和完善这项基本政治制度”，说明该项制度还不够完善。从历史上看，也确有必须反思之处。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各方的共识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民主宪政是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共识，在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已有系统的表述。

虽然中共在新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共同纲领》并未从文字上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毕竟是个民主大宪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才出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及“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容。

民主党派在新政权中的地位，是联合政府的成员（当时没有“执政党”与“参政党”之分）。非中共人士约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的半数，三人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人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两人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二十人出任政务委员和部长职务。1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在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副总理位子上的民主党派

领导人，皆转任人大副委员长。

民主党派被认为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1953年毛泽东提出中共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98页）。在1954年宪法通过的同时，以国家资本主义取代私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进程已经开始。到1956年“对资改造”结束，民主党派所代表的经济成分被消灭了。

当时中共面临两种选择，是继续搞阶级斗争，还是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56年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以使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上，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学术文化上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后来形成了一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他还提出：“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就有点像国民党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5页）。周恩来也指出：“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刘少奇等在改行“两院制”以加强政协监督的议题上，与当时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形成了互动。但在经济建设方针上，毛泽东对政治局“反冒进”的集体决策持反对意见，声称自己是“反‘反冒进’”的。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认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

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9页),对其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7页)。

1949年以后,民主党派作为政治盟友,在一定程度上保有批评中共的表达权。自1956年下半年起,民主党派人士的批评在一些内部会议上出台,当时中共也提出要保护“唱对台戏的积极性”。1957年夏季以后,“对台戏”戛然而止,变成了“一言堂”。民主党派沦为改造对象,长期被戏称为“政治花瓶”。

党外民主的消失是党内民主消失的前奏,随后便发生了清算“反冒进”、推翻“八大”决议等一系列个人专断行为。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党外已无公开的异议,党内的不同意见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也失声了。没有了科学与民主的发展观,发生惨绝人寰的三年大饥荒和祸国殃民的十年内乱,就不足为怪了。

毛泽东逝世后,中共回归“八大”路线,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工作为中心”,并实行改革开放,被改造并停止活动多年的民主党派,一度焕发出政治热情。1989年重大政治事件后,中共中央下达【中发】14号文件,首次明确了中共为“执政党”,民主党派为“参政党”。虽然“联合政府”的概念早已消失,现行宪法也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但对上述政党定位尚无表述。

白皮书认为:“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意志,也必然要归于失败”;“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争斗,避免了政党互相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同时也承认“1957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间,中国多党合作制度遭受严重挫折”。但对于这种严重挫折的历史教训,我以为还没有过认真的深刻的反省。

西方政治制度当然有它的弊病,例如政党胜选后的公职分配,就经常被指责为“政治分赃”。中国自清末开始的政党政治,带有浓重的会党政治色彩,家长制、黑箱操作和残酷斗争是其主要特

征。如果将西方政治概括为“政党互相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则从民主承诺蜕变为“一言堂”的历史,也同样造成了倾轧和内乱,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遭到严重挫折,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若继续兼承中西之弊,前途只能是专制独裁加腐败,也必然要归于失败。

白皮书首次提出了民主党派的“社会整合”功能。历史上的民主党派,曾是一种中间势力,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起到缓冲和调停的作用,共和国成立后也曾两度试图调解社会冲突,但都不成功,反而令自身处于尴尬的地位。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转型中的矛盾日益尖锐,中共不得不独自应对内外各方的压力和批评。胡锦涛出任中共总书记以来,频频释放出提升民主党派统战价值的信号,试图重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今年,两位党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长,中共十七大提倡“党内民主”及白皮书对“党外民主”之表述,更使这种信号达到高频。

中共中央统战部新闻发言人就白皮书发表谈话说:“中国的民主党派不像西方政党那样以夺取政权为目的,而是与共产党团结合作。它们通过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可以有效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其所联系群众的意愿和利益也能得到体现和维护。”无须过虑,民主党派从来不具备“夺取政权”实力,历经多年改造后,甚至连唱“对台戏”的嗓子都没有。假如现在让它们上台,像我这样的普通成员也不赞成。

民主党派创立时的理想是反对一党专政,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上世纪50—60年代,通过乌托邦式的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80年代改革开放后,又形成了企业家和白领等新的社会阶层,历史走了一个大轮回。在执政党宣布自己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同时,民主党派却宣称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组织体系、经费来源、群众基础等,这些特征都不适用于“中国特色”的民主党派。它们须按半个多世纪前划定的领域发展组织,目前全国有71万多民主党派成员,不足中共人数的百分之一;人事安排须经中共首肯,并有一定数量中共身份的“交叉党员”在领导岗位上;党派办公和运转经费,全

部由国库开销，其工作人员也正式纳入公务员编制。民主党派已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而且完全机关化。

由于利害一致，保持“长期共存”“荣辱与共”易；因为地位不同，实现“互相监督”和“肝胆相照”难。从白皮书看当前民主党派的参政记录，基本上是经济及教科文卫等领域的修补工作，对国人所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监督和公民维权等方面，未见有所建树，其监督功能我以为尚不及社会媒体和民间互联网。

民主协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方法之一，但不等于一团和气的内部包办，也替代不了民主监督

和民主选举。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目前尚未得到广泛切实的保障；《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崇高法理依据，1949年后被各民主党派作为政纲使用迄今，但其中“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规定，还有许多地方仍停留在纸面上。

58年来的社会变迁和反复转型，诸多利益关系发生变局，导致社会进步也使矛盾激化，这迫使朝野各方重新解读民主。回归建国共识，建设民主宪政，这恐是中国社会走向和谐的正道。

2007年11月19日风雨读书楼

(责任编辑 萧 徐)

| 书 名 | 作者或主编 | 定价 | 邮 费 |
|--------------------------|---------------|-------|------|
| 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 | 李向东 王增如 | 34.00 | 7.00 |
| 河南大饥荒 | 宋致新 | 22.00 | 5.00 |
| 淮海战役秘密战 | 夏继诚 | 33.00 | 7.00 |
| 辽沈战役秘密战 | 松 植 | 35.00 | 7.00 |
| 平津战役秘密战 | 松 植 | 36.00 | 7.00 |
| 人生至理的追寻 | 梁漱溟 | 35.00 | 7.00 |
| 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上下) | 程美东 | 68.00 | 8.00 |
| 综合哲学随笔 | 高亮之 | 22.00 | 5.00 |
| 牛棚杂忆 | 季羨林 | 29.00 | 6.00 |
| 日记的胡适 | 李伶伶 王一心 | 29.80 | 6.00 |
| 张国焘传 | 姚金果 苏 杭 | 39.80 | 7.00 |
|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 | 杨继绳 | 36.00 | 7.00 |
|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 唐筱菊 陈少铭 | 38.50 | 7.00 |
| 1949年后的梁漱溟 | 汪东林 | 23.00 | 5.00 |
| 红墙见证录(上、下) | | | |
| ——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 尹家民 | 69.80 | 8.00 |
| 学问人生(上、下)——中国社科院名家谈 | | 79.00 | 8.00 |
| 定西孤儿院记事 | 杨显惠 | 25.00 | 6.00 |
| 庐山会议实录 | 李 锐 | 18.00 | 5.00 |
| 赫鲁晓夫回忆录 | (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 29.00 | 6.00 |
| 沧桑十年——1966—1976 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 马识途 | 38.00 | 7.00 |
| 是药三分毒 | 刘弘章 | 38.00 | 7.00 |
| 风雨彭门 | 滕叙究 | 35.00 | 7.00 |
|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 冯建辉 | 29.80 | 6.00 |
|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 张素华 | 28.00 | 7.00 |
| 冷石斋沉思录 | 吴 江 | 16.00 | 5.00 |
| 季羨林谈读书治学 | 季羨林 | 19.00 | 5.00 |
| 季羨林谈人生 | 季羨林 | 19.00 | 5.00 |
|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 张树德 | 69.80 | 8.00 |
|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 朱元石整理 | 26.00 | 6.00 |
| 普洱茶健康之道 | 周红杰 | 39.80 | 7.00 |
| 松针养生革命 | 董看看 | 39.80 | 7.00 |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叙述了1949-2005年间中国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其深刻经验教训。书中收集的突发事件每一个都具有标志性意义，第一次农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共和国史上第一个导致副总理被处分的“渤海二号”石油沉船事故；第一个导致部长被撤职的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

《沧桑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的那场空前灾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天的年青人已难以置信，那些曾受过迫害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作者真实、公正、客观地写下了当年的遭遇，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教训，目的是杜绝惨绝人寰的悲剧重演。

《赫鲁晓夫回忆录》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涵盖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几个重要历史时期，自1964年失去党和国家的一切职务后开始写自己回忆录。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披露了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苏联最高层的重要活动，介绍了某些政治事件的始末。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日记的胡适》胡适自16岁开始，直至去世的前三天，共留下二百多万字的日记。从日记看胡适，这位中国新文化的弄潮儿与代表人物展现给我们的，必定不只是他人生中精彩的一面，或许更多，我们将看到隐秘于那些琐碎文字背后映射出的个性和真实自我，那便是一番别样的风景了。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读毛泽东关于“大串联”的谈话

金大陆

据 1966 年全国在校大、中学生的统计，大学生为 53 万 4 千人，中专生为 47 万人，中学生为 1249 万 8 千人（燕帆，《大串连》，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 页。）。如此庞大的青少年人群，因“革命”而有资格、有机会“乘车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吃饭不要钱”（称“三免费”）在以北京为轴心，以各大省会城市为连贯的天南地北间或奔走呼号，或游山玩水，不仅是文革运动的卓诡，恐怕在人类迁移史上也属特异的绝殊。

严格以文件为准，从 1966 年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通知“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到 1967 年 3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决定》：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联，并取消原定春暖后再进行第二次大串联的计划”，整个大串联的时间跨度为半年。可从缘起上探究，再从后续上跟踪，可见整个大串联是伴随着 1966 年 6 月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出笼而兴起；1966 年 8 月至 11 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而达到高潮；1967 年 1 月上海“一月革命”夺权后，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渐渐从社会返回校园而消退；1967 年下半年各级革委会相继成立，各级红卫兵组织的功能趋于式微而停息，前后大约持续一年多。

红卫兵大串联究竟是由下而上自发兴起的，还是自上而下发动促成的？应该承认，这是两个方面互动的结果，是两个方面合力的作用和显现。

1966 年 6 月 1 日，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报了。于是，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北大，北大校园人山人海。当时北大“还特地在聂元梓等人张贴大字报的地方，用桌子搭了一个讲坛，各单位群众排成一字长蛇阵争先恐后地跳上桌子发言，以表示对聂元梓的支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2 页。）。不久，西安、长沙、天津等地

发生了学生与当地领导部门的冲突事件，一批批学生便滚雪球般地奔赴北京上访取经。据不完全统计，从 1966 年 7 月 29 日到 8 月 28 日的一个月中，仅到北京大学串联的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多万人次，其中 8 月 12 日一天就达 17 万人次（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0 页。）。同时，北京学生的特殊的政治身份——由首都的政治地域的性质所决定——便被大多数外地学生簇拥着、信赖着，即一般外地学生多为诉说者、寻问者；北京学生多为倾听者、指点者。正是通过这样的接触和沟通，北京学生徒然升腾起一种“救世主”的情怀和气派，便气势如虹地“杀”出京城，展开了北京红卫兵运动史上称作为“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行动。其中，上海是北京红卫兵“南下”的主要目的地。

如果说发生在 1966 年 6 月，人们涌向北大声援聂元梓仍属于北京市内群众间的串联活动，尽管这已超越了单位，超越了行政管辖，显示了“走向社会”的趋动；那么，接着发生在 1966 年 7 月—9 月，大批的外地学生赴京，大批的北京学生赴外地，则说明整个串联活动已超越了地域，超越了行政区划，显示了“走向全国”的态势。且这种从“走向社会”到“走向全国”的跃迁，正是以北京为首的全国的红卫兵们集体运动的结果。

与此同时，在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以后，针对各地的青年学生揭竿而起的造反行动，有史料证明毛泽东于 6 月 10 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毛泽东还说：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哪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了敌人，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3 页。）。在此，从大串联研究的角度看，不仅 6

月上旬的时间是十分重要的，还必须抽取并把握住几个关键词如“去北京”、“免费”、“乱”等，这说明毛泽东在运动初期的思考中，就已经形成了类似“大串联”的预判，并准备积极地推进。所以，后来当天津大学等校的部分师生造反时，徒步向北京进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闻讯后，立即派火车到杨村车站，把他们接到北京（燕帆，《大串联》，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据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记：这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军装），首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面对浩浩荡荡的串联大军，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6页。）。此时，毛泽东不仅对这个场面和结果是满意的，对导致这个场面和结果的过程，即大串联运动也是满意的。十天后，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学生“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接着，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示大串联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并潇洒地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多，这是借口”（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8—1439页。）。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意见和态度，在毛泽东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正式发出《通知》，强调“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在京时的经费由国家财政开支”，从而把大串联运动推向了高潮。

在此，之所以大量引用国家权威出版机构新近公布的毛泽东关于大串联的谈话史料，一是为了替本文立定一个坐标，以瞄准和把握红卫兵大串联运动的来龙去脉；二是为了证明，从大串联的

缘起到大串联的勃兴，其驱动，其路径，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志和思想来展开的。且联系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交错关系，可发现在红卫兵大串联的问题上，群众的诉求与领袖的指点，群众的情绪与领袖的意志，在以“革命”的名义下，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和统一。

然而，恰恰是红卫兵大串联（从肇始时超越单位，超越行政管辖的“走向社会”；到勃兴时超越地域，超越行政区划的“走向全国”（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现在的学生“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为文革运动发动以来闯下的第一个天大的“祸”。因为正是在这次关涉红卫兵大串联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9页。）。这就是说，毛泽东原本存在着1966年底结束文革运动的设想，因为大串联搅动得全国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便延长了这个时间设想。确实，红卫兵运动已通过大串联，突破了固有的组织依附和区域管辖，构成为一种青年特征鲜明、自由度大、流动性强的社会势力。且各红卫兵组织之间又因立场和利益的歧异，而形成了一种团体特征鲜明、独立性强、战斗性强的社会集团。于是，它们要行动，要张扬，要团聚人力和占据领地，它们怎么可能很快、很自动、很轻易地刀枪入库，听从召唤呢？换言之，即便文革运动的具体内容如批判“三家村”、揪斗“走资派”等很有震撼力，甚至“夺权”行动等很有爆破力，若是一直被限定在原有的各级行政管辖范围之内展开和动作，即没有红卫兵大串联所导致的打开所有单位和区域的门户，以致各阶层的群众奔涌而出，完全在一个无政府主义化的背景下，重新按照“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标准划分和集合力量，文革运动的节奏和收放，大致会被毛泽东把握在所设定的时间表中。

综上所述，红卫兵运动（青年运动）的非理性倾向和毛泽东的政治意识，决定了大串联是必然要发生的；而大串联又决定了文革运动必然是要失控的。正是立足在这个意义上说，大串联是文革运动发动以来闯下的第一个天大的“祸”，而这个天大的祸，只能由天大的代价来补偿了。

丁玲与毛泽东一次谈话的真伪

徐庆全

1993年,《炎黄春秋》第七期上发表了杨桂欣的文章:《我丁玲就是丁玲》,披露了丁玲与毛泽东餐后并一起泛舟中南海时的一次谈话。文中转述丁玲的回忆是这样的:

……让我最后悔的,还是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的时候,江青也在中宣部挂职。一天,中宣部开会,江青来了。上午散会时,江青突然对我说:“丁玲,中午到我们那里吃饭去。”我说:“这怎么可以呢?”江青便拉下脸来:“你以为是我让你去的吗?”我明白了,便跟她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午饭。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这次,主席先问我对周扬的看法。看来,他这次找我,就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问我:“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吧?!”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做人,为什么不先说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呢?一个人,一个革命者,都是既有优点和长处,也有缺点和毛病的,应该一分为二呀,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偏偏忘记了一分为二,忘记了谈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后悔也来不及了。不等我补充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便对我说了:“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毛主席说的是实际情况,我当然服气。但我为什么在他征求我对周扬的意见的时候,竟一个劲儿说周扬的缺点而不说他的长处呢?

毛主席这次找我谈周扬后,我就很少到毛主席那里去,甚至根本不去,也没有产生过主动找毛主席谈情况、谈心的念头。现在想来,这是自己吃大亏的一个客观原因。要不然,我也常去找找主席,那么,那些打我“小报告”的人,不管他们用嘴巴,还是用作协党组报告的名义污蔑我,是决不会容易得逞的。这就是教训啊!

其后,关于这段历史事实的陈述,杨桂欣在文章中几次都写到了,但叙述文字却有了删改。

2000年,在将本文收入《别了,莎菲》一书时,特意注明“作者作了修改”。缺了这一段:“看来,他这次找我,就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但增加了这样一段:“康濯调回北京之初,我去看望他,谈起丁玲在毛主席面前说周扬这回事,康濯说:这是真的。丁玲同志当时在《文艺报》一些同志中间,勉励我们要记住她的这次教训,对同志要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充分肯定人家的优点。”^{注1}

2002年,作者在《毛泽东与丁玲关系始末》一文中,对此事的回忆又有修改,具体的字句改动不细说,只说大的修改。修改有两处:一处是,删掉了“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一句。一处是,将“看来,他这次找我,就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仍然删掉,改为“我先说周扬同志的缺点”。此外,明确地加上了毛与丁谈话的时间:“195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注2}

作者何以在丁玲去世后不能再进行核对的情况下作这样的修改?大致来源于丁玲的丈夫陈明对此事的态度。

2001年2月13日,陈明首次对这一记叙断然否定。他在接受邢小群的采访时说:“至于你提到毛主席在中南海和丁玲划船,纯系讹传,到颐和园看望丁玲确有其事。”^{注3}

杨桂欣自丁玲1979年复出直到1986年去世,一直与丁玲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是丁玲晚年身边的人之一,他的记叙不会是空穴来风。而作为丁玲的丈夫陈明,与丁玲的关系更不消说,如果杨桂欣知道此事,陈明自然更应该了如指掌。何以会出



丁玲

现两个“身边人”为一条材料打架”的事情呢？

抱着这样的疑团，2002年3月8日，我曾致信陈明讨教，但未得回音。为何讨教，是因为从几个当事人的回忆来看，这一记叙是真实可信的：

第一、前边说过，杨桂欣属于丁玲身边人之一，他在2000年修改关于此事的记叙时特意加上了康濯的说法，旨在说明他的记叙有康濯为证。杨的说法在康濯的回忆里的确能找到佐证。康濯回忆说：

我早听她讲过，那几年她两次单独见过主席。一次是上午在中宣部开过会，主席叫人找她去吃饭，饭后又邀她在中南海游艇上谈话。另一次是她住在颐和园云松巢写作，一天，主席由罗瑞卿同志陪同去游园，也到云松巢坐了一阵。不过，丁玲同志没有和我说过，那两次都谈了什么话。现在（指建国初年丁玲和康濯谈话谈起周扬之时——引者）她介绍了所谈的内容之一，说道：“主席讲，周扬有两个优点。”她避开了主席讲的具体内容，再一次呵呵呵笑道：“周扬同志当然优点不少哇！他对青年作家的关心和培养，不也是一条优点？呵呵呵！”^{注4}

第二、丁玲也曾经向黎辛简要讲述过这次见

面。80年代，黎辛就1955年丁玲为什么不向中央申诉向丁玲提出疑问时，丁玲回答：建国初她向毛主席说起过周扬，毛主席表示周扬有缺点，但他会做行政工作与写评论文章，丁玲认为毛主席信任周扬，不想向他申诉。^{注5}

由此说来，陈明的否定颇有武断之嫌。不过，陈明的断然否定，倒让杨桂欣有些难堪：“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了，收回去自然不可能，就尽量作一些“修改”吧。于是乎，先是把丁玲“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的一段话删掉，后来发现“听着”之前没有来由，就又改为“我先说周扬同志的缺点”——好像丁玲还准备向毛表扬周扬、只不过因为毛打断了她的话她才没有机会说似的；继而又删掉了“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一句。其次，加上一段康濯的话，再加上“195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的具体时间，^{注6}以证明确有其事。

接下来的问题是，陈明何以要否定此事？

首先，是陈明为保持丁玲的“完人”的心态所致。在丁玲去世后，陈明自觉地担当起丁玲“完人”形象的守护者的责任来，对当事人有关丁玲的回忆、学界有关丁玲研究的文章，只要在他看来与“史实不符”——事实上大致是与丁玲的“完人”形象不符，就或写文章或利用访谈提出异议——读者若有兴趣，只要把1986年丁玲去世后陈明发表的文章列出一个目录就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属于此类。具体到杨桂欣所述此事，丁玲显然是向毛“打”周扬的“小报告”——借用丁玲的用词。在陈明看来，未免有失丁玲的形象。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陈明明白，这条材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此后丁玲厄运的“青萍之末”。

第一，在杨桂欣1993年的文章里，丁玲把问号留给她的听众，但答案却不言自明：在丁玲看来，周扬不管有多少长处，显然不适合担任中共在文艺界领导人这一职务。

而此时，恰是毛泽东因胡乔木在第二次文代会的筹备过程中取消文联的举动而大发脾气、舍胡而取周扬之际，丁玲这样喋喋不休地讲周扬的缺点，的确是犯了一个大忌。至于这个大忌是什么，可以与胡风当年上三十万言书作一比。

2002年，原被称为“胡风分子”的绿原，在为《胡风三十万言书》出版所作的序中写道：

几十年之后,尘埃落定,痛定思痛,不禁茫然。当年胡风……所选择的上书言事,……直到理所当然而又顺理成章的后果一出现之后,这才使人醒悟:最高领导和文艺领导毕竟是二位一体,后者和胡风在前者眼里,毕竟有党内外的亲疏之分;胡风在“三十万言”中忽视了这个一体性,向前者控诉后者,不但被讥为所谓“清君侧”的阴谋,犯了以古例今的时代错误,而且由于“为乐观估计所蔽”,忘却“疏不间亲”、“投鼠忌器”等浅近道理,犯了尤其令人遗憾的常识性错误。^{注7}

当年丁玲的处境虽然比胡风要好得多,但她却不明白“最高领导和文艺领导毕竟是二位一体”的道理,也更忘却了“‘疏不间亲’‘投鼠忌器’等浅近道理”。她的思维惯性使她依然在几年前、十几年前的原有轨道上运行,她胸中充溢的是业已形成的对周扬的敌视情绪。她仍然以为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只是像过去一样仅仅表述自己的看法而已,因而根本忽略了这样的因素: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复是那个当年与她随意交谈的人了;而此时周扬能在文艺界担纲同样是毛泽东的意见。因为“犯了尤其令人遗憾的常识性错误”,所以丁玲的话打在周扬身上,事实上,也打向了毛泽东。丁玲得到毛泽东的批评是必然的。自然,丁玲也从毛对她的批评中得到了另一种答案:周扬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

第二,透过杨桂欣(抑或是丁玲)刻意轻松地叙述的场景来看,毛对丁玲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地位,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说话一言九鼎自不必说,即使是与他一起走向政坛的老朋友,偶有不慎,说错了话,办错了事,也常常命运不济。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不需多说。就以胡乔木筹办第二次文代会因要取消文联而让毛发脾气这件事,即可看出这一点。胡跟随毛已经十多年了,不管从那时在党内的资历还是从与毛的关系来看,都是丁玲所不能匹敌的。胡的命运尚且如此,况丁玲乎?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实是毛批评人极为严厉的话了。得到这样严厉的批评后,丁玲自然明了了局势,所以此后不但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更不能有“主动找毛主席谈情况、谈心的念头”了。即使在1955年遭受批判被戴上“反党小集团”的帽子,丁玲也不敢涌起找毛的念头,“不想向他申诉”,甚至

连陈企霞那样写封匿名信的勇气都没有。这不仅因为“毛主席信任周扬”,更因为她明白,对她的批判,不是周扬而应是毛,只不过她不愿意明说而已。

而对于把1955年批判丁玲的发轫归结到毛那里,则是陈明(包括丁玲)一直不愿意正视的,陈明否定这条材料,似乎透露了这种信息。

顺带指出,在此事中,丁玲提到了江青,并描述了江“拉下脸来”的形象。有材料显示,在江青和丁玲都在中宣部任职的时候,丁与江走得很近。围绕着《清宫秘史》、《中朝儿女》以及《武训传》等影片,“江青和周扬意见不一致,发生争执”时,丁玲曾“主动找到江青,说要写几篇文章,批判周扬和他电影审查中的错误立场”,江青并不认为丁玲能胜任这样的任务,以“这样深刻的争论不是丁玲的笔所能单独解决的”为由,予以回绝。^{注8}

注1 丁言昭编选:《别了,莎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页322。

注2 杨桂欣:《丁玲与周扬的恩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325页。作者在此前出版的《我所接触到的暮年丁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中的记载与此相同,参见该书83页。

注3 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194页。关于毛泽东在颐和园游园时顺路看望丁玲一事,陈明写过、讲过多次,在与邢小群谈话时又详细地讲了一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注4 康濯:《一颗乐观、开朗的心——深切怀念丁玲同志》,载关鸿、余之、成平主编:《生命从80岁开始》(珠海出版社,1995),187页。

注5 黎辛:《丁玲,我第一个上司(下)》,载《文艺理论与批评》第3期(1999)。

注6 应该说,杨桂欣加的这个时间是大致准确的。丁玲在1952年8月就提出辞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职务,而江青在这年8月到苏联疗养,直到1953年秋才返回北京(叶永烈:《江青画传》,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页126)。此后,两人再也没有在一起工作的机会了。

注7 绿原:《试叩命运之门——关于“三十万言”的回忆与思考》,载《胡风三十万言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27—28页。

注8 《维特克 江青 一书中有关文艺问题的资料摘编》,16页。这是一份油印的材料,没有标明油印单位和时间。时间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

1920 年的世界革命 与苏波战争始末

王天兵

—

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间，人所共知是 1921 年 7 月 1 日。一位中共党史研究者发现，早在 1920 年，陈独秀就已在上海成立过相关组织，实为中国共产党的前身，确切的发起日是 1920 年 7 月 19 日。但这位研究者至少在那篇文章里没有深究为什么是 7 月 19 日。这个日子又有何特殊意义？

需要从头说起。

1920 年，列宁发动了一场“世界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这场革命运动的一个分支。这场“世界革命”发轫于迄今已被人遗忘的一场战争——“苏波战争”。在中国，不要说普通读者，就是俄国专家学者，对其也不甚了了。实际上，在前苏联历史教科书中，对“苏波战争”要么闭口不谈，要谈则往往是数语带过。

中国读者对“苏波战争”如果还有印象的话，仅始于那本曾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青年的革命圣经，至今仍被国家教育部定为中小学必读书的“红色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曾在一次战争中被炸弹炸伤后复员。这次战争就是“苏波战争”。可是，该书作者是否参加过这场战争？已多有专家著文表示怀疑甚或否定。

另有一位俄国作家却的确参加了这场战争，而且还给我们留下了两本珍贵的以此次战争为背景的著作。这个人就是伊萨克·巴别尔；这两本著作分别是巴别尔 1920 年在“苏波战争”中的军旅日记和以此为基础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骑兵军》。

二

在中国，最早提及巴别尔的是鲁迅先生。鲁迅在致李霁野的信中曾提及读过巴别尔自传。巴别尔作品的第一位中译者是周扬，第一篇被译成中文的巴别尔小说是《路》，收入以其命名的苏联小说集《路》中，由文学出版社于 1936 年 8 月在重庆出版。这是巴别尔中国之旅的起点。

可是，直至 2004 年，虽然已有不同版本的《骑兵军》中译本问世，巴别尔在中国仍鲜为人知。过去三年，笔者致力于巴别尔著作的重新翻译及推行工作。至今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三本由笔者编订的巴别尔著作，包括小说集《骑兵军》、《敖德萨故事》（戴骢译）的插图本，以及 1920 年日记的插图注释本《巴别尔马背日记》（徐振亚译）。笔者的新著《哥萨克的末日》，根据《巴别尔马背日记》这本第一手资料，参考其他数十种相关文献，从宏观到微观全方位地复原了 1920 年的“世界革命”及“苏波战争”的全过程。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沙皇逊位，俄国内外交困、自顾不暇。波兰的民族主义者不但于 1918 年趁机建立了独立的波兰国家，而且梦想一举恢复 17 世纪前横跨波罗的海、黑海的波兰王朝。他们顺势侵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尚属旧俄的乌克兰、白俄罗斯。而此时，俄国内战已近尾声。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已经稳固，他要凭借内战锤炼出的铁军打击波兰侵略者。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将从

德国工人中间开始。列宁在 1920 年发动“苏波战争”就是梦想在攻克华沙后直捣柏林，引发德国工人起来暴动，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在 1920 年出现的共产主义组织，是列宁同时向两个方向传播“世界革命”的结果。1920 年 4 月，一位中文名为吴廷康的俄国犹太人（俄文名为维京斯基、或维金斯基）来到北京，见到李大钊；然后南下上海见到陈独秀，遂将“世界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达给他们。陈独秀在吴廷康建议下召开了相关会议，《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译本也于同年问世。

当时，俄共的另一位领导人托洛茨基虽和列宁一样认为共产主义不能只在一国实现，但他深察这场战争风险之巨，故而反对出兵波兰；而当时苏维埃肃反委员会——契卡——的主席捷尔任斯基，本身就是一个波兰共产党员，他曾警告说，一旦红军入侵波兰，那无论是波兰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就会同仇敌忾抗击俄罗斯。何况，俄波自古以来就征战不休——君不见莫斯科红场上五彩斑斓的瓦西里大教堂旁，矗立着的米宁和扎波尔斯基大公双人青铜像，就是为纪念这两个民族英雄在 1614 年 11 月领导俄国义勇军赶走占据莫斯科两年之久的波兰侵略者。而至 18 世纪，俄国曾三次参与瓜分波兰，致使波兰亡国。

不过，当列宁做出决定之后，不但托洛茨基等人竭力相助，连很多旧俄老将军也加入红军、共赴国难。

四

当时，托洛茨基任红军最高指挥部——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负责前敌总指挥。攻打波兰的红军兵分两路，27 岁的军事天才图哈切夫斯基指挥北路红军，用他的话说，他要用刺刀带给波兰的工农幸福与和平。而南路红军的统帅是叶戈罗夫，政委是斯大林。图哈切夫斯基和叶戈罗夫后均成为苏联元帅。

从 1920 年 5 月下旬到 7 月上旬，这两路红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在南路红军中，有一支骑兵军令波兰军人闻风丧胆，他们从克里米亚半岛北部跃进一千公

里，攻克乌克兰首府基辅，再突入三百公里，其军长和政委分别是后来也成为苏联元帅的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这支部队的主要成员就是赫赫有名的哥萨克。

哥萨克是什么人，又来自何方？

俄国传统的说法认为，哥萨克源于伊凡雷帝时代逃到顿河、第聂伯河流域的斯拉夫农奴，可在十五世纪前的俄罗斯史籍中几乎没有任何对哥萨克的记载。而十五世纪正是蒙古汗国的衰落时期。成吉思汗及其后代不但征服了中国，还征服了匈牙利、印度、阿富汗，征服了莫斯科地区、基辅地区，他们将小国林立的地区合并成一个个庞大的蒙古汗国，中国的元朝不过是这些汗国中的一个而已。蒙古人的势力从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大概维系了两百多年。遥想十三世纪的俄罗斯，大片地区荒无人烟，是蒙古人用武力联通各个小公国，建立金帐汗国，奠定了未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也将蒙古文化播撒在大片原是不毛之地的中间地带，比如顿河、第聂伯河流域。

随着蒙古汗国的衰落，俄罗斯帝国开始崛起，哥萨克也悄然出世了。他们是蒙古人、斯拉夫人、波兰人、土耳其人等人种的混血儿，而他们继承的正是以剽悍的蒙古人为主导的游牧习性。说他们来自逃跑的农奴是俄罗斯人将少数民族妖魔化的偏见。

这时的哥萨克在几个大帝国间自由自在地靠剪径劫财、放牧捕鱼过活，他们兼做穿行于顿河、第聂伯河流域的商队和旅人的私家保镖。但到了 16 世纪中期，他们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

俄罗斯的第一位沙皇伊凡雷帝，用金钱雇用原是散兵游勇的哥萨克冲锋陷阵，击败蒙古后裔，侵吞了喀山汗国。从此，哥萨克这个群落就沦为沙皇的鹰犬、开边的利器。瓦西里教堂就是伊凡雷帝为纪念喀山战役而树立的纪念碑。从此，一代代沙皇开始了无休止的两面征战。至 19 世纪初，哥萨克在抗击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中，曾凭借机动灵活的轻骑战术，把欧洲历史上最强大的一支军队拖垮，直追至巴黎门下……。三百多年来，哥萨克参加了沙皇指挥的所有战争。直到清朝末年，在中国边境制造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的罪魁还是哥萨克。

1920 年，列宁要把共产主义传到全世界，哥

萨克又成了得力的急先锋。

但他们在波兰都干了什么呢？可以说是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哥萨克和波兰人也有世仇。早在 17 世纪，乌克兰哥萨克赫麦尔尼茨基就曾统领乌克兰和波兰决战，虽然战败，但使原属波兰的乌克兰并入俄罗斯。这是波兰王国走向衰败的开始。赫麦尔尼茨基自己也归顺了沙皇。另外，赫麦尔尼茨基因为信奉东

正教，对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持有宗教偏见，1920 年，哥萨克虽然改宗共产主义，所作所为却和其祖先如出一辙，哥萨克所过之处，到处捣毁天主教堂、杀害天主教神父。还有，哥萨克和蒙古人一样，行军打仗不自带粮草，全靠沿途抢劫为生，百姓往往倾家荡产、许多女性遭到强奸。

列宁想拯救被波兰地主贵族压迫的波兰工农，结果波兰工农兵和地主贵族却团结起来，一致抗击俄国人。这场“世界革命”也就成了一场民族战争、一场宗教战争。

这场变质的“世界革命”迅速席卷了全世界，几乎酿成了又一次世界大战。当时，英、法、美等列强均支持波兰，或声援、或派驻军官、或运送军火——一个年轻的法国军官在这场战争中亲身体会了民族主义压倒意识形态的力量，他就是当年年仅 29 岁的戴高乐。

就在哥萨克骑兵军即将和北面的红军汇合，一举攻克华沙之时，哥萨克的行军路线却出现了一个 90 度的急转弯。



上世纪 20 年代初，(自左至右)斯大林、李可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暂时还在一起

力时，却挥师南下呢？为什么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最先出现在 1920 年 7 月 19 日呢？——因为 7 月 19 号是第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的日子。列宁在 7 月 19 日所做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中，控诉了协约国对全世界十二亿五千万人的不平等条约。他宣称苏维埃的所作所为是在维护这十二亿五千万人的利益。他说：“我们还要重新夺回匈牙利，巴尔干将起来反对资本主义。意大利正在颤抖。资产阶级的欧洲就要在风暴中崩溃。”因此，红军要在大会开幕前给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代表们看看，俄罗斯攻打波兰并非报私仇，而要打到匈牙利，解放全欧洲、直至全世界。实际上，陈独秀于 7 月 19 日受命在上海发起的活动，很可能就是这次大会的一次分会。而要攻占匈牙利，则必须南下攻克军事重镇利沃夫。

德国军事大师克劳塞维茨曾指出：一场战争切忌有两个目标。1920 年 7 月 18 日，哥萨克却因为政治原因犯了兵家之大忌。南下后，他们随即陷入两个星期的阵地战和拉锯战，而且碰上了一个多雨的夏天，险些一败涂地。幸好图哈切夫斯基在北面已经包围华沙，围困哥萨克的波兰军队不得不前去救援。哥萨克才得以撤出战斗，筋疲力竭地原地休整。可是红军战线因此从华沙绵

五

哥萨克骑兵军紧急调转方向的时间就在 1920 年 7 月 18 日。为什么他们在最不该分散兵

延至利沃夫以北,横跨数百公里。

华沙方面虽已危在旦夕,但波兰人却要死战到底,他们密谋从红军战线最薄弱处乘虚而入,打一个漂亮的迂回战。此时,从加米涅夫到图哈切夫斯基的红军高级将领也反复催促哥萨克骑兵军改道北上去填补这个空白区域。可是,哥萨克非但没有从命,反而在休息一周后继续南下利沃夫。这个错误命令的始作俑者正是南路红军的政委——斯大林。他担心图哈切夫斯基独享胜利成果,而决计将战火从匈牙利烧到罗马尼亚,成为“世界革命”的一等元勋。

可是,哥萨克非但没有攻克利沃夫,却遭到重创。利沃夫的妇女、老人和孩子,还有教师、律师、工程师等志愿者们顶住了一万多名哥萨克的疯狂攻击,就在哥萨克即将攻占利沃夫的当口,华沙的波兰军人已经出其不意地绕过包围华沙的红军左翼,将其包围。红军在内外夹击下立时土崩瓦解——这就是波兰历史上著名的“维斯瓦河上的奇迹”。哥萨克因为华沙战局大变被迫放弃即将攻克的利沃夫而奉命北上救急。

可是,绕道北上的哥萨克却被波兰枪骑兵在今乌克兰和波兰边境附近拦截。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军大会战就此爆发。战争的结果既惨不忍睹又荒唐不经——哥萨克骑兵和波兰枪骑兵交火,双方列队开始冲锋,但冲到一半的时候,哥萨克大军突然停顿,然后仓惶掉头逃跑——历来骑兵军打仗,人马伤亡不是发生双方激战之时,而是在一方逃窜一方追杀的路上。在这场战役中,哥萨克损失三千人马,军心涣散,虽幸免覆灭之灾,却已无力再战。1920年底,俄共解散了哥萨克骑兵军。此后,俄国虽然还组建过哥萨克军队,但哥萨克再没有以前的雄风和威名,从此一蹶不振。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将哥萨克迁出居住了数百年的顿河草原,导致他们大批饿死,哥萨克作为一种文化也随之消失。

“苏波战争”以苏俄的失败告终,双方于同年十月签订了合约。这场战争也拖垮了已被内战损毁的俄国经济,列宁不得不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

“苏波战争”的失败也成了斯大林一生的心病。他在1924年接替列宁后调走了有关这次战

争的所有高层决定文件,从此再没有归还。

巴别尔作为《红色骑兵报》战地记者,跟随哥萨克骑兵军入侵波兰,他根据这场战争写出的奇书《骑兵军》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就名扬世界,还在苏俄内部引发了一场争论——原骑兵军军长布琼尼指责《骑兵军》侮蔑红军战士,但高尔基却认为巴别尔笔下的哥萨克比果戈理描写的更真实、精彩……

1939年,巴别尔因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被苏联秘密警察逮捕,1940年1月27日被枪杀。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加米涅夫等亲历“苏波战争”的高级将领也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中相继被杀。托洛茨基因斯大林排挤不得不流亡海外,1940年8月,他在墨西哥被人暗杀。死前,他桌子上放着的是他正在撰写的《斯大林》一书的手稿,其中,他将斯大林说成“苏波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

1939年,德国和苏联联手瓜分波兰之后,红军攻占利沃夫。1940年,上万名已经投降的波兰军官被枪杀并埋葬。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卡廷森林事件”。原来人们都以为这是纳粹所为,而解密的苏联档案却证明这场大屠杀的命令正出自斯大林之手。此命令的原件保存完好。斯大林终于报了1920年的仇。

六

1920年的“世界革命”,以正剧始,一度轰轰烈烈,却以闹剧终,遗祸至今未绝。这场战争的真相一开始就被刻意掩盖直至完全从苏联历史中消失了。英美的研究者们虽然分别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过研究苏波战争的专著,但直到巴别尔1920年日记在1990年全文发表,人们才第一次全面地了解了那次战争的细节和真相,尤其是革命横扫过的乌克兰、波兰地区的人民所遭到的浩劫。

也可以看出:正因为苏维埃俄罗斯向西推行布尔什维克主义铩羽而归,他们不得不专注于东方。由此,波及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革命开始了。

(责任编辑 吴 思)

哭倒长城骂倒秦

——从孟姜女故事看中国老百姓眼里的秦始皇

○ 李乔

不应忽视老百姓对秦始皇的看法

评价秦始皇,从古以来,聚讼纷纭,于今未息。论者中,有的说他功劳盖世,有的说他暴虐无道,有的主张对他要少骂,有的主张对他要少赞,各执一词,各有其理。

但这当中有个现象,人们习焉不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古今那些评秦的文章、言论,大都出自史家、文人或政治家,而几乎没有普通老百姓的看法。

是老百姓没有看法吗?或是虽有看法却没有表达过吗?还是老百姓根本就不会臧否人物,不配有看法?我看都不是。是我们没有认真留意过,也没有重视过他们的看法。

在旧时代,老百姓对于国家政治和历史的看法及评说,是写不进正史典章的,他们都是靠口耳相传表达自己的看法,或是将看法寓托于传说、故事、戏文、鼓词等浅俗的文艺中。老百姓的评说,没有“春秋笔法”那样的微言大义,也不像“臣光曰”那样正襟危坐,而多是一种发于生活感受的天籁样的言辞。他们对于秦始皇的看法,就是这样。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个著名故事,最近被国家公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国家对它的人文价值的高度肯定。民国年间,大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下过很大工夫来研究这个故事,写过几篇长篇论文,把孟姜女故事的源流和迁播情况考证得清清楚楚。但他这项研究的本意,却是为他的“古史辨”,为他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服务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所以,顾先生并没有顾及和评说过这个故事中所包含的反秦思想。

最近,出于想要了解“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是怎样看待秦始皇的”这一目的,我重读了顾先生编著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这本书,民国年间曾由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刊印过,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编印出版了此书。在这本研究集里,顾先生除收了自己的若干篇研究论文以外,还收了当时许多位学界名家研究孟姜女故事的文章和通信,刘半农、魏建功、容庚、钟敬文、沈兼士、郭绍虞、钱南扬、郑鹤声等先生都有文章收在集子里。看似区区的一个小故事,竟受到这么多大学者的重视,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孟姜女故事的不简单。学者们研究这个故事的方法和路径,使我大长见识,而文章中提供的许多原始材料,又为

我解决“老百姓是怎样看秦始皇的”这个问题提供了极大便利。

一个包含着老百姓反秦反暴政思想的故事

秦朝以降二千多年来，中国老百姓对于秦始皇就没有过好印象。孟姜女哭长城，主题便是反秦和鞭挞封建暴政的压迫。但这个主题的形成，却是逐渐的。在故事的早期，即《左传》、《檀弓》和《孟子》的记载中，还没有也不可能有关秦始皇这个人物，也没有秦长城，而只是讲了一个发生在春秋时代的杞梁之妻哭悼阵亡丈夫的简单故事。但汉唐以来，这个简单的故事“生命日渐扩大”（顾颉刚语），演变成了一个孟姜女哭倒秦长城的长篇大故事。对此巨变，南宋史学家郑樵说过一句感慨的话：“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不过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通志·乐略》）其实，篇幅的由简到繁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有：杞梁的名字变为范杞梁、万喜良；杞梁妻变为孟姜女；路边哭夫变为哭城；所哭之城由最早的哭山东境内的杞城、莒城变为哭秦长城。有关哭秦长城的情节有：秦始皇命蒙恬催逼工匠筑长城，范杞梁筑城时被打死并被筑在城墙内；孟姜女千里寻夫，至城下大哭，城为之崩，夫尸显现，滴血认骨；孟姜女自尽。随着故事内容的变化，其迁播流布的范围也由最初的起源地山东，变为北方长城一线，而后又向全国猛烈扩张，终至成了一个覆盖全国，家喻户晓的著名故事。

何以春秋时发生的一件本来与秦始皇不搭杠的小事情，竟演变成了一个反秦色彩浓烈的大故事？我以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秦始皇的暴政长久地存留在当时和后代老百姓的印象中，积为一种反秦的社会心理，并代代相传；再一个就是历代老百姓从所受的暴政和苦役压迫的实际感受出发，托古言志，以骂秦始皇的方式来渲泄对压迫者的不满。总之，这个故事的批判倾向的酿成，根源于中国老百姓对秦始皇的坏印象，根源于老百姓恨暴政、恨专制的社会心理。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从民众的感情与想象上酝酿着这件事”。

唐代是孟姜女故事产生反秦的政治批判情节

的关键时代。唐人贯休的《杞梁妻》一诗最早透露了这一变化。诗中道：“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此前的孟姜女故事中，是没有这种批判秦朝无道的情节的，那时孟姜女所哭的城也不是秦长城，而到了唐代，在此诗中，故事显然发生了质变，加入了反秦内容，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孟姜女哭倒秦长城的故事的基本格局已大体具备。顾先生这样评论说：“这首诗是这件事的一个大关键。它是总结春秋时死于战事的杞梁的种种传说，而另开秦时死于筑城的范郎的种种传说的。”

为何唐朝的孟姜女故事会出现贬斥秦始皇的情节？顾先生的分析是，六朝隋唐间，战事频仍，徭役繁重，兵士终年劬劳于外，悲愤得很，就像《兵车行》里写的那样，而他们的妻子梦魂所系的，不是“玉门关”、“渔阳”，就是“马邑”、“龙堆”，总之是北部长城一线，于是便生出了“谁人是为了自己的野心而造成长城”的责问，于是便以“杞梁妻哭倒秦始皇的长城”的故事来渲泄自己心中的怨愤。

暴虐与荒淫：老百姓对秦始皇的印象

从孟姜女故事，可以看出中国老百姓对秦始皇及一切暴君的残酷和荒淫行为的批判。

贯休诗《杞梁妻》里，有“筑人”二字，这是说，秦朝筑长城时要行“厌胜”巫术，即把人筑在城墙里以避邪求祥。范杞梁就是被筑的一个。孟姜女哭长城，就是要哭崩城墙，找到丈夫的骸骨。关于“筑人”，各地故事中的具体情节有所不同，桂林的故事说，范杞梁先是被秦将蒙恬腰斩，然后筑到长城里；湖南的故事说，秦始皇将范杞梁打死后，为了“使他永世不得翻身”，便把他筑在城墙里。老北京话里有一句歇后语：“孟姜女的男人——填了馅了”，说的也是范杞良被筑在城墙里的事。这种“筑人”巫术，真是惨无人道，听起来都叫人毛骨悚然。在历史上，秦筑长城时是否真的用过“筑人”巫术？我没有看到过有关史料，不敢妄揣，但可以肯定，老百姓在故事里加进这个情节，肯定是有相关的因由的。这个因由，就是老百姓对秦朝的暴虐统治，对秦始皇筑长城时残酷役使工匠的史事，有深刻的记忆和愤恨心理。“苦秦久矣”，恨秦久矣，才

会有这样的故事情节。这个情节实质上是老百姓对秦始皇的暴虐统治的一种批判。

秦始皇筑长城时果真很暴虐吗?在正史中,如《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虽然记载了秦始皇的为人“少恩而虎狼心”,也有零星的关于秦筑长城的记载,但并没有秦人残酷役使工匠筑长城的具体细节。但是,根据其它一些旁证材料,还是能推见出秦筑长城时役使工匠的残酷。《秦始皇本纪》的《集解》中有这样一条关于秦筑长城的材料:“论决为髡钳,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可以看出,筑城工匠中是有大量的刑徒的,还可以依稀看出秦朝残酷役使这些工匠筑长城的情形。

古代一些诗人的作品和世代相传的民间记忆中,也保留了一些秦筑长城时残酷对待工匠的信息。晋人杨泉所著《物理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之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其冤痛,若此矣。”试想,如果没有残酷的史,哪会产生这样悲苦的歌?真是一寸长城一寸血呀!又如唐代王翰诗云:“回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傍多白骨。问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黄昏塞北无人烟,鬼哭啾啾声沸天。无罪见诛功不赏,孤魂流落此城边。”所说的“耆老”的答话,显然是前代的“耆老”传下的,这种世代相传的口述,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史料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还有一个可怕的民间传闻,也能反映出秦筑长城时役使工匠的残酷。清代《房县志》记载,北方丛林里曾生活着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其祖辈是逃避筑长城的劳役犯,他们见人就会问:“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乎?”只要回答秦皇还在,“毛人”就吓得逃入丛林。这个传闻,不会是空穴来风,虽然只是一片史影,却包含着相当的真实性的元素。可以想见,若不是秦始皇筑长城给老百姓的刺激太深,怎么会产生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传闻?

从秦朝刑罚的残酷性,也可以间接地推想出秦筑长城时对工匠的残酷虐待。秦朝的刑罚,是以“中国的马基雅维里”韩非的理论为基础的,残酷得很,不光捕人杀人极随便,杀人的方式也酷烈无比,车裂、腰斩、釜烹、坑杀、夷族,闻之便令人胆裂。《汉书·刑法志》形容秦朝是“赭衣囚衣,塞路,圜圜成市”,筑长城的工匠,便多是刑徒。试想,在这种法制状态下,筑城的工匠又多是刑徒身份,那

些监工的素称“虎狼之师”的秦军士兵,能对这些工匠不残酷吗?有人曾考证,连同修筑阿房宫和骊山陵这两项工程在内,秦始皇共役使了百万刑徒,这些人大多有去无回,死在异乡,而那些筑长城的工匠,便大多埋骨在长城脚下。

孟姜女故事中,还有一些贬斥秦始皇荒淫的情节。如绥中县流传的故事说,范杞梁死后,“孟姜往觅夫骸,危坐城下号泣。长城崩颓,露夫骸骨。始皇闻而异之,厚葬其夫,欲纳为妃。孟姜触石而死。”(《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绥中县的孟姜祠》)所谓“欲纳为妃”,实际就是秦始皇役死范杞梁还不算,还要霸占他的遗孀。

秦始皇果真是个荒淫的皇帝吗?且看郭老是怎么说的。他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文中写道:秦始皇是“一位纵欲主义者,大约因为不相信命,所以敢于极端享乐”。(郭沫若《十批判书》)又在《高渐离·附录·校后记之二》中写道:“秦始皇是一位通权变、好女色的雄猜天子,我看是没问题的。”郭老的判断,当然是以史料考据为基础的,所以应当是可靠的。由此可见,孟姜女故事所讲的秦始皇霸占孟姜女的情节,虽然历史上并无其事,但却也并不是完全不着边际的胡编,而是有一定历史因由的合理想象。

从孟姜女故事中,还能看出中国老百姓在封建暴政重压之下难能可贵的反抗意识。除了孟姜女拒绝秦始皇“纳妃”而触石自尽的情节以外,《孟姜仙女宝卷》和唱本《孟姜女花幡记》还记有以下情节:范杞梁死后,孟姜女借秦始皇要纳自己为妃之机,向秦始皇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秦皇必须亲自向杞梁祭奠奠帛,二是必须下旨杀掉筑城监工蒙恬,秦始皇照办后,孟姜女便毅然纵身从长城上跳入火堆自殉。这些故事情节,实际都反映了老百姓反抗暴君、反抗封建压迫的心理,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无奈。

怎样看待老百姓的“秦始皇论”

“哭倒长城骂倒秦”,这是我对孟姜女故事的核心内容和政治思想的概括。孟姜女故事其实并不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只是一篇“哀情小说”,实际上它更是一篇政治故事。它也并不只是单纯的征夫怨妇的牢骚话和贞妇的颂词,而是具有浓烈

政治色彩和历史批判精神的作品。这个故事反映出老百姓的历史观，反映出老百姓心目中的秦朝史和秦始皇，也反映出了老百姓的政见。孟姜女故事，乃是中国老百姓的一篇心史。民族英雄文天祥曾给某地孟姜女庙题过一副对联：“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文天祥显然对孟姜女故事的政治内涵十分清楚，而他的政治倾向则与老百姓完全一致，也是贬斥秦始皇的。

“文革”时期，“四人帮”大搞评法批儒，把秦始皇捧上了天，孟姜女则几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四人帮”何以不放过一个民间传说中的弱女子？因为孟姜女反秦始皇。孟姜女故事的政治倾向，“四人帮”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四人帮”有个标准，谁反对秦始皇，谁就是儒家，就是反动的。于是，孟姜女便成了与儒家一伙的反动分子。如果按照“四人帮”的划线标准，那么给孟姜女庙题过对联的文天祥又该算是谁人呢？亿万中国老百姓是传诵孟姜女故事的主体，难道他们竟是反动分子吗？

也许有人觉得，评价秦始皇是个学术问题，老百姓哪里懂得？他们的“秦始皇论”是没有价值的。我看不一定。我想，老百姓当然不如学者看问题全面，也不如政治家站得高，但他们心里也自有一杆秤，他们往往从朴素的道理和自身的感受出发来评价古今统治者。他们在讲述孟姜女故事的时候，固然不懂得对秦始皇应该一分为二，应该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设立郡县制等等的大功劳，但他们能通过自身的理解、祖辈的“口述”和社会舆论确认秦始皇是个暴君。这让我想到鲁迅的一段名言：“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中国老百姓的“秦始皇论”，大抵如此。

一谈到孟姜女哭长城，自然要涉及对秦始皇筑长城的评价问题。现在人们说起长城，总是以“伟大”二字概括之，这当然是不错的，但这还不是具体的历史分析。秦始皇筑长城，是为防御北方胡人的，应该说，在那个冷兵器时代，长城还是多少起了一点防胡作用的，但作用并不大。相反，因筑长城而被役死的工匠却无法计数，正所谓“秦人半死长城下”（王安石语）。这也正是孟姜女故事发生

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缘由。鲁迅在《长城》一文中写道：长城，“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这恐怕是更接近历史真相的评论。明朝一代，长城仍被作为防边患的屏障，但当时就有有识之士指出，长城对于防边患的作用甚小，修筑长城是“百劳而无一益”的下策。满洲人深知长城对于边患的无奈，所以占据中原后，便不再用筑长城的办法搞边防，而是改为怀柔远人的政策，结果大奏其功。

有人说，既然长城是人类的伟大工程，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那么秦始皇修筑了长城，自然秦始皇很伟大。这个推理其实很皮相。长城伟大跟秦始皇是否伟大其实是两码事。长城从建筑工程学上来说，是伟大的，从后人赋予它的“不屈之精神象征”来说，也是伟大的；但秦始皇用筑长城的办法防范胡人，就很难说是伟大的办法，实际只是一个利小弊大的平庸办法，而最大之弊便是文天祥所说的“筑怨”。至于秦始皇筑长城时的暴虐，就更不是什么伟大，而是对老百姓的犯罪。长城，其实是用工匠的血汗和白骨换来的，要说伟大，也是老百姓伟大。总之，从长城的伟大并不能引申出秦始皇的伟大，这就好像颐和园伟大并不代表西太后伟大一样。当然，秦始皇与西太后不一样，秦始皇对中华民族做出过贡献，而西太后只会祸国殃民，秦始皇筑长城与西太后建颐和园的目的也不一样，一个是为防胡，一个是为个人享受。但是，终究不能用一项工程的伟大来证明工程下令者的伟大，因为这样的逻辑不能成立。

时下，我们对秦始皇是少骂一些，还是少赞一些？从历史学上来说，这不是个问题，只要把史实考证清楚，当赞处则赞，当骂处则骂就是了。在这里，求真求实是唯一的原则。但从当今社会的现实情况来看，我以为还是少赞些为好。因为，我以为，对秦始皇，除了要实事求是地说明他的功过以外，还应该特别认识到，秦始皇的那一套专制思想与我们所提倡和所要建设的“民主的文化”（张闻天、毛泽东都讲过这个命题）和民主政治，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要建设先进文化，就必须与韩非、秦始皇的那一套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彻底决裂。所以，我说对秦始皇要少赞。

（责任编辑 萧 徐）

读者来信摘登

从借读到订阅我看《炎黄春秋》

一次，我到一位离休老干部家中拜访，见书桌上有本《炎黄春秋》，便随手拿过来翻看，一下把我给吸引住了。我看到《炎黄春秋》中的篇文章，似乎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政治、社会、历史、人物等诸多史实。谈古论今，内容丰富，观点鲜明。最吸引我的是敢讲真话。资本主义长处敢阐述，社会主义暴力敢揭露。我今年都71岁了。还首次从《炎黄春秋》中听到暴力社会主义这个词。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就是暴力社会主义。我们千万学不得！可我少年时还一个劲地一心要学苏联老大哥呢。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多少人肃立遗像前痛哭流涕，崇拜得五体投地。现在想想多么幼稚可笑。这是为什么？我们党那时不敢向中国人说真话。不说真话的人也不让别人说真话，一说，我打你右派、右倾，害苦了多少党内外有识之士。大搞一言堂，独断专行。以致于招来十年浩劫，搞得中国处于崩溃的边缘。教训十分深刻。

《炎黄春秋》还事物本来面目，我爱读。于是对老局长说，07年借读你的《炎黄春秋》了，他笑笑答应，就这样，每期刊物一到，如获至宝，一览无余。获益匪浅。不到年底，我早早就把08年的《炎黄春秋》订下了。

我不知《炎黄春秋》何时创刊，但估计是在1978年之后，因为在这之前，敢讲真话的刊物几乎没有，否则讲真话的作者或主编，是要被戴帽子的。从这个角度说，《炎黄春秋》的出版并大受欢迎，说明我们党思想解放向前迈了一大步。本来嘛，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即使塌了，也会有更多的人去托住。

拜读一年《炎黄春秋》，自认为有不少收获，不知对不对，写出来请贵刊和读者指正。

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以前我总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经典，改不得也不允许改动。其实，世界上哪有一成不变的东西，马克思主

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马、恩这两位大师在世时，他们的前期和后期的思想、观点就有所不同，有所进步。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只适合资本主义初期，而不适合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任何时候都抱着阶级斗争不放，必然要搞乱套，不仅不会成为动力，反而会阻碍社会发展。

目前世界有三种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北欧各国）、暴力社会主义（前苏联已失败无疑）和科学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形态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等竞争，看谁胜过谁。和平共处已成现实，和平过渡、和平演变也不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多一个思维，资本主义也可能演变为社会主义呢？

科学发展观认为，一切社会形态都要以人为本。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搞得不错，不少国家国泰民安几十年，劳资双方通过国家调控，都富裕了，收入差距越来越小，难道还非要劳动者去革与自己收入差不多的资本家的命吗？

二、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新的感受。

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何在？现在看得更清楚了，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关键在于党。“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而党的正确领导又在于党的不断改革与创新。正如李锐老先生所说，党的改革，是中国现在所有改革成败的关键。党的改革，一要指导思想坚定，二要政治路线正确，三要组织路线保证。三者统一，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说，组织路线保证更为主要。在特定的条件下，人是决定的因素。时事造英雄，英雄也可造时事，两者是辩证的统一。

三、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要几几开。

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要还历史真面目，该好说好，是坏说坏。不要搞什么“几几开”。斯大林是“三七”开，毛泽东是几几开至今无人定笃。过去，我们一个劲说斯大林好的一面，把坏的统统隐藏起来。赫鲁晓夫报

告一出,我们就搬出“三七开”。在苏联建设时期和卫国战争中,斯大林功不可没。可他在位期间,排除异己,滥杀无辜,规模空前,手段残暴,简直如同暴君。哪是什么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摧残了多少老革命、老干部,有的甚至是他几十年的亲密战友,也难幸免,差一点把立足未稳的新中国给葬送掉。伟人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大搞个人崇拜,犯大错而无法纠正,其后果不堪设想。

安徽读者 高世玉

读贵刊新年致辞的几点联想

本人是一名军队退休干部,是贵刊的忠实读者,每期到手总是读来如饥似渴。我赞成贵刊“反思历史推动改革”的办刊思路。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反思也只能是一定程度的。但这已经是了不起的业绩。眼下有些权威刊物的文章八股味很浓,从概念到概念,读起来像嚼蜡。贵刊的文章一般来说能做到有理有据,联系实际,确能帮助读者明辨是非。周围许多同志都感兴趣。

读了2008年第一期的编辑部新年致辞,有几点联想。

一、“市场经济”前面刻意省略了“社会主义”的限制词。这触及到一个原则问题,就是市场经济是否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本质的或非本质的)?如果有,表现在哪?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宏观到微观特别是微观上是否体现了其社会主义的属性?如果没有,原因何在?

二、“资本和权力私下结盟共同压榨劳动的情况屡见不鲜”。从城镇企业用工到农村的征地运动,的确“屡见不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同资本家的谈判地位比我们劳动者的谈判地位高许多”。过去我们批评人家的工会是“黄色”工会。现在我们的工会处境尴尬,在捍卫劳工权益方面几乎起不了大的作用,应该是什么颜色?贵刊对怎样驾驭资本开出的药方是“民主”。可是民主怎么驾驭资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怎么通过民主驾驭资本的?

三、关于民主,我们常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维护资本统治的民主,因而是少数人的民主。应该说就本质而言,立论正确。但不可否认,那里的人民也确实享受着广泛的实实在在的民主。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制度自我纠错机制的基本保证,也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拯救资本主义制

度使其延长寿命的“灵丹妙药”。而通观战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无一不是实行的专制主义。可以说,专制主义或曰权力过分集中是共产党的天性。它既是我们这种制度的优势即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又是枷锁,创新活力不足,缺乏自我纠错的能力,所谓“一人犯错全党犯错”。由鉴于此,“十七大”提出要以更大的力度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可是有些问题很难处理,例如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怎么实行?就说“控制舆论”,不控制就乱了,影响稳定;控制吧又与宪法原则、人民期待和时代潮流相悖。平衡点在哪儿?有人主张实行多党制以解决权力制衡或曰民主问题。可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多党制所呈现的乱局说明,对中国多党制此路不通。唯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寻求自己的民主道路。由于封建包袱太沉重、对民主的恐惧以及特殊利益集团本能的抵制,通向民主的道路十分艰难。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落实“十七大”关于民主政治的承诺,只有实践能提供答案。

以上可能都是些常识性的问题,说来让人见笑,但本人是外行,有兴趣思考。希望能在贵刊上看到有关文章。

北京读者 刘可成

贵刊的文章深受读者欢迎,每到一期便争相借阅,一读再读,爱不释手,尤其是贵刊的“一家言”,真可谓是有胆有识顶天立地的一家,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一家,更是深受敬重的一家,特别是谢韬、何方、资中筠、尹振环、李锐、钟沛璋、张惠卿、吴思、吴敏、吴江、彭迪、王也扬、张绪山、笑蜀等女士和先生们的文章,胆识超群,文字练达,百看不厌,希望今后仍能看到这样的好文章。多少年来,人们早厌烦透了那些空话套话,八股教条,远离社会现实的所谓理论家的棍棒文章,看这种文章简直是活受罪,是一种精神折磨,这种文字垃圾希望今后不要再出现在贵刊上了。

绍兴读者 钱伯泉

更正

本刊今年第2期《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一文中,由于校对疏漏,出现两处差错:第28页第4自然段第9行“我们这一代人常常被人访问”,“访问”应为“诘问”;第29页左栏第18行“没有祸灭”,“祸灭”应为“泯灭”。谨此更正,并向作者、读者致歉。

《炎黄春秋》编辑室

《炎黄春秋》作者新春联谊会

炎黄春秋杂志社2008年作者新春联谊会于2月20日上午举行，与会者80余人。会议由常务社长、总编辑吴思主持，社长杜导正讲话。

在会上发言的同志有（按发言先后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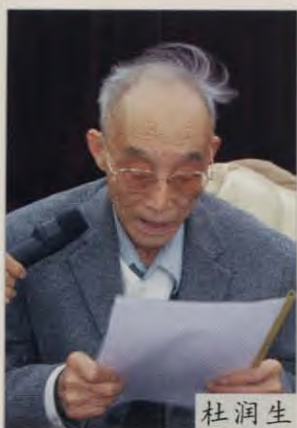
杜润生 李锐 高尚全 曲润海 袁鹰 秦晖 崔卫平 张绪山
辛子陵 谢韬 曹思源 彭迪 章治和

出席会议的同志如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东 王才 王也扬 王建勋 王俊义 王强华 王鑫鑫 白介夫
叶维丽 冯征 冯健 曲润海 朱良 许人俊 齐明昌 刘志琴
杜光 杜润生 杜明明 苏双碧 李乔 李普 李锐 李焱
李永忠 李树桥 李维民 严如平 张鸣 张广友 张文彬 张思之
张晓鸥 张培森 吴明瑜 张绪山 张惠卿 何方 余焕椿 辛子陵
谷秀敏 肖娜 杨天文 陈徒手 季音 金亮 赵德润 胡冀燕
郝怀明 冒天启 姚力文 姚监复 季沛璋 钟施亮 袁鹰 秦晖
顾骧 钱行 资中筠 高放 高尚全 浦志强 曹思源 黄钟
崔卫平 阎长贵 章立凡 章治和 彭迪 谢韬 詹小洪

本社全体人员参加了会议：杜导正 徐孔 杨继绳 吴思
李晨 徐庆全 赵友慈 胡竞成 王海印 孔屏 谷世章 赵凡响

林唐悦



杜润生



李锐



高尚全



曲润海



袁鹰



秦晖



崔卫平



张绪山



辛子陵



谢韬



曹思源



彭迪



章治和

摄影 徐庆全

喜读《日记中的池必卿》

读毛泽东关于“大串联”的谈话

袁振英 —— 陈独秀的得意弟子

我们连里的七个“反革命”

丁玲与毛泽东一次谈话的真伪

1920年的世界革命与苏波战争始末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5.80元